

图 1　1959 年桐斌回国前



图 2　桐斌交大毕业照(1945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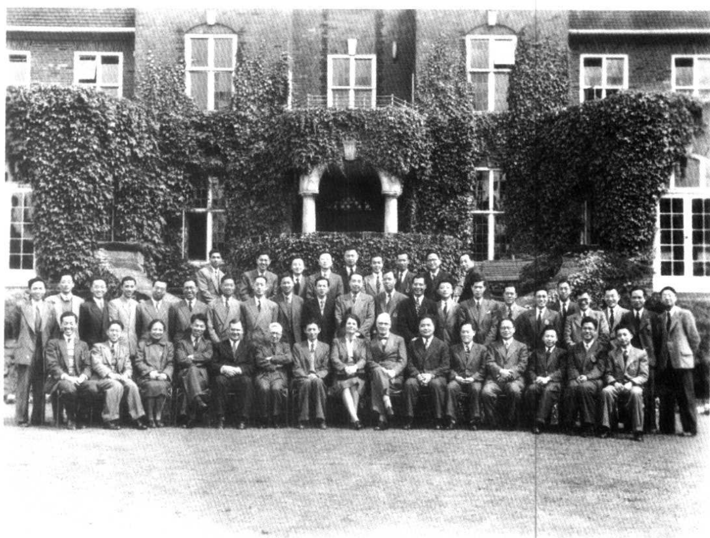


图 3　1948 年英国伯明翰大学冶金学会(前排左一为桐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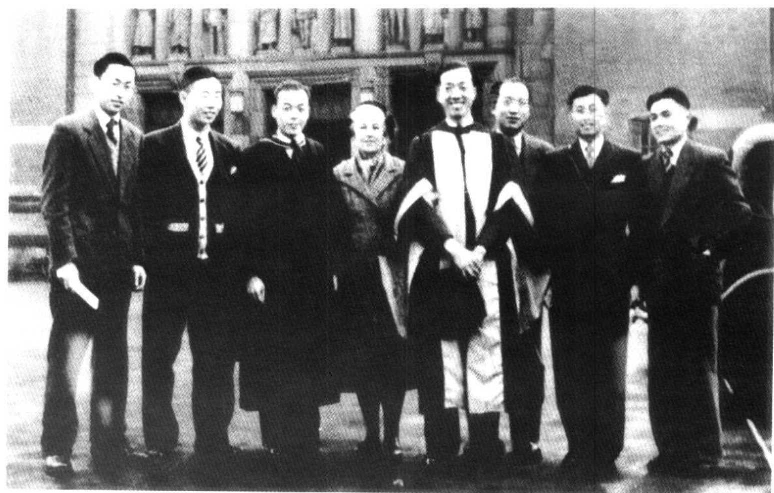


图 4　1952 年桐斌在伦敦帝国科技学院获得第二个学位(左五为桐斌)



图 5　1952 年在伦敦庆祝国庆节(发言者为桐斌)



图 6　桐斌与妻子、母亲、弟弟合影



图 7　1963 年在家中



图 8　1967 年最后一张全家福



图 9　1996 年交大同学参加桐斌塑像揭幕仪式



图 10　作者与家人在中国革命博物馆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前



图 11　七〇三所姚桐斌铜像揭幕仪式

航天情

张爱萍 题

谨以此书献给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我永远眷恋的桐斌

序

我国“两弹一星”的事业，是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们的科学家具有为中华民族奋起，为国防力量的强大，不计个人名利，含辛茹苦，呕心沥血，埋头苦干，默默奉献自己全部聪明才智的崇高思想品德。他们为了潜心这一事业，有的冒着生命危险，从海外归来；有的隐姓埋名多年，长年战斗在大漠深处；有的为了研制新武器而致伤致残，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有的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被诬蔑为“特务”，受到残酷的打击批斗，有的被迫害致死。航天材料及工艺技术专家姚桐斌同志就是这样被夺去宝贵生命的。

姚桐斌同志是怀着“学有所成，报效祖国”的强烈愿望，毅然放弃国外优裕的生活工作条件，回国投身国防科技事业的。他十年如一日，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党的科技事业，为我国航天材料和工艺技术作了开创性、奠基性工作，他倡导的文明科研、撰写的《研究工作方法》，在科技界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他的不幸牺牲，是我国防科技事业的重大损失，但他献身祖国科技事业的崇高精神和优秀品德，为“两弹一星”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却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将永远激励科技战线上的同志奋勇前进。



再版前言

自从《航天情》于 1993 年出版后，承蒙读者厚爱，给我来了很多信，直到今天还有人希望能更多地了解姚桐斌——这位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科学家。因此，我决定再次出版这本书，并加了一个副标题——永远的眷恋。

不仅在国内，在海外也有许多读者有此要求。意大利杂志“GIOIA”就曾采访过我，并节录了书中的一些内容。一位美国朋友在读过《航天情》的英文稿后说：“希望你不要介意，我认为你这本书是中国的《爱情的故事》。”他这话从某些方面说也不无道理，因为爱本来就是全方位的。桐斌热爱祖国，热爱我国的航天事业。当然也爱他的妻子和女儿。

我在美国的中学同学来信说：“……我是一个下午看完《航天情》的。看后，非常感动，也十分悲伤。我真希望能分担你的痛苦和悲哀。但是，我知道，任何人都不能……桐斌是一位卓越的、才华横溢的科学家。我知道，他对家人也充满爱心。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位英雄，一位将生命奉献给祖国的英雄……”

人们不分国界，对这样一位为工作献身的科学家都表示尊敬。我十分感谢海内外读者对我的鼓励。





现在谨以一位教授给我来信中的几段话作为结束语，“……中国前一代的知识分子为了推翻腐败的满清政府，打倒军阀，抵抗日军侵略而抛头颅、洒热血；而稍后的一代也同样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有的奉献了全部青春年华，另一些则丧失了家庭，甚至生命……《航天情》抒发了这一代知识分子，不管是国内的或仍在国外的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这一代知识分子曾做出贡献，也有牺牲，许多人始终是自觉自愿地默默贡献，至今无怨无悔，感谢您在《航天情》中极为真实的历史写照……”

彭洁清

2002年4月

目录





亲爱的，星期六见

2001 年夏天，我的女儿小罗汉带着她五岁的儿子和三岁的女儿回国探亲。

小罗汉是 1983 年获得美国圣母大学全额奖学金赴美留学的。在大学四年中，她一直被评为全美优秀生。1987 年大学毕业后，她又荣获耶鲁大学的奖学金。

耶鲁大学在全世界都闻名遐迩，美国很多知名人士皆为该校毕业生。前总统布什、克林顿都是耶鲁大学的校友。我庆幸小罗汉能就读于这所高等学府。

一年后，小罗汉就获得电子工程学硕士学位，现在在波士顿某大公司工作。

这些年北京的变化之大，令小罗汉眼花缭乱。宽阔的马路两旁，矗立着一幢幢新的高楼，到处是草坪、鲜花。姑娘们着装和港台的时髦小姐一样新潮，看起来十分靓丽，小伙子们也很“酷”，小



罗汉一路上目不暇接，口中啧啧赞叹不已。

然而小罗汉最想看的仍然是天安门，她要让她的儿女们对祖国的心脏有一个印象。

我问："这样小的孩子会记得吗？"

她立即回答："会的，我对三岁时发生的事印象很深，一直牢记心中。"

在天安门广场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下，我们拍了几张照片，并在如织的游人中穿梭来回，和大家分享观光的欢乐。然后，我带他们三人来到中国革命博物馆，在小罗汉父亲——姚桐斌烈士的"两弹一星"闪闪发光的金奖前，她抱起了三岁的女儿，我牵着外孙，我们一起合影。

此时，我突然想到，当小罗汉三岁时，她的父亲、我亲爱的丈夫虽然未能抱她，但是他一定在呼唤着我和他心爱的女儿……我们全家都永远记住那天发生的事。

1968年6月8日深深地刻印在我的心中，永志不忘。那时我在大学教书，星期六，是我被允许回家的日子。一周来，我天天盼望回家。每个星期一，一到学校，我就开始在日历上，一天撕掉一页，好不容易盼到星期六，我可以和桐斌见面了，万般情意涌上心头。桐斌一定也是翘首以待，盼望着我们六天一次的相聚。

我任教的外语院校坐落在北京西郊，我的家在桐斌工作单位附近，却在南郊。吃过午饭，我急急忙忙地离开学校，两个多小时以后，我终于挤上了从永定门往南开的公共汽车。虽然我好像罐头里的一条沙丁鱼，前后左右紧贴着人群，但我已习以为常，并不在意，只盼着车能开快一点，使我能早一点看到亲人。

北京的天气，虽然是初夏，已开始变热了。我走了一段路以后，有些出汗。天气闷得很，看样子要下雨。由于走得快，我几乎有点窒息。但是想到就要回到温暖的家，见到阔别一周的丈夫和



孩子们，我想像着孩子们见到我时围过来的欢乐情景，叽叽喳喳地抢着讲话。每当桐斌回家，他们又围着爸爸喳喳叽叽。一想到马上就要享受的天伦之乐，疲劳顿时消失，我更是归心似箭，快步如飞，急急忙忙往家赶。

我们的家在35栋三楼，一走进过道，就是一个客厅，一个长沙发背靠窗，面向门。桐斌总是让客厅的门开着，坐在沙发上。这样，我一到家，他就可以看见我了。

到了楼下，我快步往上走，满怀希望，"现在已是5点多了，也许桐斌已下班，在沙发上等我"，想到这里，我三步并两步地往上跑。当我登上三楼时，家门忽地打开了，我家的保姆啜泣着对我说：

"姚所长……被人打死了……"

"什么？你说什么？"

我感到一阵眩晕，听不懂她的话，站在门外一动也不动，任由手袋掉在地上。

天哪！这不可能是真的！绝不可能！这个女人在瞎说，这只是一个可怕的梦魇。

三个惊恐的孩子跑过来拉住了我哭成一团。她们扶着我进了客厅，一见桐斌，我便猛扑过去，只见他直挺挺地躺在沙发上，白衬衫血迹斑斑，灰裤子上也是污血和脏土。由于他个子高，两只脚伸在长沙发的扶手上，一只脚穿着袜子和布鞋，另一只脚光着、没有鞋袜。桐斌的头在沙发另一端的扶手上，玳瑁眼镜不见了，脸上青一块紫一块。而对着这令人心碎的景象，我终于醒悟到，这不是噩梦，而是残酷的现实。

我极力支撑着自己，听保姆哆哆嗦嗦地讲述惨案发生的经过。

几天来，第七机械工业部两个对立的群众组织不断发生小规模冲突，许多人都不上班了。桐斌看到有的车间处于瘫痪状态时，曾和几位干部商量，怎样才能使生产不致停顿下来，但干部们的话



已不起作用了。

桐斌不愿随波逐流，每天到办公室去工作。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

"光拿工资不做事，于心不安。"

因此，6 月 8 日，当两派发生武斗时，桐斌照样去上班。中午，有人听说我家附近形势紧张，劝他留在办公室。但桐斌记挂孩子，还是回家了。

回家后，桐斌刚刚拿起碗筷，还未来得及扒上一口饭，几个混入某"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暴徒踢开门冲进我家，他们架起桐斌就往楼下推，一面推，一面拳打脚踢。到了大门口，又有几个头戴钢盔佩戴红袖章的同伙冲上来，左右开弓就是几个耳光，并且把桐斌的眼镜揪下来，摔在地上，用脚踩碎，还恶狠狠地骂道：

"打死你这个反动学术权威！"

桐斌的脸被打肿，鲜血从嘴角流出来。

一个家伙一面狠狠地踢桐斌的会阴部，一面歇斯底里地嗥叫着，他们的吼声引来了更多的暴徒。这时有两个暴徒举起钢棍，向桐斌的头部猛击，鲜血立刻冒出，他倒下了。可是这些自称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暴徒，并未就此罢休。

"站起来！装什么蒜？你又没死！"

这些没有心肝的家伙，硬是把桐斌拖到他们的"总部"。此时，桐斌已不能讲话了，靠在一张木椅上，两眼发直，随后即倒在地上。头头们见状，就吩咐手下的人：

"把姚桐斌搞走，别让他死在我们这里！"

那几个人把桐斌拖到我家楼前人行道上，向他猛踢几脚，还故意大声嚎叫：

"起来，别装死，自己滚回去，难道让我们抬你上去不成！"说完便扬长而去。

一位邻居发现了地上的桐斌，立即跑上楼找我家保姆。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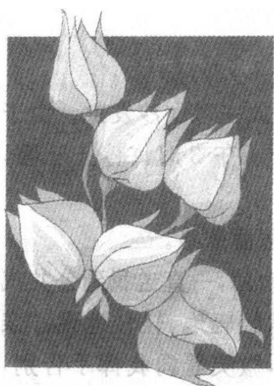
请求将桐斌送到医院抢救,七机部下属的七一一医院离我家不到四分之一里路,但得到的答复是:

"不行!"

在这种情况下,邻居只好把他抬上楼,放在客厅沙发上。由于头部几处受重伤,桐斌一直未恢复知觉,于下午3时许停止呼吸,惨死在家中。

保姆哭哭啼啼地将经过讲完,我听后悲愤欲绝。

桐斌,几天前我上班时你是那样生气勃勃,一直送我到公共汽车站,我像往常一样找了一个靠窗的座位,轻轻地、轻轻地说:"亲爱的,星期六见!"你自然读得懂我的口形,微笑着向我挥手告别,我做梦也没想到,那次的分手竟成了我俩的永诀!



他是这样的人

桐斌1922年出生在江苏无锡黄土塘镇，童年靠父兄做小本生意的微薄收入读完了小学。由于家境困难，父亲不想让桐斌继续读书，要他像哥哥一样，在家中做帮手。可是校长十分喜欢这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他数次来到姚家劝说："像这样好的学生，不上中学实在太可惜了。"大哥也极力支持弟弟上学的要求，桐斌的态度更是坚决，"我要上学"。在这样的情况下，父亲终于同意让桐斌上无锡县中学。这是1933年，桐斌是黄土塘第一名中学生。

上中学后，家里的开销更大了，12岁的桐斌不得不辍学。父亲给了他一点资金，让他在镇上摆个小摊，卖点香烟、火柴、袜子等日杂品，并打零工维持生计，同时积攒读书需要的费用。到了晚上，桐斌就一头钻进从别人那里借来的课本，艰苦自学。两年后，他带着一点点积蓄只身来到上海成康中学读高中。半年后转入江



南中学，由于缴不起住宿费，他只好每晚睡在教室里。

此时，上海和无锡都先后沦陷，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区烧杀抢掠，同时实行奴化教育，规定学校的教学内容，企图培养一代日本国的“良民”。桐斌不愿生活在日寇的铁蹄下，更不愿读侵略者规定的课本和日本语，便瞒着父亲，和四位同学冒着生命危险，越过日军的封锁线。流亡途中他得了伤寒，幸被一家好心的农民收容，让他服中药、养病。历经艰险，1939 年桐斌终于到达江西省吉安县，考进了国立十三中的高中部。

父亲得知这一消息后十分震怒，他大骂暗中资助桐斌的大儿子，还写信给桐斌，扬言只要他回家就打断他这个不听话儿子的腿。

桐斌读书十分用功，毕业时，在江西全省会考中，取得个人总分第一名。这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耀，也为十三中争了光。为此，校长发给他一笔奖金，以资表彰。桐斌用这笔奖金到湖南考区参加了几所大学的招生考试，为了省钱，他一路上在学校、祠堂里借宿。

桐斌报考了五所大学，均被录取，他选择了当时迁往贵州平越的交通大学。

桐斌上大学时勤工俭学，为校方做些打扫实验室、分发邮件等工作，还为一位高中毕业生补习物理，以补助生活费用。

当时交大授课，不管有无课本，一律用英语，桐斌总要作笔记，字写得秀丽清晰，一丝不苟。他的勤奋尤其得到了矿冶系主任王钧豪教授的赞赏。授课时，王教授不时停下来问：“Mr. Yao，你会怎样来处理这个问题？”

桐斌的刻苦全校有名。在校图书馆后面有一片幽静的小丛林，桐斌经常在那里看书。有一些恋人也选择在那儿幽会，他们跋涉爱河并不回避桐斌，他们知道，他的心完全沉浸在书本里，不会留意别人的事。



那时，我还不认识桐斌，我只是和他相识相爱以后才知道，在探索知识的道路上，他总会努力攀登在前面。后来，我和他开玩笑说，那时他之所以专心求学，心无旁骛，是因为他在等着我……

1945 年毕业典礼那天，校长走进礼堂，挤得满满的会场顿时安静下来，人们听到的第一个名字就是姚桐斌，他以全校总评第一的成绩获得了学士学位。此时，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桐斌被分配到迁至四川北碚的中央研究院矿冶研究所工作，任助理研究员。

但是桐斌并没满足已取得的成绩，他给自己定下了又一目标：争取出国留学。

1946 年，桐斌参加了抗战胜利后的第一次公费留学考试，此次考试集中了全国各地的优秀学子，竞争十分激烈。但是桐斌以无可争议的优异成绩考取了。他看中了工业革命的故乡——英国。

出国前，桐斌返回阔别多年的故里。这期间，父亲的经商颇为顺利，家境宽裕多了，盖了一座有两层楼的屋子。父亲见儿子学有所成，自然是喜笑颜开，以前父子间的不理解消散殆尽。

当时，这些考取留学的学生，都必须在南京集中几个月，学习一些国外的礼仪、风俗、人情等。那时，我在南京读高三。我问桐斌："如果我们有机会认识，你会与我相爱吗？"他回答："不会。中学生太年轻，不应该交男朋友。"

英国历史悠久的伯明翰大学于 1947 年秋迎来了一位高高瘦瘦的中国青年。桐斌选择了在工业冶金系攻读博士。这里学术气氛浓厚，科研和工业生产紧密联系，桐斌被这里荟萃的众多名师吸引了，他师从终身教授康德西博士(V. Kondic)。来到异国他乡，桐斌除了一如既往地苦读外，同时注意到了发达国家的科技水平，进一步加深了科学技术对一个国家重要性的体会。



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垮台，1949 年桐斌已没有公费，只好把两年的费用匀作四年使用。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桐斌仍然于 1951 年获得冶金学博士学位。

1952 年 1 月，桐斌在英国伦敦帝国科技学院任实习指导员，并继续深造，1953 年即从该学院毕业，并在该学院任教和做研究工作。此时，发生了一件科学家们意料不到的事……

在英国留学时，桐斌组织并参加了左倾的“中国科学者协会英国分会”和“中国留英学生总会”的工作并担任过留英学生总会主席等职务。1949 年 10 月新中国成立了，桐斌和海外留学生激动万分；他们感到中国真正站起来了，再也不会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了，在上海租界一公园门口挂着的“狗与华人不得入内”这种侮辱性的牌子再也不会出现了。桐斌和一些爱国留学生向国内发了热情洋溢的贺电，并得到回电。

作为学生会主席，桐斌经常收到新中国的报纸、杂志和一些影片资料。看到祖国的进步，桐斌等人十分兴奋，他到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宣传新中国蒸蒸日上的情况，这引起了敌视新中国的英国政府的注意。

一天，桐斌接到伦敦警察厅(Scotland Yard)的通知，约他去“谈话”。这次“谈话”实际上是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人，限期离开英国。同事们忿忿不平，对英国政府的这种做法极为不满，可是又无能为力。

这时，世界最负盛名的铸造学教授，依·皮沃斯基(E. Pivowarski)听到此事，邀请桐斌去联邦德国亚亨工业大学，让他在自己领导的研究所工作。去亚亨前，桐斌在慕尼黑大学进修，提高他德语听、说的能力。

1954 年初桐斌即赴亚亨工业大学报到。他扎实严谨的学术基础和工作作风给同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桐斌对德国同事也很有好感，他空闲时和他们一起去喝啤酒、聊天，感情十分融洽。



他的德国同事生活优越，个个人高马大，有的还有啤酒肚，而桐斌却依然高瘦挺拔，如玉树临风，真是奇哉怪也！

在亚亨工业大学期间，桐斌写过多篇关于金属粘性及流动性的论文，并自制仪器研究金属粘性，他的工作获得了好评，被好几个国家的大学聘请讲学。但是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宣传社会主义祖国，他要让人们在了解他的学术观点的同时也了解新中国。在此过程中，桐斌自己也受到了强烈的感染，受到了党的教育，并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7 年底回国后，北京钢铁学院、清华大学和中科院沈阳金属研究所都希望桐斌能去他们那儿工作。但后来，聂荣臻元帅通过国务院专家局，指名要桐斌到成立不久的导弹研究院工作，负责筹建一个研究所。这是我国第一个航天材料工艺技术研究所。

研究所建成后，改名为第七机械工业部七〇三所，桐斌被任命为所长。对实验室的设计，仪器装备的购置，科研规章的建立，科技人员的培训等，他都事必躬亲，不知有多少个夜晚，他都忙得回不了家啊！

就是这样一位淡泊名利、废寝忘食、专心致志地搞科学研究的人，却无法躲避政治的漩涡。最后，竟惨遭毒打致死！



天使的愤怒

那天，外面雷声隆隆，大雨滂沱，仿佛是天使对人间的残暴表示愤怒。

雨停后，保姆几次向我欲言又止，最后终于吞吞吐吐地对我说：

“我想到别人家借住一晚，好吗？”

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同时请她捎一张便条，把桐斌被害的噩耗带出去。因为家里的电话，在当天上午被“无产阶级革命派”割断。保姆被吓坏了，她不敢带便条。我别无他法，只好叫我大女儿去一位朋友家，请他领我女儿去找军代表[①]，向他们报告她父亲被害之事。

当时，整个第七机械工业部已被军队接管，每个研究所都进驻了解放军。我相信，人民解放军是不会让这些杀人凶犯逍遥法外的。



天渐渐地黑了下来，女儿还没回家，恐惧又袭上我心头，是不是她被人抓走了？是不是又发生了什么不幸？要知道，我在她兜里塞进了一张给军代表的纸条啊！于是我跑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总部”，想把事情弄个明白。

我向两个小女儿交待：“妈妈出去找姐姐，一会儿就回来，除了妈妈外，谁来了也别开门。”我仍不放心，又在外面将门反锁上才下楼。

我走近“总部”时，只见门前站着一个身材魁梧，国字脸，大约三十来岁的人，他头戴柳条帽，身穿白衬衫，绿军裤，配戴红袖章。我责问他：

“你们为什么要打死我爱人姚桐斌？”

“我们没打死他，送他回家时，不是好好的吗？”那人一副无赖嘴脸地回答。

“送到家？你们把他拖到楼前人行道上，不顾他的死活就走了，连家属要求送医院抢救也不准许。”我越说越气，声音也激愤起来。

“你们有什么权利抓我爱人？你们有什么权利打人？我的女儿出去没回家，是不是也被你们的人抓走了？”

“你这个人是怎么搞的？找不到你女儿，关我们什么事？”他说完，一转身，走进楼去。

回到家中，只见我那两个小女儿可怜兮兮地站在客厅门口，她们父亲的遗体就在她们身后，我们母女又相抱而泣。

这一晚，我们三人挤在一张床上。两个小女儿毕竟年幼，在我怀中抽抽泣泣地就睡着了，可是我却难以入眠。桐斌的遗体就在隔壁客厅里，虽然近在咫尺，却已是天上人间，阴阳相隔了。

就在桐斌被害的前几天，我和他避开孩子，在卧室里有过一次忧心忡忡的谈话：



“现在局势很乱，听说北京有的大学有教授被打死了，你看是否到什么地方去躲一躲？”

桐斌不同意，“外地更是乱得厉害。据说，有些地方都动枪动炮了。”

我点了点头，他接着安慰我：

“别担心，我俩都没有历史问题，有什么可怕的？再说，我们身居首都，在毛主席的眼皮底下，难道还会有人敢胡作非为？”

是呀！他说得有道理，我们怀着赤诚爱国之心，回到祖国，不会有人加害的。这样一想，我也就放心了。但是，我们错了！

我们太老实了！

我们太天真了！

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暴力和残酷估计不足，以至于弄得家破人亡。为此，我怎能不饮恨终生？

蓦然间，《白毛女》的歌声通过高音喇叭传到我的耳中。

“文革”时，到处都安上高音喇叭，这样，造反派任何时候都可以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有时，高音喇叭不分昼夜地播放革命样板戏[2]。

据说，《白毛女》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说的是佃户杨白劳因交不起地租，地主黄世仁派狗腿子把他的女儿——喜儿，抢走抵债。杨白劳极度悲愤，喝卤水自杀。后来喜儿不堪凌辱，逃到深山，她怀着深仇大恨，顽强地活了下去。但由于山中缺吃少穿，连盐也没有，喜儿很快就披着一头白发，故称之为“白毛女”。

喜儿的未婚夫参加了八路军。解放后，随队伍回到村里，把喜儿从深山里救出来，喜气洋洋地结了婚。人民政府法办了地主黄世仁。

《白毛女》有电影，也有歌剧，我看过以后，深受感动，也喜爱它的主题歌《北风吹》，只要听到这个乐曲，我心中就激动不已。



《白毛女》的故事是要向人们说明这样一个事实：旧社会把一个青春少女变成“鬼”，新社会却把“鬼”变成了人，过着幸福的生活。但此时此刻，当我再一次听到《北风吹》的旋律时，却是百感交集，心里充满着悲伤和惶惑。今天，一个全心全意为祖国工作的科学家，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活活打死，他的遗体，停放在家中已十多个小时却无人过问！

漫漫的长夜，终于熬过去，朝霞从窗口射进，6 月 9 日来临了。

两位军代表，一高一矮，带着我女儿跨进家门，后面跟着几位解放军战士，抬着好几大桶冰块。他们将冰块放进浴缸，把桐斌的遗体从客厅里抬出来，放在上面，四周又堆放了许多冰块，然后将门窗紧闭，以保持浴室低温。

这时，那位高个军代表对我说：

“昨天因为时间太晚了，不放心让您的女儿回来，故而让她住在我们那里。”

“你们难道不能派人送她回家？我都快急疯了。”

“昨天周总理一听说这里发生武斗，姚桐斌同志被害，就派粟裕大将乘直升飞机来这里了解情况，恰好您的女儿进办公室，于是我们就让这个小姑娘当面向粟裕同志报告姚桐斌同志被打死的经过。这样一来，时间就拖晚了。”

“一个九岁的小孩子怎么能讲得清楚？你们军代表到七机部时间也不算短了，难道还不知道我爱人没有政治问题，历史清白，是一个好同志吗？”

军代表也承认桐斌是位好同志，他被打死，是他们始料不及的。

这两位军代表用许多冠冕堂皇的话来安慰我，他们哪里知道，任何人的话都不能减轻我的凄苦和哀伤。

我失去了心爱的丈夫，孩子们失去了慈祥可亲的父亲，这损失



难道能弥补吗?

我们国家失去了一位学识渊博、刻苦钻研、无私奉献、大有作为的科学家。桐斌才四十五岁,正是出成果的好时光啊!这损失还算小吗?

军代表见我没吭声,只好告辞:

"我们得走了。"

"你们打算怎么办?这么热的天气,就这样把我爱人放在浴缸里?"

"我们已经和几个医院联系了,都说没地方停放遗体。"

"死的人太多了吧?连太平间都有人满之患?"

他们尴尬地说:

"您好好休息一下,这几天,我们会派战士早晚各送一次冰块来的。"

说完,两位军代表就急奔下楼而去,留下我和三个孩子孤零零地守着她们父亲的遗体。

注释

① 军代表:"文化大革命"中,对一些部门实行军事管制,被军管的单位,均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派出人员组成的军事管制委员会直接掌权,而人们称呼这些解放军为"军代表"。

② 革命样板戏:当时江青在全国树立作为样板的几个现代题材戏剧,被称为"样板戏"。其中有: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杜鹃山》和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参见金春明等编:《"文革"时期怪事怪语》,第 299 页,求实出版社,1989 年)



我不能没有你

军代表走了以后，我和女儿们默默无语，沉浸在无比的哀痛之中，不知如何来互相安慰，只有我们三岁的小女儿，用她的小手轻轻拭掉我脸上的泪珠。

我抬头环顾屋里，整个客厅空荡荡的，沉寂得可怕。“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破“四旧”①，窗外花池里的几株美人蕉，室内的橡树和吊兰，都被当作资产阶级的玩意儿砸毁了，就连柜橱里的一些小摆设，如花瓶、石膏像和墙上挂的风景画等也被一扫而光。

如今，墙上只挂着一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像。毛主席从墙上盯视着我们，不知他是否看见了被人打死的桐斌？不知他是否看见了以泪洗面的孤儿寡母？

“文化大革命”以前，也是在这间客厅里，却是另一番景象。一进门，透过雪白的窗帘，能见到窗外花池里那一排嫣红的美人蕉。



室内的吊兰和橡树使客厅生气盎然，一面墙的格子里摆满了我们从世界各地带回的纪念品，另一面墙上挂着一副城堡似的亚亨工业大学校园风光画。

孩子们欢声笑语，唱唱跳跳，好不热闹。只要桐斌不加夜班，我们全家就喜气洋洋，像过节一样。“爸爸”、“爸爸”之声不绝于耳。全家兴高采烈，孩子们都争着跟父亲说话，要父亲给他们讲故事。谁能紧挨父亲，得到父亲抚爱，就像得胜的将军一样。小女儿特娇，总是抢先爬到爸爸的腿上。

每次桐斌一进家门，小女儿就一颠一颠地拿着父亲的拖鞋，放在地上。

“爸爸！鞋鞋。”

“哎呀！真乖！”桐斌心中乐开了花，将她抱在怀里，不住地亲她。“爸爸，我也要。”、“我也要。”两个姐姐提出要求，桐斌轻轻地拍拍她们的头，然后用两手将她俩围住。该睡觉了，孩子们还赖在客厅不走，总要保姆催几次，抱起小三，两个姐姐才恋恋不舍地去睡。

桐斌兴趣广泛，多才多艺，他虽然是学工程的，但中文根基极好，不但文章写得漂亮，还能做诗填词。在写信给我时，兴之所至，也曾来过几首诗。他从小就喜欢画画，在家乡上小学时，就得过奖，图画老师曾鼓励他长大了当一名画家。

有一次桐斌出差到外地，寄回来一封信，我拆开一看，一张素描飘然落下，上面画着一只母鸡带领三只小鸡，正向着一只昂首阔步的大红冠公鸡挥翅告别。这时，三个孩子围过来看画，急切地找出自己，“这是我！”，“这个是我！”，“这是妈妈！”，“看，爸爸还戴着眼镜哪！”小小一张素描，留下了孩子们的欢笑……

桐斌特别爱好古典音乐，我却喜欢 Rogers and Hammerstein 的轻快乐曲。在他的影响下，我也逐渐喜欢贝多芬、巴赫和莫扎特这些大师们的作品了。贝多芬的第五交响乐成了我俩的至爱。每



当我们欣赏音乐时，我总是静静地靠在他的肩上，我们被美丽的音乐陶醉，也为我俩的浓情而心醉。

现在，客厅景物依旧，桐斌却离我而去。我永远也不能和他相依相偎在一起听音乐了。孩子们也没有慈父给她们讲故事了。

对比今昔怎不令我泪湿衣襟！

幸好我家有两个卫生间，这样，孩子们就可以用另一个卫生间，而不必一日数次地见到父亲的遗体。在她们这样小小的年纪，本应无忧无虑、欢欢乐乐地生活，然而，那种幸福的日子却一去不复返了。

幼年丧父是人生的一大不幸，何况她们又亲眼目睹父亲被打死的惨状，这在她们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何等刻骨铭心的创伤啊！作为她们的母亲，我怎么能忍心让她们再受到刺激和伤害呢？我要尽全力保护她们平安成长，就像桐斌那张素描里的母鸡保护她的小鸡一样。

至于我，却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趁孩子们不注意，跑进卫生间，跪在浴缸边。见桐斌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我想起我们第一次相逢的情景。

那是在一次留学生相聚欢庆春节的晚会上。那天，友人约我去参加，我们找了一处角落里的座位，我正好面对大门。桐斌一进会场，就引起了我的注意，颀长的身材，清秀的面孔，浓密的黑发，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玳瑁眼镜，那文雅、潇洒的风度，在一群男生中分外显眼。

我按西方习俗，两手各自将中指放在食指上以祈求好运。终于，他邀我起舞，我面红心跳，高兴非常。

那个晚上，桐斌再也没有请别的女生跳舞，我们一直共舞至曲终人散。

人生结合多奇幻！萍水相逢一见情牵。我俩互吐衷肠，很快



就结为连理。我们以为一定会白头偕老，没想到，桐斌正当盛年却被撒旦夺去了生命。

我抚摸着桐斌的脸，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看不清他脸上的红肿是否消掉了。

一个月前，也是在这间房子里，一天早晨，我和桐斌一起洗漱，肩并肩地对着镜子相视而笑。蓦地，我发现他两鬓出现了银丝。

"呀！你是什么时候有了白头发的？我以前怎么没有注意到？"

再对着镜子看看我自己，眼角也出现了鱼尾纹。

"你看，我也老了！"

桐斌用手指轻柔地抚摸着我的头发说：

"老什么呀！我们一点也不老，我俩甜蜜的日子长着呢！我们还能为祖国工作二三十年啦！"

这些话犹在我耳旁回响，然而，如今只有我一个人孤孤单单地伴着他的遗体哭泣。

桐斌，我哭泣，为你脸上的伤痕哭泣。

我哭泣，为我和你不能白首到老哭泣。

我哭泣，为你壮志未酬英年惨遭毒手哭泣。

我哭泣，为我们的国家哭泣。

当年，我读《呼啸山庄》(Wuthering Heights)时，书中描写希思克利夫(Heathcliffe)在他的恋人凯瑟琳(Catherine)死后，将她从坟墓中挖出来，自己躺在她的身边。那时，我认为这只不过是作者爱米莉·勃朗特(Emily Bronte)浪漫的夸张，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发生的。现在我体会到希思克利夫的那种心情了。当你爱一个人时，不管生生死死，你都愿意和他在一起。

我是多么想追随桐斌去九泉之下啊！

以后的日子怎样过？看不到他亲切的面孔，听不见他低沉柔



和的声音，惊梦时分没有他握着我的手，我也会死去的。我宁愿死！没有桐斌，再呆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意思？

慢着！我怎么会这样想？怎么会有这样的念头？在那种年头，自杀被认为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叛徒。那样，我们的孩子们就会成为叛徒的“狗崽子”，会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压在社会的最底层，上学、就业都会受到刁难，一辈子遭人白眼，抬不起头来。

唉！真是欲死不能，欲活太苦。

但是，为了孩子们，我一定要挺住，一定要撑下去。

为了给桐斌报仇，我一定要顽强地活下去。

杀夫之仇，不共戴天，我一定要尽全力查出凶手，使之受到应有的惩罚。

忽然我听到了清脆的童音：

“妈妈！解放军叔叔来了！”

不知不觉，夜幕已经降临，战士们抬着冰块进来了。浴缸里的冰已融化，水从浴缸里的下水道流走。战士们将冰块放好，仍然紧闭门窗。他们建议我白天将其他房间的窗户也关紧，拉上窗帘，不让阳光射入，以降低室温。那时，不但住家没有空调，就连办公室、会议室、饭店、车站等公共场所也没有，顶多就是电风扇而已，故而室内比较闷热。

保姆紧跟解放军战士走进室内，接着进来的还有住在我家里的两对年轻夫妇，他们是七〇三所的技术人员。

某造反派夺权后，认为我们家住的房间多，就安排他们搬来我家。对他们的迁入，桐斌表示欢迎，并让保姆给他们腾出两间房子。

实际上，在这之前，凡是七〇三所工作人员的家属来探亲，或有人结婚，而又一时解决不了住房的，桐斌都热情地邀请他们到我家来住。几年中，被招待过的就有十多户。为此，我没少跟桐斌



嘀咕：

“让外人住在家里，真不方便。我宁愿住小一点的地方，也不愿和别人一起住。”

“他们又不是长住，帮帮忙，好吗？”

听到这样的语气，看到他清秀消瘦的面孔，我怎能忍心再搅乱他的心绪。

昨天，桐斌被害后，在我家居住的两户人家就已经躲走了，现在是来搬行李的，说是已另觅住处。

他们对我说，桐斌被害的消息，昨晚已经传开了，大家都说，像姚桐斌这样文静、善良的人都会被打死，这个地方实在太危险了。因此，在北京有亲戚朋友的，都想法躲了出去。有的人甚至躲到附近田地里过了一夜，真是弄得人心惶惶。

他们还告诉我，当时就有一帮小青年要找那伙暴徒去拚命，怎么劝也劝不住。

“幸亏您叫您女儿带给军代表一封信，军代表念给大家听，才把他们的情绪稳定下来。”

其实，我让女儿带去的只是一张便条，匆忙写就，仅寥寥数语。我仅把桐斌被害的事报告军代表，请他们查出凶手，并对他们说，桐斌虽然没有参加任何一派，但当时两派群众组织正在武斗，我不希望桐斌的被害，将事态扩大。我不希望这样的惨剧再发生。我不愿再有一颗心像我这样被悲苦所蹂躏。我更不愿再出现孤儿和寡母。

此时，有坏人放出谣言，说桐斌是国际特务，家里有一台收发报机直通海外等等。我一听不禁怒火中烧，这些人真狠毒，打死了人还要造谣诬蔑。

谣言也造到了我的头上，说我是“美帝特务”。在美国时，为“美国之音”效过劳。这些人大概是戈培尔（希特勒的宣传干将）的



门徒吧，以为只要把谎言多重复几次，就会有人相信的。

住在我家的两对年轻夫妇告辞而去。几位战士在饭厅里逗孩子们说话，保姆提着一个箱子坐在那里，看见我进来，嗫嚅着说：

“真对不起，我实在害怕住在这里，想辞掉工作。”我能体谅她的心境，点头应允。

他们走了之后，我插上门，思绪万千，既然有人造谣，说桐斌和我都是“特务”，还有谁敢同我住在一个屋顶下呢？这会使他们受牵连的。虽然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封建时代的某些做法，却照搬不误，一人犯罪，株连九族就是一例。

几个孩子悄悄地走到我身旁。

“妈妈去休息吧！您总不能不睡觉啊！”

“好孩子，你们先去睡，妈妈一会儿就睡。”

我回到卧室，躺在床上，可是我怎能入眠？多少个夜晚，桐斌和我同在这里。我们的幸福、我们的欢悦、我们的爱恋……仿佛桐斌又来到我身边，我们侧卧着谈心、说笑。我嫌他说话慢，总是数落他，他慢条斯理地辩解说：

“说话要慢才清楚，邱吉尔演讲就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说。”

“哎呀！人家邱吉尔是演讲才说得慢，你跟老婆谈情说爱要那么慢干啥？”

“我的习惯难改啊！谁像你，说话像连珠炮似的，只要你一回家，我耳边就没有清静过，一会儿桐斌这样，一会儿又桐斌那样。”

他缓缓地回答，然后假装叹了一口气：“唉！有什么办法，谁叫我爱上了你这挺‘机关枪’呢！”

我自小就怕打雷，只要雷声一响，我总是胆战心惊。

一天晚上，我和桐斌刚刚入睡，一声炸雷，把我吓得直往桐斌怀里躲，桐斌拥我在怀，用手轻轻拍我：“别怕，别怕，有我在呢……”



桐斌脾气好，对我体贴入微，温存备至，只要和他在一起，我就感到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一次，我俩躺在床上，我对他说："桐斌，我们这样幸福，不会长久的吧！"他赶紧用手捂住我的嘴，急忙说：

"你瞎说些什么呀！"

同时紧紧地抱住我，好像真的会失去我似的。

回国后，我才发现，国内外的生活相距甚大，很多方面难以适应，是桐斌给了我安慰和鼓励：

"这是我们自己的国家，你一向适应性强，很快就会习惯的，别着急。"

"文革"时，学生们的粗暴无礼，使我愤怒，令我伤心，又是他耐心地劝慰我：

"只要毛主席一句话，一切都会恢复正常的，别把我们个人受的委屈放在心上，好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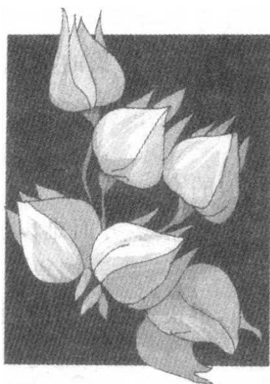
现在我孤身一人，心中有苦向谁去诉说？有困难又有谁来关怀？

桐斌，我不能没有你！

啊！桐斌，你在哪里？

注释

① 四旧：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苍天作证

一阵阵敲门声，将我从往事中惊醒。啊！已经是10号早晨，又是一个不眠之夜！我起身开门相迎，一看还是几位战士抬着冰块。

“同志，军代表没来？你们知道什么时候安葬吗？”

“不知道，首长们只指示我们早晚来换冰块。”

“请你们问问军代表，哪天安葬？天太热，放在家中不是办法。想必你们也知道，没有军代表的介绍信，哪个火葬场都不会收的，麻烦你们问一声行吗？”

“我们回去就把您的要求报告首长。”

晚上，原来那两位一高一矮的军代表来了，进屋后就忙着解释：

“对不起，上午有点急事耽误了，没有来。杨主任想见见你，我们现在去一下怎么样？”



“哪个杨主任？”

“我们军管会的杨国宇主任。”

“我去看看孩子们再走。”

保姆走了以后，三个女儿都挤住在一间房里。我轻轻推开门一看，搬进的单人床空着没人，两个姐姐把小妹妹夹在中间，睡在一张大床上。她们都睡着了，我轻手轻脚地关好门，然后同军代表一道下楼。

门外停了一辆军用吉普车，司机是一位年轻战士，我们一上吉普车，车就开动了。路灯原来就不太亮，“文革”后，灯泡经常被人打破，没人安装，如果不是有车灯，连路上的行人也看不清楚。

车在石板路上缓缓而行，路两边茂密的钻天杨树，郁郁葱葱，像两道绿色的屏障。时而有巡逻的人从树后出来，一看是军用吉普，就立即缩回去。看来，我们住的这一地区确实有人巡逻，因为这里离某“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总部”很近。听说在另外一个地区的另一派“总部”也是昼夜有人巡逻，只不过桐斌和我不知道罢了。

车驶出生活区之后，穿过一条马路，就进入工作区。大门边有解放军战士站岗，司机出示了通行证后，他就让吉普车开进去。

工作区是柏油路，路很宽，路灯是乳白色的玉兰花形，齐放亮时，相当好看。现在被打碎不少，七零八落，一股冷森的感觉油然而起。转了个弯，到达一所灰色四层楼房。整座楼一片漆黑，只有几间房里有暗淡的灯光，我迈着沉重的步子踏了进去。

两位军代表带领我上了楼，吉普车在楼前等候。楼里没有电梯，我们走上二楼，在长长的走廊里一个人也没有，只听见我们的脚步声。

我们走进一间大办公室，那个高个军代表报告说：

“首长，我们来了。”

这时，一位身着海军制服，白白胖胖五十岁左右的军人，从一张大办公桌后站起来和我握手，并且说：



“请你来这里谈谈，是因为这里安静。”

地道的四川口音，我想他就是杨主任了。据说，他是海军副司令员，是一位长征干部。他接着告诉我，周总理已经指示，打死姚桐斌是党纪国法不能容许的严重事件，一定要严肃处理，惩办凶手。我问杨主任，抓到凶手没有？我说，我爱人已被打死三天了，而且凶手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行的凶，找出来不应该太难。

“唉！你不知道，七机部情况有多复杂，破案不容易啊！不要性急，要相信组织！”

杨主任又指着军代表对我说：“他们把你写的信向我汇报了，我当时就说你这位女同志不简单，在那种情况下，还能保持冷静头脑，协助我们防止了一场更大的武斗，不简单啊！”

一直正襟危坐、全神贯注没发言的军代表，频频点头称是。交谈了一会儿，军代表提醒杨主任：

“首长，法医马上要去姚桐斌同志家，我们该走了。”

于是杨主任和我握手告别，并嘱咐我要相信组织，保重身体。

回去的路上，大家都沉默不语。风从窗口吹进，感到一丝凉意。路上的树影，随风摇曳，像鬼魂在跳舞。

我们到家时，一看表，已经是 10 点半了，另一辆吉普车几乎同时到达，司机也是一位年轻战士。从车里走下两位穿便服的人，有一人身上还背着照相机，他们是法医。

上楼后，矮个子军代表领着那两个人直奔卫生间。高个子军代表坐在沙发上陪着我，不让我进去。这时，我问他为什么请法医。他说：“周总理的指示下达后，又有另一种谣言，说姚桐斌同志是死于心脏病，也有人说，他是自杀的，故而请法医来检查。”

听到此话，我怒不可遏：“把人活活打死，还要造出这种谣言，太卑鄙了。”

当时我就找出纸笔，想写一张大字报，告诉人们桐斌被害真相。军代表得知我的意图，极为紧张地劝我不要写大字报，说这种



事传出去，会给“文化大革命”抹黑的。

“谁给‘文化大革命’抹黑？是我？还是凶手？”他无言以对，点燃一支烟，默默地抽了起来。

我越想越气，后来还是写了一张大字报，请人张贴出去。

在大字报中，我将桐斌的生平作了简略介绍，并把他被杀害的真相公布于众。

后来别人告诉我，有不少人边看大字报边流泪，我从中领悟到：世上还是好人多，世上还有温情在。

过了好长时间，那三位才从卫生间出来，两位法医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没说一个字，但他们的眼神里，流露出对我遭遇的深切同情。

矮个子军代表对我说：“快 12 点了，您去休息吧！明天还要送到海军医院进行解剖。”

“解剖？”我不解地问。

法医很温和地解释，在我家，他们只做了初步检查，只有在医院里做解剖，才能详细地检查。说完，他们四个人一起离去。

我独自坐在沙发上，思潮起伏，不能自已。

桐斌！你在世时，一直以工作为重，哪天有过空闲？现在你闲下来了，躺倒了，休息了，却是永远的休息，再也不能对我微笑，与我谈心，和我爱恋。

我们享有爱情和幸福，但却被魔掌残酷地夺走了！

忆以往，我泪如泉涌。

1961 年夏天，组织上安排我们去北戴河休养，你别的东西没带，却带了一箱子书，整天手不释卷，何曾休息过？气得我逢人就告你的状。你只好耐心地对我解释：

“别孩子气，平时所里的事太多。只有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



多看点书，为科研课题做准备。还得给一些同志审校译文，你要多体谅我点，好吗？”说得这样入情入理，我岂能再出怨言？

节假日时，你又在家里呆过几天？不是去探望病号，看望来京家属，就是和技术人员谈工作。

记得吗？一个礼拜天，有一位年轻技术人员要出差，你和他在客厅里谈了很久，反复交待注意事项。我推门唤你吃饭，正好看见你把一块手表拿给他，我感到奇怪，但不好当着客人的面问你。他走后，你随即告诉我，当你嘱咐这位年轻人要遵守时间时，他说没有手表，你就从柜子里拿出一块表给他了。

桐斌！你可曾想到，那是我好不容易搞到的一张表票，为孩子买的一块手表，准备作为她小学毕业时的礼物，你竟然送给了别人。没等我开言你轻轻地拍拍我，挽着我的手，走进饭厅。看到你日益消瘦的脸庞，我的心软了，火山没有爆发出来。

桐斌！你这样日夜操劳，不顾自己的身体，我怎能不心疼。

有一次你深夜未归，孩子们都睡了，我按惯例躺在床上看书等你，听到你上楼时沉重的脚步声，我知道你又是疲倦得迈不动步了。赶忙起身为你往浴缸里放水，又急急忙忙地跑进厨房为你热饭菜。你再三地说：

“谢谢！我自己来。谢谢！我自己来。”

桐斌！只要你还活在世上，不管你受多么重的伤，即使你变成残废，我仍然会像以前一样地爱你，疼你，照顾你。

红日冉冉升起，看来11号又是一个大热天。阳光透过树叶的间隙，又透过晒台的纱门，照在毛主席像上。见到毛主席的像，我立刻想起了《东方红》这首歌。

自“文革”开始，整个中国到处都响起《东方红》的歌声。据说，《东方红》这首歌是用陕北民谣曲调谱写的。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



他是人民大救星……”

想到此处，我潸然泪下，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墙上的毛主席像，不由自主地喊叫起来：

“毛主席啊！请您救活桐斌吧！您救活桐斌吧……”

几天来，闷在心里的悲愤，像开了闸的水一样奔泄而出。孩子们被我的哭喊声惊醒，从卧室跑来，穿着睡衣，头发也没梳，团团围住我，大哭起来：

“我们要爸爸！我们要爸爸！”

正在这时，解放军战士又抬着冰块走进来，他们见到这个情景，都怔住了。低声商量了几句后，一个战士匆匆跑下楼去，不一会儿，请来一位女医生。

这位女医生在七机部下属七一一医院工作。她长得白白胖胖的，大眼睛，圆脸，我们很熟悉。她进来后，立即扶我到卧室去，让我躺在床上，给我服了两片药，又打了一针，对还在哭泣的孩子们说：

“乖！别哭！你们哭又会引起妈妈伤心的。”然后转过头来安慰我：

“你要看开一点，好好休息，不要把身体搞垮了，否则，这几个孩子就更可怜了！”

我木然不语，她的眼眶也红了。

过了一会儿，她又低声对我说：“我们听到姚所长被打死的消息，很突然，很伤心。你平时不在家，孩子生个病什么的，姚所长总是亲自抱到医院来。他对孩子那样耐心，对人又和气，谁都羡慕你，说你有福气。唉！谁能料到……”

她轻轻地叹着气，继续说下去：

“孩子们整天关在家里不好，我把两个小的带下楼，让她们出去玩一玩，将大的留下照看你吧！”

临走时，她又再次嘱咐：



"有什么事尽管去找军代表，让你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守着尸体，关在屋里三天，太不像话了！"

医生走后，我迷糊了一会儿，醒来一看，几个孩子不声不响地坐在房间里。

我问老二："妈妈不是要你带妹妹下楼去玩吗？"

"妈妈！我们早就回来了！"

"怎么不多玩一会儿？"

老二眼圈一红，一串串泪珠流到腮边。

"妈妈！楼下没有小朋友玩。我带妹妹去找小红玩，还没进她家门，小红就跑出来说，她爸爸不许她和我们玩，说咱们家出了问题。"

我起身为老二拭干眼泪，哄着她说：

"别哭，小红不和你玩，还有别的小朋友啊！再说，周总理都说你爸爸是一个好人，等小红爸爸知道了，就会让她和你们玩的。乖孩子，别哭了。"

老大催我们去吃饭，桌上摆了好几样菜。

"这都是你做的？"我惊讶地问。

"不是我做的！是二妹带回来的。"

老二一五一十地告诉我，说她从小红家出来时，看见新新提着一个篮子，里面装着两饭盒的菜。新新说，这是她妈妈专为我们做的。

新新的父亲也是从美国归来的留学生，我们是在招待所等待分配工作时认识的。新新的父母也被分配到七机部，他在另一个研究所担任副所长。据说前几天，他还挨过批斗，坐过"喷气式飞机"[1]，而他们竟敢冒着风险，送菜给我们，我的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入夜后，我早早地打发孩子们睡觉。那两位军代表带来好几位战士，他们乘一辆海军医院的大汽车，战士们将桐斌的遗体抬进



车里，我们几个人也都一起上了车。汽车开到海军医院后，停在解剖室门前，我要求和桐斌一起进去，但被军代表劝阻。他们留一个人在车里陪我，不如说是看住我，以免我闯进解剖室。

军代表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点点红光闪现在我眼前，一直昏昏沉沉的我，忽然想起来了，我们刚回国时，不就住在海军医院隔壁吗？那时，我曾对桐斌说：

"我们把家安在这里真不赖，看起病来多方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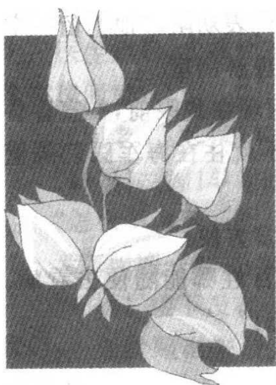
他笑着回答："这是海军医院，我们老百姓哪能随便去看病。不过得了急病，他们也不会拒之于门外的吧！"

人生的祸与福，谁能预料，曾几何时，桐斌真的进了海军医院，但不是看病……想到这里，我不由仰面发誓：

"苍天作证，我一定要为我的丈夫昭雪！我一定要为他报仇！"

注释

① 坐喷气式飞机："文化大革命"开批斗会时，通常由两个彪形大汉站在被斗人的两旁，用手按下被斗的人的头，离地很近，同时向后使劲拉被斗人的双臂，再向上举，扭成像飞机的样子，故称为坐喷气式飞机。（参见金春明等编：《"文革"时期怪事怪语》，第346页，求实出版社，1989年）



海外归来

夜深了，车窗外一片漆黑。桐斌的遗体正在医院里被解剖。车里呆坐着的我，精神恍惚，如梦似幻。

车窗虽是开着，但呛人的烟味还是把我带回到残酷的现实，对命运的多舛、人事的沧桑，感叹万千。

我推门下车，军代表也立即随我而出，他和我默默无言地来回踱步。

我们家原来住的楼房与海军医院仅一墙之隔，尽管是黑夜，仍能隐隐约约认出我们的旧居。它使我沉入回忆的海洋。

在北京前门外的一条小胡同里，有一家饭店，两层楼房，坐西朝东。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这家饭店被改成从资本主义国家回来的留学生招待所，由国务院专家局领导。

我们刚回国时，被安排住在这家饭店里。当时，里面住着几十



位留学生，这些人是分别从日本、美国、英国、法国、西德等不同国家归来的。有些是单身汉，有些是夫妇带着孩子阖家回国来定居的。

我们住在楼上的单间里，屋里仅有一个洗脸池子。厕所和浴室是公用的。

楼下的设备和楼上一样，只不过有一个大饭厅，没有窗，天棚上吊着几盏光秃秃的电灯泡。饭厅里摆着六张圆桌。吃饭时，十个人一桌，坐满了就开饭。当时，连小孩在内，能坐四桌左右。

饭厅旁边是一间开水房，服务员每天只送一次开水，喝完了就得自己提着热水瓶去打。我不喜欢喝茶，因此，很少下楼打开水。但是每天我都要下楼到水房里洗衣服，洗完后，把衣服晒在屋顶的平台上。

那时，政府对主要日用生活品实行配给制，按月向居民发粮票、食油票、肥皂票、糖票、鸡蛋票、肉票。每年还发一次布票、棉花票和线票……

我们在招待所里就餐，食用方面的票，就不发给个人了。至于布票，规定每人每年只有一丈多。买被里、床单、衬衣、衬裤、棉毛衫、棉毛裤，甚至袜子、毛巾等棉制品一律要布票。这些情况，我们在国外时毫无所知，好多东西都没有带回来。一人一年只有一丈多布票，哪里够用？因此，招待所领导叫我们开一张需要买的棉制品单子，多给每人发一些布票，作为照顾补助。

像这样的条件，比起我们在国外的生活，用北京话来说，“差老鼻子了”。但大家安之若素，我从未听见任何人抱怨过一句。只是有些人住了一年半载，仍没有分配工作，呆得腻味，未免焦急。

留学生的工作都由政府分配，名曰组织上安排。学理工的，比较好分配，一般有几个月就去了工作单位。学文法、哲学、经济的，属于意识形态方面，中国不需要资本主义那一套东西，没有合适的工作岗位，往往要改行做别的事情，这样在招待所等待的时间就



长了。

有一对从日本归来的夫妇，先生是中国人，学法律的，太太是日本人，不懂中文，这就更增加了一层困难。他们在招待所里住了一年多，还生了一个小孩，却一直未分配工作。后来这位先生被分配到某大学教日语。

有些人虽然有了工作，但因学非所用，不能施展所长，政治运动一来，还得挨整，后来只好又离开中国。

一位出生在越南的王先生，成长在巴黎，并在那里受的教育。王先生从未到过大陆，汉语说得不太流利。他在法国是一位工程师，回国后被分配在一所外语院校当法文教员。

国门一开放，王先生立即申请出国，他于 1973 年带着太太和儿子返回巴黎。在一家公司任高级工程师。

出国前，我和一位同事到他们家话别。王太太问我们是否会和他们通信？我们两个都说："不大可能。"我们甚至没有"勇气"去机场送别。

王太太是 20 世纪 30 年代著名电影明星"东方标准美人"徐来的女儿。徐来和她先生唐生明响应周恩来总理的号召，于 50 年代回国定居。只因徐来认识江青，洞悉江青在上海滩的风流韵事，"文革"时，江青就将徐来关进监狱，几年后，徐来病死狱中。

我们住进招待所不久，领导就把我们的护照收走了。

在招待所，每个人都要写自传。规定从七岁写起，要详细写出本人出身、家庭成员、学历、工作经历、政治背景、宗教信仰，还要写出父母、兄弟姐妹和亲朋好友的情况。尤其是在港、台、海外的亲友，更要写得详细，并称之为"海外关系"。

这种自传都要归入本人档案，转送到工作单位。

每个人都有一袋档案，里面除了自己写的自传外，还有组织上的调查、鉴定等。人走到哪里，档案就跟到哪里，直到寿终正寝。



我们住在招待所里，政治学习是首要任务。二楼有一间敞亮的阅览室，里面摆着一些报纸和杂志。只要没有别的活动，大家就在那间房子里学习。第一次进阅览室，我还闹了一个笑话。我拿起一张《人民日报》，立即问旁边的人：

“是谁把其余的《人民日报》拿走了？”

“咦！不是在你手中吗？”

“这只有四版呀！其余的呢？”

“《人民日报》就只有四版，哪有什么其余的？”（现在这种情况已大大改变了。街上许多报摊，摆放了各种报纸杂志。）

在国外，每天的报纸都是几十版，周末报纸更多，光是副刊就可以打发一个星期天了。

回国后，打开报纸一看，登载的都是粮食产量比上年翻了一番啦，某炼钢厂日夜奋战，钢的产量比上年增加了百分之几十啦，等等。这样的新闻有几分钟就一览无余。政治学习主要是学《人民日报》社论以及党和国家的政策等，由一个人念，大家逐段讨论，每个人翻来覆去都是重复报上的话，令人感到枯燥得无以复加。

招待所的领导有时组织我们去参观工厂、学校，或观光游览名胜古迹。

天安门广场是参观的第一站。我们被告知，这个广场比莫斯科红场还要大，纽约的时代广场更是无法与它相比了。

毛主席的像高高地挂在天安门城墙上，广场北面还有四幅巨像和毛主席像遥遥相对。

“从左数第二个大胡子是谁？”我问桐斌。

他悄声回答：“那是恩格斯，你不知道？”

“恩格斯？没听说过。倒是见过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照片。怎么没有孙中山先生的肖像呢？”



招待所的人告诉我们，只有节日才悬挂孙中山的像。

我最喜欢长城。爬上长城，极目眺望，蓝天和大地连成一片，这种壮观的景象令我倾心。

桐斌对我说："我们应该感到自豪，我们的祖先几千年前就创造了这样的建筑，我们这些后代也应该为祖国多做些贡献，使中国在科技方面进入世界先进行列。"我没吱声，只沉浸在靠近我爱人身旁的喜悦中。

天坛的建筑和回音壁，也令我俩赞赏不已。我和桐斌各自站在回音壁的一端：

"喂！桐斌，听得见我说话吗？"

"非常清楚，像是打电话一样。"

真是好玩极了。每次我们去天坛公园，都要到回音壁去打一次"电话"，乐此不疲。

当我们外出时，由招待所的领导做向导，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要讲解一番。当大家爬到长城上远眺，他就在旁边说：

"原来这里是破砖残瓦，满目疮痍，是解放后人民政府重新修建的。"

在颐和园昆明湖上泛舟荡漾时，他讲：

"这里解放前劳动人民是很少进来的，他们连饭都吃不饱，哪有钱买门票逛公园？"

他这种处处不忘对我们进行思想教育的精神，实在令人佩服。

每隔一段时间，招待所的人就征求我们对他们工作的意见。大家提得最多的是希望早日参加工作。此外，不少人对于把我们冠以"从资本主义国家回来的留学生"这个头衔不太满意。我们中大多数是克服重重困难，才得以返回祖国的，却被戴上了"从资本主义国家回来的留学生"这顶帽子，有点接受不了。（改革开放后，出国留学的人成千上万，他们中有些人在取得绿卡后回来发展，政府对他们表示欢迎，为他们创业提供各种方便，同时，从来不称呼



这些人为“从资本主义国家回来的留学生”了。毕竟时代在前进，人们的思想和政府的政策也都在改变。)

有些时候，提意见的人不多，招待所领导就点名请人发言。一次，他问一位一直沉默不语的地理学博士有何意见？那位博士思索片刻后说：“我认为‘爱人’这个称呼有点肉麻。”

他的意见引起了哄堂大笑。大家都说他“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他一板一眼地说下去：“这个称呼不但肉麻，概念也不清楚。到底爱人是妻子、丈夫，还是情人？”

据招待所的人解释：一般来说，结了婚才称为爱人，没结婚的是对象。

“一般女朋友呢？”

“那就是同志嘛！”

博士仍然没弄明白。

一位留学生见状插话：“对呀，老兄。你现在是单身，工作后托人介绍一个对象，结为伉俪后她就成了你的爱人了。但愿你能找到一个如花似玉、温柔可心的爱人，大家同意我的看法吗？”

“同意。同意。”

如果这位博士仍在的话，他一定会注意到，现在人们是这样介绍自己的配偶：“这是我太太。”“这是我先生。”对年轻女士一般冠以某某小姐的称呼。

1958 年春节过后不久，桐斌奉聂荣臻元帅之命被分配到国防部刚成立不久的第五研究院工作。那时，他在南郊的工作点正在筹建，没有地方安家。因此，我们家住在海军医院隔壁的大院里。我们的套间有一间客厅、一间书房、三间卧室，再加浴室和厨房。

我们的家具都是由公家提供的，客厅里有沙发、地毯、茶几、电话。书房里一面墙全是书柜，桐斌对这排书柜最为欣赏，很快就摆满了他那些宝贝书籍。卫生间里还有个浴缸，令我十分满意。



主卧室里只有一张双人床，一张三屉桌和两把木背椅子。我建议买一个五斗柜来放衣物，桐斌欣然同意。我们进城后，我挑了一个造型极为简单的桃花木五斗柜，这是我们惟一的家具，直到今天，我仍然保留着这个五斗柜。

这种住房条件，在当时算是上等的了，而且房租低廉，包括水、电费在内，不到桐斌工资的百分之八。

此外，凡是国家职工都有公费医疗，看病不花钱。我们院内还有卫生所，看个小病，打个针什么的，不用走出大院，实在是方便之至。

领导迟迟没有给我安排工作，我曾几次提出要求：

“我一向工作惯了，在家闲不住，再说，也从来未失过业。”

领导一再向我说明：

“已经为你爱人安排了工作，你要耐心等待分配，这可不是失业，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没有人失业的。”

于是我只好在家里等待分配工作。

说是闲着也不尽然，当时偌大一个中国组织十分严密，家庭主妇由居民委员会管，居委会由党支部领导工作。

我们几座楼住户的小组长，是位中共党员，一名粗壮的北方农村妇女。她缠足又放开，走起路来咚咚地飞快。小组长喉咙粗嗓门大，说话乡音又重，刚开始接触时，我不太听得懂她的话，几个月后才逐渐习惯。

我们一搬进来，小组长就跑来问我报了户口没有。

“报户口？怎么报法？”

“让你爱人在单位开一张介绍信，然后到派出所报户口。取得户口本以后，再到粮油办事处办理粮油供应本，有了粮本，才能领粮票。要不然，你们吃什么？”

“那好，谢谢！请问贵姓？”

“叫我老王好了！”



老王又郑重其事地补充：

“哦！别忘了，领了粮本后，还要到副食店领副食本，买个豆腐、粉丝和火柴什么的，都需要它。”

老王说了一大堆，把我搞得晕头转向，只好一件件慢慢地去办吧。

桐斌回家后，我将这些事讲给他听，他歉意地告诉我，组织上安排他们新来的工程师到全国各大工厂参观，因此这些事只好由我来办理了。

“你要去外地？去多久？留下我一个人，人生地不熟的怎么办？”

“这是组织上决定的，不能不去。大约两三个礼拜就回来了。我每天给你写信，好不好？啊，差一点忘了，我给你买了一本小说。”

这是一本新出版的小说《青春之歌》，是讲一个女学生参加抗日爱国运动的故事。它的作者是电影明星白杨的姐姐杨沫。这是我回国后看的第一本中文小说。我翻了一下，准备晚上入睡前看，但想到要一个人守着这几间空房时，就感到莫名的怅惘。

后来发现，空闲的时间并不多，因为小组长几乎每天都要到我家来一次。虽然我一再声明，我是暂时在家，很快就会分配工作的，但她不管那一套：

“你没上班前，就得参加我们的活动，政治学习更是必不可少。”

说完她又加上一句：

“今天下午拔草！你们南方人蹲着不习惯，可以带个小凳子坐着拔。”

下午，我下楼一看，已经到了十几名妇女，她们差不多都带着小凳子，在楼前路边拔草。在北京，就连公园里也很少有草坪，更不要说居民大院里了。据说野草招蚊子，故而我们经常拔草。这样一来，地面变得光秃秃的，反而不美观。而且，一下起雨来，满地



都是泥浆。(当然,这是老皇历了。现在北京种了很多树木花草,我尤其喜欢绿色的草坪。)

有一天,老王像往常一样,推门就进。

"明天来检查卫生!"

"查就查吧! 我反正天天都打扫卫生。"

"楼外的卫生也要查,我们先搞好外面的卫生,然后再各家搞室内的卫生。"

我拿起大笤帚和大家一起清扫大楼周围及人行道。

回家以后,我又仔仔细细地擦玻璃和地板。有人对我说:查卫生时,专门查床底下,柜子底下这些死角,还用手摸,有一点灰尘都不行。我将所有的房间都打扫得干干净净。累了,就看看桐斌从外地给我寄来的信,他对祖国各地的描述,令我神往,对我的牵挂和思念,令我感动。我不由得对着来信发呆,好半天才接着打扫。

第二天,查卫生小组果真来了。他们每间房子都仔细检查,壁橱、柜子也都打开来看,任何地方都找不出灰尘,他们很满意,在我家门上贴上一张小红旗,上面写着"卫生之家"。

桐斌外出参观回来之后,看见了小红旗很高兴,夸了我一大顿,说我如何如何能干,还连声说:

"辛苦了,辛苦了。你一个人打扫这么多房间,我在外面一点忙也没有帮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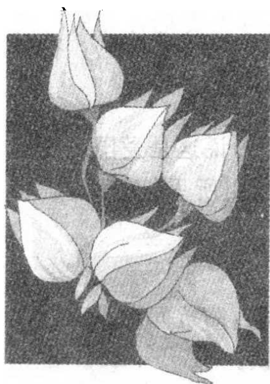
我心里美滋滋的,口中却说:

"没什么。你知道我从小就爱干净。"

接着,我满怀希望地问他:

"你以后能天天回家吗?"

"恐怕不行,事情太多了。不过办公区每个星期三晚上放映一次电影,我可以趁人家看电影时回家,你耐心等吧! 那边的宿舍楼一盖好,我们就搬过去。"



屋顶赶麻雀

初夏的一天，小组长老王向我们传达文件，说是毛主席号召全民开展“除四害”运动。我知道老鼠、苍蝇、蚊子是害，但是我从未听说过麻雀也是一害，想到这里，冲口就问：

“麻雀怎么能成为一害？”

老王挖苦我说：“看来我们这位彭同志没有到过农村，麻雀吃粮食，当然是一害。”这时，我明白了，以后还是少开口为妙。

老王接着就布置任务。她说：“前一阵虽然拔过草，但蚊子还是有，今天要用‘666’熏蚊子。”

有人问老王：“怎么熏？”

“把所有的门窗都关上，把吃的东西盖上，点燃了‘666’就赶快离开屋子。”

“听说‘666’冒的烟，有强烈的味道，会不会对人体有害？”

“回家以后，把门窗打开，通一会儿气，不就完了吗？”老王快嘴



利舌地回答。

老王又宣布："每家都得准备苍蝇拍，每天要把打死的苍蝇上交。"

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女同胞低声对我说：

"我孩子上小学，每天也要上交苍蝇，教师说这是爱国卫生运动。老师的话，小孩句句照办，他天天跑到厕所里打苍蝇，脏得要命。"

那时，北京的公厕不用水冲洗，确实很脏，蹲坑间也没有门隔开，虽然大家都是女的，但是我们还是不习惯。

近年来，已经大为改善，很多公厕有专人负责清扫，干净多了，也有门隔开了。

在国外，衡量一个主妇是否讲卫生，厨房和厕所的整洁列为首要。

现今我国好多人已注意到这一点，许多家庭洁白的厨房里都安装了抽油烟机，卫生间瓷砖，抽水马桶，再加上热水淋浴器，一应俱全。只是有些人只顾自家漂亮，将一些杂物堆放在楼道里，极不雅观，也不安全。

另一位也凑过来：

"我的孩子也要交苍蝇，我怕他弄脏了手，不小心放在嘴里，容易生病，只好替他打苍蝇，包在纸里让他交给老师。可是我自己也有上交任务，所以一天不知要花多少时间打苍蝇。"

大家在下面七嘴八舌议论纷纷，老王大声嚷嚷，叫大家安静：

"同志们，我们要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坚决、彻底消灭'四害'。"然后，老王发鼠药，叫每人回家毒老鼠。

"组长，我们是否也要上交死老鼠？"

"不用，只交老鼠尾巴就行。"



她接着问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我们就开始布置下一个任务。”

老王布置大家打麻雀,她再三强调,这是一场战争,只许胜利,不许失败。院子里每个角落都分配有人站着,手里拿着铁桶或脸盆敲打。我被分配爬到三楼屋顶上,手持一根竹竿子,上面系着一块红布,一面挥动竹竿,一面不停地来回走动。

人们的敲打声、呼喊声,吓得麻雀到处乱飞,没有地方可以停留,只得不停地飞,直到累死为止。每个屋顶上都有人,像我一样挥动竹竿,来回走动。这个时候,我不由得想起美国一首流行歌曲“Sparrows on the Tree Tops”,它是形容麻雀从这棵树上飞到另一棵树上玩耍的情景。它曲调轻快,歌词欢畅,我记得美国女歌星Doris Day,就是因唱这首歌走红的。正当我想得出神时,只听楼下一声大喊:

“喂!怎么站在那里不动啊!?”

喊叫声提醒了我,不能认为麻雀好玩、可爱,它是“一害”,必须消灭。于是,我又挥着竹竿来回地走动。但我心中却止不住地在想,这种“人雀之战”,只能在中国发生,如果在一个人口稀少的国家,麻雀没累死,人早就累死了。

这种人海战术的威力,使麻雀几乎绝迹了,只不过究竟谁是“人雀之战”的胜利者,几年之后就有了新的结论。

有些事情不能违反自然规律,麻雀虽然吃粮食,但也吃害虫。从那以后,由于麻雀稀少,破坏了生态平衡,虫灾愈演愈烈,这时人们才认识到,不该对麻雀宣战。后来,就用臭虫代替麻雀,作为一害。

除了中午回家吃饭以外,我一整天都在屋顶上赶麻雀,这样一连折腾了三天。我对桐斌抱怨:

“在屋顶上来回走动,头很晕,也不敢往下看。”

他关切地问:“你已经怀孕了,为什么不告诉他们?我们所里



怀孕的同志都可以照顾，不干重活。”

“我不愿意跟他们讲，你能否催问一下有关部门？请他们尽快给我分配工作。”

1958年，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办了一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兼任校长，绝大部分教员由科学院调入或兼课。华罗庚、吴有训、严济慈、钱学森等科学家都在科大兼过课。

郭沫若不经常到校，日常工作由教务长主持。

学校有时还请一些名人来校做报告，如陈毅、吴晗等。

不久，我被分配到该校教英语。我在美国时，做信托投资的事，回国后，很想干本行，可当时中国没有这个行业。说心里话，我不喜欢教书，在国外也没有执过教鞭，但闲住在家里的滋味我可是尝够了，虽不情愿，也只好勉为其难地去教书了。

科技大学坐落在北京西郊八宝山公墓附近，走进学校大门，迎面只见两幅几米高红底白字的大标语。一条写着：“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另一条写着：“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不言而喻，这都是毛主席的话。

学校离我们家较远，我又有身孕，校方为照顾我，在一间三人住的宿舍里，给了我一张床位，以便我中午休息。

在大学教书，通常上完课就可以离开学校，在家里备课。但是，科技大学的外语教研组却不按常规办。

当时外语组有俄、英、德、日等语种，负责人是一位年轻党员，他刚刚被提升为组长。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这位组长规定，每天8小时，除了上课时间外，必须在办公室里坐班。组里的教员对这种做法极为不满，有些人在私下里小声嘀咕：

“什么时候听说过教员有坐班制？”

“哼！完全是形式主义，办公室人来人往的，哪有在家备课清静！”

尽管大家背后议论，但无一人敢向这位组长提意见，因为他是



党支部书记兼教研组组长。人们对上一年反“右派”的情况记忆犹新，那时，有不少人仅仅因为给支部书记提了尖锐一点的意见，就被打成“右派”。因此，谁也不敢得罪他。大家只是在背后发发牢骚，仍然规规矩矩，一下课就回办公室坐班。

一个星期五的中午，我和两位教员一起走出办公室，准备到食堂打饭回宿舍吃。在路上，我随便说了一句：

“今天是星期五，要是在美国，明天就不用上班了，美国是一周五天工作制。”

一位中年教师一本正经地说：“我们学校也是一周工作五天，每星期三、六下午不是没有课吗？”

小杨，一位年轻的女教员，不以为然：“那可不一样，我们星期三、六下午政治学习，不能缺席，故而我们还是一周工作六天。”

“小杨，我是说我们一周上五天课。政治学习比上课更重要，多学习点有好处。你呀！太年轻了，不知道旧社会的苦。在旧社会，毕业就是失业，不像现在，你大学一毕业，就分配了工作，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这位老师摆出一副长者的面孔在教训小杨。

我怕她俩会吵起来，就急忙解围：“我对旧社会不太了解……”还未等我说完，该老师就急不可耐地打断了我的话：

“你怎么会不了解旧社会？你不是刚从美国回来的吗？难道美国是新社会不成？”

我加快步伐，头也不回地说：“对不起，我的政治觉悟不高，弄不懂什么新社会旧社会的。”

小杨紧跟在我的后面，气呼呼地说：“这个人是怎么回事？说得漂亮，只会教训别人，工作起来，却是挑三拣四，一点也不比别人积极。”

“别提她，快吃饭了，谈论这种人会使我们倒胃口的。”

小杨是一位身材娇小，皮肤白皙晶莹的上海姑娘。大大的眼睛，一头浓密的秀发，性格活泼，又能歌善舞，非常讨人喜欢。



小杨大学毕业后，和一位同学共偕连理，那位男生是印尼归侨。

1959年，小杨丈夫家发来一封婆婆病危的电报。那时，中国和印尼的关系不错，政府批准他们伉俪去印尼探亲。他俩去了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据说小杨原先在香港定居，后来又去了欧洲，由于英语好，找到了一份待遇优厚的工作。

我在学校时，也碰到一些不愉快的事。一次，我们组长传达中央文件，传达完后，又作了说明：

“这件事还没有在报纸上公布，请大家保密，尤其不要对外国人讲。”

几个人同声说道：“我们又不认识外国人，怎么对外国人讲?”

这时，组长的眼睛向我飞快地瞥了一下，可能还不到一秒钟，但引得全组人的目光都向我射来，因为谁都知道，组长最后一句话是冲着我来的。

这种不信任，不把我当作自己人的态度，令我疑惑不解。但我容忍下来，而且暗下决心，要认真参加政治学习，改造思想，以便使自己的思想跟同事们更接近。我相信有一天，他们会把我当自己人看待的。

一天晚上，桐斌回家，请我给他缝两个垫肩。我问他为什么突然想起要垫肩。他说：

“过两天要到十三陵去修水库，要挑土，怕不习惯，肩会痛，我想带上垫肩，做到有备无患。”

十三陵位于北京北部的昌平县，那里有十三处明代皇帝陵寝，故名十三陵。当时毛主席号召全国大办水利，北京水资源贫乏，要在十三陵附近修一座水库，为北京城供水。所有机关、学校、工厂，都派人轮流去水库参加劳动，为时一至两周。十天以后，桐斌从水库工地回来，虽然时间短暂，但他的脸晒黑了，也瘦了些，我不胜关切。



“劳动很累吧!”

“头一两天是特别累,后来就好一些,大家都热火朝天地干,晚上工地上也灯火通明,这种大规模的劳动场面,确实令人感动。”

“你们所里一位女同志也去过水库劳动,前两天来串门,她一再说你劳动卖力气,拚命地干,真看不出你是不久前才从国外回来的。”

“像毛主席、周总理这样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也去了水库参加劳动,我出点力又算得了什么?”

我正沉浸在回忆中,法医和军代表从解剖室走出来,将我拉回到现实。他们两人还是没有讲话,但是从他们的眼神中和脸上我看出了极度的同情和悲伤。

我向法医要解剖的结果,他们说要写一个书面报告交给军管会,以后再转给我。于是,我只好和两位军代表乘车返回南郊的家。

沿路经过的街道、房屋、甚至树木,无不令我触景生情。我们刚回国时,桐斌从家里去上班,不就是经过这条路线吗?在我的周围,依然弥漫着他的气息。拂面的晚风是他,天上的繁星是他,路旁的高树是他,周围的一切是他,全是他……

然而,事实令我心碎,就在几天前,桐斌和我还是成双成对,而今,只剩下我一人,像一只失去爱侣的孤雁,还有三只雏雁需要我照料。但愿桐斌在天之灵给我智慧,给我力量,让我能挑起原来由我俩挑着的重担。

桐斌,你就在我身旁,我知道你在。

你帮助我吧!

请你帮助我吧!



超英赶美

寂静的马路上，只有少数车辆和行人。我们的车，风驰电掣般地飞驶，速度一点也不比急救车慢。

1958年秋天的一个深夜，我就是乘一辆急救车驶向协和医院的，车速也像现在一样的快，只不过那时我正要临盆，是怀着喜悦和期待的心情坐在车上。

桐斌从十三陵水库回来不久，就更加忙碌了。且不说平时经常晚上不回家，连星期天也很少在家里落脚。不少单位请他去指导炼钢，因为那时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已经开始。

1957年11月，毛主席率领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及全世界共产党会议。在此不久前，苏联将两颗人造地球卫星送入太空轨道，在人类征服太空方面比美国领先一步。赫鲁晓夫得意非凡，会议期间，提出了苏联15年赶上和超过美国的



口号。可能是受到了鼓舞,毛主席在会议上发表了“东风压倒西风”的讲话,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并提出中国15年在钢铁产量赶上或超过英国。

1958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乘风破浪》的元旦社论,第一次提出了超英赶美的任务:要在15年内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品产量赶上和超过英国。在这以后,准备再用20年到30年,在经济上赶上并且超过美国。

此后,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钢铁元帅”升帐,一马当先,万众奔腾,大搞小高炉,土法炼钢和群众运动,简称为“小、土、群”。

全国机关、学校、工厂、部队、农村搞起了上百万个小土高炉,到处找矿源,没有煤炭,就砍伐树木。九千万人上阵,轰轰烈烈,热火朝天[①]。

在北京,各机关大院里也都架起了小高炉,没有原料,就动员大家把铁锅、铁钳、铁铲等一切铁器奉献出来。但是绝大部分人哪里见过高炉,更不知道如何炼钢了。亏他们想得出来,竟然请桐斌这位洋博士去指导土法炼钢。尽管桐斌在忙着筹建一个研究所,但大炼钢铁是政治任务,他当然是有求必应。不管白天、晚上,还是星期天,他都被请去指导土法炼钢了。

桐斌虽然知道我产期临近,却忙得无法回家。

一天深夜,我感到阵痛,看来,孩子要提前出生了。可是桐斌没有告诉我他办公室的电话号码,有时偶尔问一下他的工作,他都闭口不谈,说是组织上不让讲,神神秘秘的,搞得我一点办法也没有。

“文革”时,红卫兵小报上,把七机部的事登出来了,我恍然大悟,噢!原来桐斌是研制火箭、导弹和卫星的。

现在,我快临产了,怎么办?只好去敲邻居家的门,向他们求



援。他们见我的痛苦状，也急得团团转，提出先陪我去医院，再设法通知桐斌。深更半夜的，打扰人家已是过意不去，我婉谢了他们的好意，只请他们帮我要了一辆急救车。

到了协和医院急诊室，值班医生见我只身一人深夜来诊，他们口中虽然没说，但心里会不会认为我丈夫不近人情？我却最了解桐斌，知道他深深地爱我。但是，工作是如此紧张，使得他无暇顾及到我了。

第二天，当我从分娩后的劳困中醒来时，第一眼看见的是捧着一束鲜花的桐斌，真是难为他了。在那时，整个首都，只有崇文门内有一家鲜花店，一般都是老外光顾。

他虽然满脸倦容，但仍然掩盖不住做父亲的喜悦。

“桐斌，看见孩子了吗？长得跟你一模一样。”

“是吗？太好啦！听说，女儿像父亲，长大了有福气。”

他那布满血丝的双眼，高兴得眯了起来，接着笑吟吟地问我：

“我们要不要给孩子起个名字叫超英。”

我的天！怎么会起这个名字，我急忙制止他：

“光这个医院就已有好几个新生儿叫超英、赶美的了。我看还是另外给她取个名字，你回去想想好吗？”

我接着说：“取好名字就请医院开一张证明，赶快给孩子报户口，以便办理粮油手续。”

我又补充：“上了户口和领了粮油本才能订牛奶。据说六个月以下的婴儿可以订到半磅牛奶。啊！对了，还要办副食证，凭证每月可以买两袋糕干粉。”

桐斌见我还要往下讲，急忙做了一个篮球裁判“暂停”的手势说：“停！停！夫人命令真多，说话又快，让我怎么执行啊！我现在就去办，否则在夫人出院前没完成使命，我的日子可不会好过的。”说完他喜气盈盈地离开了病房。

回去后，桐斌买了一瓶葡萄酒，约弟弟来家，一同庆祝喜得



千金。

我在医院住了一周就出院了。当时，工作妇女都有56天产假，不扣工资。孩子出生以前，我一天也没有休息过，为的是产后能有更多的时间休养。

保姆回南方探亲，尚未按期返京，我只好自己带孩子。这孩子真怪，天天晚上哭。桐斌怕我休息不好，又怕吵醒邻居，总是抢着起床抱她，轻轻地拍着，嘴里还哼着自编的催眠曲："小宝宝，不要吵，小宝宝，不要闹，快快睡个觉……"

"桐斌，你唱些什么呀！"

"嘘！不要讲话，她已经睡着了！"

天天晚上如此，真是舐犊情深！

在产假期间，我发现食品供应越来越紧张。不要说肉、鸡、蛋等难以买到，就连豆腐、粉丝也得凭证定量供应。食油每人每月只有5两。这样一来，人们几乎全靠粮食度日。而成年人粮食定量，一般每月只有30斤左右，其中30％是面粉，20％是大米，其余50％是粗粮。

在北京还算是幸运的，粗粮比例只有一半，主要是玉米粉。在外地，不仅粗粮的比例高，而且供应的除玉米粉外，还有高粱米、白薯干等。

回想在美国时，有些女友，每次就餐必计算"卡路里"，但仍然照胖不误。她们若想减肥，应该来中国，按北京市民的食品定量，半年下来，不但个个苗条，还可以省去做健美操，吃减肥药的费用，岂非一举数得？

当然，困难时期早已过去了。我国现在的女孩子不是也在减肥、做健美操，新潮男士们不是也在喝减肥茶、跑健身房吗？他们赶上了好时代，如今不但食品丰富，穿着也绚丽多姿，一位20世纪50年代到过中国的老外前几个月来华访问，深为惊讶地对我说：

"嘿，现在北京的女孩子一个个都这样漂亮，比以前的好看



多了!”

可不是,今天的女孩子无忧无虑,她们生活得多潇洒,多自在!

回忆当时食品供应紧张,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1958年8月,毛主席视察河北、河南、山东,发出了“人民公社好”的号召。于是全国农村闻风而动,只一个多月时间,就基本实现了公社化。

与此同时,报纸上出现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等豪言壮语。农村到处“放卫星”,粮食亩产达到几万斤、几十万斤,甚至一百万斤的神话。我清楚地记得,《人民日报》刊登的一幅照片,几个小孩站在田里的稻谷上,说明密植生产获得了空前大丰收。

不过短短数月,为何粮食又突然紧缺了呢?原来,这一年,由于成千上万的壮劳力炼钢去了,庄稼没有人收,好多地方把粮食烂在地里。再加上人民公社大办食堂,人们分文不交,就可以撑开肚皮吃饭,没有多久就把公社的粮食吃光了,食堂只得关门。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过去报纸上亩产十万、几十万斤的报道,都是虚假的。当时,桐斌和我对此却深信不疑。因为我们都相信《人民日报》,相信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当然更坚信毛主席提出的“三面红旗”[2]是伟大的和正确的。而且认为,共产主义就要到来了。

产假休完以后,我返回科技大学。学生和教职员工都在“大炼钢铁”。还有一部分人则去“兴修水利”。恰好这时,我家要搬往南郊,距离学校更远了,不可能每天回家。又由于我产后营养不足,身体越来越差,无法参加炼钢或修水利,因此,只有申请留职停薪在家休养。

突然,车子在家门口戛然停住,把我又拉回到1968年来。此



时，天已大亮，我告别军代表，回到了家中。孩子们仍在熟睡，我没敢惊动她们。在走进卧室前我下意识地往卫生间望一望，空空的浴室幽暗萧索，窗帘低垂。想起桐斌被害的惨状，不禁泪如雨下。谁能料想我们这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一夜之间就支离破碎。

1963年调到外交学院分院以前，我一直在家休养。与其说是休养，不如说是度荒。我整天在家想的，做的，都只是一件事，就是怎样使全家人填饱肚子。在那几年，我才算真正体会到了“民以食为天”这句成语的含意。

一天，我去附近一朋友家串门，此家的男主人是高级工程师，妻子是护士。我们一面聊天，女主人一面用秤把米称好，放在不同的碗里，然后放在锅里蒸。我十分惊讶地问：

“你这是干啥?”

她苦着脸说：“我家有两个上中学的儿子，如果不分着吃，他们会把全家的粮食吃光的。”

我默然。接着，女主人唉声叹气地说：

“作为妻子和母亲，我这样做，心里并不好受。”

然后，她又小声地告诉我：“我们在北京还算幸运的，听说外地都在吃野草、谷糠、树叶这些东西啦。前几天，我有个亲戚从河南逃荒到北京，说他们那里已经饿死人了。”

女主人这话使我感到意外又骇然，因为报上从未刊登过这一类的消息。

随着时间的推移，北京的食品供应越来越差，有的人为了能买到一点猪骨头而去巴结卖肉的。为了能买到几块豆腐，不得不奉承售货员。“走后门”这种做法，大概从那时就慢慢地滋长起来的吧！

售货员服务态度之差，令我目瞪口呆。他们口口声声说“为人



民服务”,但实际并非如此。“顾客至上”这个概念,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人人心里都清楚,这里是售货员至上。顾客买东西,得小心翼翼地观察售货员的脸色,如果他们在一起聊天,千万不能打断,否则开罪了他,不管你买什么东西,所得到的回答,就是两个字:“没货。”

改革开放后,服务态度有所好转,尤其是买东西的时候,但如果退、换、或维修,则是另一种脸色了,尽管许多店打出“顾客是上帝”这个口号,听说有的饭店还让小姐们跪着服务。说实话,我并不欣赏这种过偏的口号和做法。我认为只要货真价实,不出售伪劣商品,对待顾客彬彬有礼,则大家就会心满意足了。

一次,我拿着肉票去买肉,售货员随便切了一块肉丢给我,我赶紧赔着笑脸说:

“同志,能不能麻烦你挑一块好一点的?”

售货员马上面孔一板:“哪有这样挑挑拣拣的,你不想买就算了,下一个。”

排了半天队,我岂能不买?再说,我们的肉票、鸡蛋票都是在指定的副食店买,永远是那几个售货员,这些票证过期是要作废的。故此,我只好忍气吞声地买了那块颜色已发暗的肉。

碰到这种情况,我不止一次暗自思量,这固然是因为僧多粥少,物资匮乏,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铁饭碗”的缘故。售货员心里明白,不管他的态度多么坏,他的饭碗是打不破的。

令我感到高兴的是,现在商品充足,“铁饭碗”已不复存在,售货员已经不像以前那样高高在上了。

回到家中,我对桐斌大发牢骚:“独此一家,没有竞争,怎么会提高服务质量?怎么能改善服务态度?”

桐斌笑嘻嘻地对我说:“牢骚太盛防肠断啊!”他不同意我的看法,说什么关键是应该加强售货员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教育,提高人



们的觉悟，等等。

“好了，别说教了，你去买几次菜试试，我保证你不会再教训我了。”

这位邻居又轻声告诉我，郊区有些农民家里有鸡和鸡蛋，不愿按公价卖给国营商店。她打算吃完午饭，去碰碰运气，并约我一同去。

饭后，我们走了好远，沿途虽有高高的树木和金黄色的田地，但我们无心欣赏，甚至都不多讲话，只是一门心思想买到食品。走访了好几家农户，才买到一些鸡蛋。后来在一家社员家里好不容易看到有几只母鸡，但他要二十多元一只。

“同志，太贵了吧！一个大学毕业生每个月的工资才47元。”

这位社员说：“一点也不贵，就剩下这几只母鸡了。我保证会有人来买的。”

这位社员可真是个经商人才，懂得市场经济和供求关系。但是，我们两家都已很久不沾荤腥，还是咬咬牙，各人买一只鸡，快步回到家中。

回家后，我把鸡收拾好，炖了一大锅汤，平时我都会放一些料酒，几片姜和一根葱，现在已无这些佐料。虽然如此，孩子们走进厨房时，都眼巴巴地看着锅，吸吸鼻子说：

“好香啊！”

隔几分钟就问：“妈妈，鸡煮熟了没有？”

“还得等一会儿，爸爸下班回来，鸡就炖好了。”

我们母女都站在门旁，望眼欲穿地等待着桐斌的归来。他一露面，孩子们欢喜雀跃地围上去：

“爸爸，今晚有好菜！”

“爸爸，有鸡吃！”

桐斌揭开锅盖一看，惊讶地问我：



“你这是从哪里买到的鸡?”

我告诉他,是从农民家里买的。他听后不悦地说:

“现在组织上规定,干部不能买私人食品,何况我是所长,更应该遵守这个规定。”

“那你要我怎么办?把这锅鸡退给社员吗?”

他心平气和地说:“供应紧张只是暂时的,我们应尽量克服一下。”

他又告诫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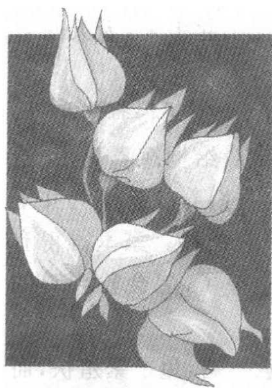
“以后千万别买私人的东西了,好吗?”

说完,他自顾自地吃饭,连一口鸡汤都不肯喝,孩子们可不管三七二十一,稀里哗啦,连鸡带汤吃个精光。

注释

① 参见虞宝棠主编:《当代中国四十年纪事》,第 146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

② 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1963 年,在中共中央成都会议上,毛主席把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概括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洋鸡专家”

国营商店无鸡出售，桐斌又不许我到私人处购买，别无他法，只好自己养鸡。

我买了好几本关于养鸡的书。什么莱亨鸡、芦花鸡、洛岛红、九斤黄等中外各种鸡的名称，都背得滚瓜烂熟。后来决定养莱亨鸡。据说，莱亨鸡原产意大利，是蛋鸡名种，一年365天，天天下蛋。

我逐字逐句照书本介绍的方法养鸡常常被桐斌取笑。说我成了“养鸡博士”。一天，科技大学的同事来看我，谈话中很自然地讲到“吃”，又扯到人们都在养鸡的事上。桐斌诙谐地告诉我的同事：

“洁清把鸡侍候得可好啦，还是洋派的，先喂水，再喂食。”

同事们听后忍俊不禁，笑出声来。我心中暗打主意，好呀桐斌，等客人走了再和你算账。

书上说，鸡的脸变红，就是下蛋先兆。一天，孩子们闹嚷嚷地



说："鸡的脸红了，妈妈快来看呀！"我跑过去一看，原来是几只小母鸡，脸红卜卜的，十分可爱。我们大家高兴得拍起手来，天天盼着鸡下蛋。

好不容易第一个带着血丝的蛋生下来了，全家乐得奔走相告，以为每天都会有鸡蛋吃了。我想像着每天早晨给桐斌煮鸡蛋，给孩子们蒸鸡蛋，既不用油，又有营养。可惜，我们养的莱亨鸡并不是天天下蛋，原因很简单，要鸡下蛋，必须喂它饲料。家里难得有一点剩饭、剩菜什么的，即使有，也都让我吃掉了，怎会轮到鸡的头上。

后来，有人提出养兔子，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兔子繁殖快，而且以草食为主，野草到处都有。我心想，这下可好了，我们很快就会有兔肉吃了。遗憾的是，我不会剥兔皮，只得半途而废。

养不成兔子，只好另打主意。我们楼后面有一块空地，桐斌在那里种了一点玉米。据说，"金皇后"和"白马牙"这两个品种产量高，但南方糯玉米好吃。孩子们一听，争着说"种好吃的"，他们的建议当然一致通过。

由于家家都种了一点粮食，猪粪竟成了宝贝，公家的猪圈几乎用不着饲养员打扫，很多人抢着去收猪粪做肥料。我们抢不到猪粪，只好学邻居的样，冬天将孩子的粪便沤在地里，让它发酵，春天用它做肥料。

这时桐斌的弟弟结婚，他母亲从无锡老家赶来为他们办喜事，住在我家。桐斌太忙，很难抽出时间陪她老人家，只好由我替他尽孝。我陪老人游览北京的名胜古迹，但婆婆小脚，走不了长路，对游公园什么的兴致不高，说是不如在家抱孙女。我设法弄到一些糕点给老人，老人家一口也舍不得吃，全给孙女了。

有一晚，桐斌在家，妈妈忽然兴发，要看我们跳舞。桐斌欣然同意，对妈妈说："我和洁清为你老人家来一场表演，好吗？"我闻言，马上进卧室换上我和桐斌第一次见面时穿的白衬衫，海蓝色的



太阳裙，宽宽的腰带和鞋皆为海蓝色，当我走出来时，桐斌已将桌椅推向墙边，唱机上正放着我们那次舞会的定情曲——“蓝色的多瑙河”。看来，桐斌和我心灵相通，都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了。

见到我，桐斌眼睛一亮，他微微躬身问：“我可以请您跳舞吗？”我用手将太阳裙向两边拉开，向他甜甜地一笑，“非常高兴，先生。”

我们随着乐曲翩翩起舞，就如我俩初见时一样。妈妈很欣赏，十分开心。

夜里，在枕旁，桐斌一再谢我对他妈妈好。

“这是我应该做的。我这样爱你，当然应该孝敬你妈妈。可惜她老人家来得不是时候，没有什么好吃的。”

“只要有儿孙在膝下承欢，比吃山珍海味还会令妈妈高兴。”

这是我第二次和婆婆相处。

回国不久，桐斌要带我回老家无锡见他妈妈。

“桐斌，你一个人去吧！我好紧张。你知道我这个人嘴不甜，我怎样称呼你妈妈？怎样称呼你老家亲戚朋友？”

“这还不简单，我怎样称呼谁，你就怎样称呼呗！”

“你妈妈会喜欢我吗？我从小没有母亲，不会和老太太打交道。”

“‘洋’媳妇总得见公婆啊！我妈妈非常疼我，一定也会喜欢你的，别瞎紧张了，好不好？”

后来，我才知道，桐斌母亲对我这个“洋”媳妇回家也很紧张，要大哥向桐斌打听我的生活习惯、饮食爱好，我喜欢吃什么菜，等等。桐斌回信说，我这个人不讲究，他爱吃的菜我都爱吃，不必另行准备。

我们从北京坐火车，十多个小时就到达无锡。桐斌大哥到车站来接我们。他租了一条小驳船，从无锡市到老家沿途经过了好几座古老而美丽的拱圆型石桥。两岸全是垂柳，远处还有很多桑



树。有一些妇女在河岸边洗衣，并且相互泼水打闹，一派江南水乡风光！

到家后，大哥推开门，妈妈从客厅里走出来，她高高瘦瘦的个头，头发整齐地向后梳着，满面笑容地看着我们。我立即跟着桐斌称呼“妈妈”。老人家很高兴，看来对我这个儿媳妇相当满意。

桐斌妈妈为我们的归来花费了不少精力。她老人家特地为我们布置了一间“新房”。一张特大的床，床四角有四根柱子。床前有一块踏板，踏板两头各有一个小柜子。床上高高地挂起一顶大蚊帐。床架上还有几个抽屉，更妙的是，床后面竟然摆着一个崭新的红漆马桶！

“桐斌，快来看，这张床怎么这样多的附件。你来看呀，床后面还有一只红漆马桶，这个马桶是新的，还有油漆味呢！”

他忙走过来，捂住我的嘴说：

“轻一点，这些家具都是妈妈为我们在无锡定购的，待会儿你一定要好好地谢谢她老人家，别忘了啊！”

桐斌姐姐也从江阴赶来和我们团聚，她一进门就说，“桐弟，你这十年一点也没变。哟！你身上穿的还是我织的毛背心呢！”

桐斌笑眯眯地说：“我只要穿上这件背心，就会想起姐姐在我出国前日夜为我赶织的情景。”

见到他们姐弟这样亲热，我很感动。同时，我也暗下决心，一定要为桐斌织一件毛衣。

桐斌姐姐带来一篓螃蟹。席间，她先倒一杯酒，放在一个空着的席位上，是孝敬桐斌在国外时故世的父亲的。然后，她又挑出蟹黄放在我碗里。

“姐姐，洁清有过敏症，不能吃螃蟹。”

“呀，真遗憾！我们阳澄湖大闸蟹味道特鲜，全国有名。”

夜里，在大床的蚊帐里，桐斌悄悄地向我耳语：“还紧张吗？”

我转过身，面向他，用手乱揉他的头发，没作回答。



这次桐斌妈妈来北京，正是我将桐斌，将我俩对妈妈的爱奉献给她老人家的好时候。但是桐斌妈妈不适应北京的气候，不久即返回南方。

一个礼拜天，我趁桐斌在家，就对他说：

“咱们进城到饭馆吃一顿饭，改善改善伙食怎么样？顺便可以给孩子们带一点吃的回来。”他欣然同意。

那时，没有私人开的饭馆，国营饭馆也为数不多。以前就拥挤不堪，更不用说灾荒之年了。

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到城里一家西餐馆去。刚回国时，有人在那里宴请过我们。该饭馆环境幽雅，大玻璃窗上挂着有松竹梅图案的白纱窗帘，餐桌铺着雪白的桌布，服务员身着笔挺的制服，极有礼貌，令人有宾至如归之感。

这次进去一看，面目全非。没有桌布，没有菜单。桌子周围坐满了人，还有些人站在就餐者身后等着入座，这种情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真奇怪！怎么这么多人一下子全都爱吃西餐了呢？”

排在我旁边的一个人接过我的话茬：“唉！现在只有这种饭店才有肉菜，谁都是几个月不知肉味，管他中餐、西餐，能打一下牙祭就不错了。”

饿着肚子站在食者后面等座位，真不是滋味。但桐斌劝我，既来之，则安之，我们只好耐心等待。

好不容易等到座位，我们刚坐下，背后就有人围立了。这种观看别人就餐又被别人观看的状况，我十分不习惯。饭也吃得别别扭扭。

菜单已被取消，只见一块小黑板上写着：

“咖喱牛肉饭十元一份。”

抬眼一望，我才发现，人人面前摆着同样的饭菜，令我忍俊不



禁,噗哧笑出声来。

“这才叫做人人平等啦！大家吃一样的饭菜。”

我们要了四份饭,吃了两份,另外两份带回去给孩子们开荤。

回到家里,已经是下午四五点钟了。刚一进门,一个孩子抢着问:

“妈妈,给我们带回什么好吃的?”

另一个孩子小大人似地教训她妹妹:“你就知道吃,这里有一张妈妈的包裹通知单啦。”

我接过一看,原来是香港亲戚寄来的奶粉等食品,海关通知我带证件去领取。

当时在北京,六个月以上的婴儿就不供应牛奶了,两周岁的幼儿连糕干粉(米粉干)的供应也取消。我正发愁,这下可好啦,可以给孩子冲奶粉喝了。

桐斌把从饭店带回来的份饭,分给孩子们去吃,然后叫我和他一起回到我们卧室,让我坐在床上,和我商量:“我们不要这个包裹好不好?”

“为什么？这是亲戚好心寄给我们的,我又没有让他们寄。”

“他们的好意我们心领了。我们接受海外寄来的食品,岂不会让外国人造谣,说我们挨饿了?”

我们不是在挨饿吗？为什么不能讲？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这不和阿Q一样吗？明明是秃头,却忌讳人家讲。甚至连秃、光、亮这些字眼都不许提。我心里虽这样想,却没对桐斌讲。我猜想他一定有他的苦衷。

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我才知道,接受国外寄来的食品被看作是“政治立场”问题。

其实早在“文革”前,七〇三所的个别领导就想把桐斌打成阶级异己分子。我别无他法,只好到海关请他们把包裹原封不动地退给了香港的亲戚。



仲夏的一天，邻居匆匆忙忙跑来告诉我一个好消息，说是食品店来了冰棍。我拿起钱包，带着孩子就往商店跑。当时，冰棍是抢手货，市面上不易见到，故而大家一拥而上，根本不排队。我好不容易挤进人群，给孩子买了冰棍。她们有滋有味地吃起来。

突然我发现我的钱包没有了，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钱包里不仅有钞票，还有我们全家当月的粮票、油票和副食品证，等等。老天，丢了钱倒在其次，粮票可是我们赖以活命的啊！如果丢了，我们全家这个月可怎么过？我飞快地跑回商店，此时冰棍早已卖完，两位售货员在那里“侃大山”。我问他们是否有人拣到钱包，里面有不少粮票。他们回答说没有。

一位售货员说：“这个年头，谁拣到粮票都会当成宝贝，还会交给我们？”

另一个说：“说不定扒手趁人多拥挤掏了你的兜。”

话虽如此，我仍不死心，在地上到处寻找。返家后，乱翻一通，哪有钱包的影子？

桐斌回家时，看到家里乱七八糟，而且我满头大汗，忙问我是何缘故。当我将丢失粮票的事告诉他时，他也感到事情严重，立即帮忙一起找。

孩子们倒是比我明白，在旁边说：“妈妈，买冰棍时，您不是从钱包里取钱的吗？”

其实内心深处，我何尝不知道钱包已被扒手偷走，但我总盼望有奇迹出现。

“怎么办？桐斌，你快点想办法啊！”

“唉！我有什么办法？”

沉思片刻，他建议：“也许你写一份检讨，我交给领导，看看能否补发这个月的粮、油票。”

“我为什么要写检讨？又不是我的过错。”

“总是你不小心才被人偷走的吧！你若不检讨，我怎样向领导



提出这件事呢?”

我心急如焚,饭也吃不下,左思右想决定去找桐斌的上级张院长。张院长住得离我们家不远。我进门时,他刚吃完饭,还未走出餐厅。我们一起走进客厅,我顾不得坐下,就告诉他粮票被扒手偷去的事。他请我坐下,并倒了一杯茶,叫我慢慢说。我哪有心思喝茶,一叠连声地说了起来:

“姚桐斌这个人实在没办法,前些日子,因为小孩身体弱,我到社员家买了一只鸡,他不但一口不吃,还批评了我一顿。我在香港的亲戚寄来一些奶粉,他硬是逼我退回去。今天,我丢了粮票,他又要我写检讨。我有什么过错?难道我愿意丢掉粮票不成?”

张院长见我一口气说了这么一大堆话,不禁笑了起来。他劝我:

“桐斌同志对自己和家人要求严格,这么做还是对的。你丢了粮票,着急的心情我也能理解。我看这件事让我们明天研究研究,你先回去休息吧,别着急。”

第二天,桐斌回家假装生气地说:

“好呀!你竟然跑到领导家里告我的状。”然后把补发的粮、油票交给我,又千叮咛、万嘱咐:

“你可要好好收起来,不要把所有的粮票都带在身上。下次再搞丢,领导就不会照顾了。”

那几年,怎么样搞到吃的变成了头等大事。桐斌的单位派人到内蒙古打黄羊,又到山东买了些大葱,然后分给职工。我嫌羊肉味膻,从来不吃。桐斌一再对我说,黄羊肉和其他羊肉不一样,没有膻味。任他说破嘴皮,我就是不肯尝一口,气得他干着急,第一次面红耳赤地责备我:

“你这人真是怪,身体不好,有了黄羊肉又不肯吃,真拿你没办法。”

他又命令我:“别挑食了!快吃!”见他如此生气,我只得乖乖



地勉强自己硬吞下几块黄羊肉。

那时，因为大家营养不良，体质弱，各单位规定要早睡觉，以减少体力的消耗，而我有神经官能症，躺在床上总也睡不着。

一天晚上，桐斌去办公室。我把小孩哄睡后，在厨房里收拾东西，感到一阵头晕，昏倒在地上。醒来一看，发现自己躺在床上。桐斌抱住我，一脸关切："好一点了吗？我已打电话给卫生所，请他们派一位医生来出诊。我工作忙，没有好好照顾你，真是对不起。"

我仰视他，轻言柔语说："正因为你工作繁忙，应该由我照顾你，看你多瘦啊！"

饥荒越来越严重。中国火箭工业白手起家，全靠像桐斌这样的科学家在干。国家关心他们的身体状况，规定供给桐斌每天半磅牛奶，每个月两斤猪肉、两斤鸡蛋、两斤白糖和两条烟。桐斌从来不肯独享，硬是把牛奶给孩子们喝，肉和鸡蛋全家吃。他工作繁忙，晚上又经常加班，看到他消瘦的面孔，我不禁一阵一阵心酸。幸亏每月还给他发几斤黄豆，我把它们当宝贝似的，每早煮一点，放点盐。桐斌 40 粒，每个孩子 25 粒，但是桐斌总是剩下一些，说他消化不了。灾荒过后，他才告诉我，他是怕我吃不到，故意留给我的。

这时，医生进来了，给我检查了一下，说我的肝有点大，要我过几天去医院验血。

医生说我的腿也有点浮肿，主要是营养不良所致，要我好好休息，加强营养。我原本就在家里休养，只好再申请延长。但是，我们连肚皮都填不饱，怎么谈得上营养？我们又哪里有办法搞到食品来加强营养？



白浪滔天

第七机械工业部有一段时间属于军队建制，其党委书记则称为政治委员。

七〇三所第一任政治委员是湖南人。这位政委精明强干，有一定的组织能力，文笔、口才都不错，而且注意学习业务知识。他还组织了一些干部，请桐斌讲课，但此人后来调离了七机部。

不久，从南方调来H继任。

H是高中毕业生。不懂科技，却自视甚高，俨然自己就是共产党的化身。

他到任后，没有把工作抓好，被上级叫去谈话。他当面没吱声，心里却不服气，转身就对别人说怪话，挖苦领导：

"真是乌鸦落在猪身上，光看到别人黑，见不到自身黑。"

他虽然不懂科技，但搞阶级斗争可是行家里手，轻车熟路。"七〇三所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硕士、博士好几十人，姚桐斌就



是他们的头头，情况复杂啊！”他说。

桐斌虽然有着丰富的与自然搏斗的学识，但在人类的厮杀中却显得那样纯真，毫无防人之心。他总是以自己那磊落的胸怀面对别人的恶意。作为七〇三所所长，桐斌主管全所业务。那时，七〇三所起步不久，光是专业分工就达几十种，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他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对个别人的诡计毫无察觉。

火箭技术是集合现代科学技术最新成就的一门综合性技术和系统工程。火箭的设计确定后，最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材料和工艺及电子设备。如果材料和工艺不过关，再好的设计方案都将成为纸上谈兵。众所周知，国外航天器出事故大多是因为零部件问题引起的，而归根到底，是材料的问题。

七〇三所的任务是研制火箭材料和工艺。一枚火箭有很多分系统，每个分系统又有数以万计的元器件、零部件，因此火箭材料成百种，上千项，包括金属、非金属、有机材料、无机材料，等等。

20 世纪 50 年代，我国的材料工业水准不高，连一些低合金钢都生产不出来，更谈不上航天材料了。因此，火箭材料的研制均是从零开始。其工作之艰难，是我这些年大量阅读有关书籍和采访专家以后才体会到的。

航天专家们告诉我，在研制出这些材料及其相应的工艺后，还需要对这些材料进行接近火箭使用条件的试验，如高温、超低温、振动、密封、烧蚀、腐蚀、老化等。

桐斌在国外主要从事液态金属凝固过程的专题研究，没有做过火箭材料工艺这方面的工作。他后来能成为我国火箭材料工艺专家，除了他渊博的学识和扎实的基础外，是与他分秒必争、孜孜不倦地学习以及从小培养的良好学习习惯分不开的。

从学生时代起，桐斌读书就做笔记。回国后，他坚持收集文献资料。直到现在，七〇三所还保留有桐斌的工作日记、资料卡片、



专题卡片和专业讲课稿等。

不论在国外还是国内，每到一地，桐斌总是热衷于逛书店，泡图书馆。我呢，兴之所至，有时也陪他到书店，买本小说什么的，但更多的是逛商店。我俩互不干涉，倒也自得其乐。

在家中，桐斌也是看书呀、作笔记呀，忙个不停。他告诉我，有时右手写酸了，就用左手顶住右手腕继续写下去。闻他言，我自愧没有尽到一个贤内助的责任。

“桐斌，你应该娶一个工程师做老婆的，至少她可以帮你抄抄写写，不像我这个门外汉，什么忙也帮不上。”

“还是你好，还是你好，你一回来就叽哩呱啦的，多热闹，多有意思。”

1960年夏天，组织上安排桐斌去北戴河休假，还可以带家属。

北戴河位于河北省秦皇岛市西南15公里，海滨有十几公里长，沙滩洁白，海水湛蓝清澈。气候凉爽宜人。每到夏季，不少北京和天津等地的人去避暑，中央领导也到这里开会，因为这里离北京近，乘火车几个小时即可到达。市内有许多宾馆和招待所。

我们住在一座用围墙围起来的大院子里。院内有好几个小山坡，各种不同形式的小楼依山而建，每座小楼四周都种了不少树木，红花青草，蓝天白云，景色迷人。我们一家被安排在一座小楼里，楼前有一条碎石砌成的小路，直通到海边沙滩。

这个大院由国务院系统管理。我们到达时，已经有一些中外专家在此度假了。

我们每天带着孩子去沙滩玩，桐斌和我轮流下水游泳，留一人在岸上陪孩子堆沙。有些外国儿童赤裸着身子做日光浴，或在浅水里打水仗。我们觉得很有趣，也让孩子脱光，一起参加他们泼水嬉戏。

桐斌爱好摄影，给裸体的孩子们照了不少相。也照了好些张



我和他穿游泳衣的照片。可惜在“文革”时，这些照片都被我付之一炬，以免被红卫兵抄家，拿去当“黄色”照片展览。

有一次，在沙滩上，桐斌向一位年长学者恭恭敬敬地打招呼：

“茅老，您好！”

原来他是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先生，茅先生是桐斌读交大时的教授。虽然已时隔十多年，师生二人谈起过去交大的情况，仍然津津有味。我在旁边听得也很开心，总算可以让桐斌在沙滩上多留一会儿，免得一回小楼，又去看他带来的书了。

就餐在自助餐厅，每个人打了饭，可以在饭厅里吃，也可以到外面吃。饭厅四周有一圈回廊，摆着很多桌椅。人们都喜欢在外面用餐，一则凉快，二则可以欣赏美丽的海滨风光。

去海滩时，大家一般只穿游泳衣，把手表等贵重物品留在房间里。因此，不知道时间，很不方便。

遮阳伞下，每天坐着一位穿着整齐的老太太，一个小男孩在她附近堆沙玩，我见老太太手上戴着表，曾几次上前打听时间，被桐斌发现了，埋怨我：

“你怎么去打扰许广平先生啊！”

我觉得受了委屈：“我什么时候打扰了许广平？我认都不认得她！”

桐斌无可奈何地苦笑：“真拿你没办法，你问时间的那位老太太，就是鲁迅夫人许广平先生，你不知道？”

经桐斌这样一说，我反而不好意思再去问许广平先生时间了。

我留心观察，发现他们一家都比较文静。儿子周海婴中等身材，很瘦。儿媳稍胖，皮肤晒得黑红。那个小男孩看样子才两三岁，大概在上幼儿园吧，很乖，总是自己玩，从不和别的孩子在海水里疯闹。这位不声不响的小男孩，就是鲁迅的孙子周令飞。

我们到北戴河时，恰好钱学森博士也在休假。钱学森是从美



国回来的火箭专家，当时是七机部副部长。他和夫人蒋英带着两个系红领巾的孩子。蒋英是一位音乐家，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

多年后，我和徐来的女儿谈起北戴河避暑胜地时，无意中提到钱学森和蒋英。徐来的女儿告诉我，钱学森和蒋英是由海外回上海结婚的，婚后又返回美国。她是他们婚礼上提花篮的小女孩，因为她的伯父唐生智是蒋英的父亲蒋百里（留学日本的军事理论家）的学生。

这真是应了一句话："人生何处不相逢。"不管到哪里，总归会碰到一些熟人的。

有一天，组织上安排我们去参观一座"怪楼"。所谓怪楼，其实就是一座小别墅，只不过造型奇特，既不是方正，又不是圆形，室内过道楼梯也是曲里拐弯的，别有情趣，与众不同。那天下午，我们一家和钱学森一家同去参观。

我们沿着滨海小道悠闲地散步。只见蓝天白云，粼粼碧波，点点白帆。这美丽的景色，使钱学森赞不绝口，他情不自禁地高声朗诵起来：

大雨落幽燕，
白浪滔天，
秦皇岛外打鱼船。
一片汪洋都不见，
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
魏武挥鞭，
东临碣石有遗篇。
萧瑟秋风今又是，
换了人间。

这是毛主席1954年夏写的一阕词——《浪淘沙·北戴河》。



钱学森背诵几句，说毛主席如何伟大，再背诵几句，说毛主席诗词写得多么高雅。对毛主席的崇敬颂扬之情，溢于言表。

在归来途中，桐斌问钱学森晚上是否去看豫剧。钱学森说：

“去，这样的好戏怎能不看，你们呢？”

我未等桐斌回话，顺嘴说道：

“我要带孩子，去不成。姚桐斌带来一箱子书……”

桐斌怕我唠叨个没完，赶忙说：

“我也去。”

那天晚上，桐斌果然去观赏了豫剧，回来后连声称赞。

桐斌兴致这么好，我也跟着高兴起来。其实，我对地方戏既不懂，也不欣赏。

回国后，看的第一场电影是吕剧《李二嫂改嫁》。电影里的山东唱腔和道白，我一句也听不懂。以前在国外一直看的是红男绿女好莱坞娱乐片，猛然一下改看工农兵的说教片令人难以接受。但是自桐斌那晚称赞豫剧后，我就留心观赏地方戏。后来看了豫剧电影《朝阳沟》，主题和《李二嫂改嫁》一样，也是鼓励青年农民自由恋爱，我觉得豫剧优美动听的唱腔，弥补了剧情的不足。

说起来也真巧，20 世纪 80 年代有一个时期，我和中国豫剧名演员常香玉住在同一座公寓楼里，我们是近邻。有时常香玉教孙女唱戏，我可以听得见。常香玉虽已年近古稀，但大眼睛，鹅蛋脸，年轻时的风韵依稀可辨。她说起话来，脆生生的河南腔，十分悦耳。有几次我想问她，1960 年夏天是否到北戴河演出，但总无适当机会启齿。

度假完毕回到北京后，桐斌又一心扑在工作上。当时聂荣臻元帅强调工艺的重要性。钱学森让桐斌写了一篇题为《火箭工艺的研究方面及理论问题》的文章。桐斌在文章中指出：在工艺技术范畴内，工艺是从设计构思通向产品的一座必经桥梁。工程技术



不断向前发展，必须辅以工艺的不断更新和提高。没有新工艺作为温床，新的设计思想就不能萌芽成长，成为重大的技术革新。火箭型号研究的质的飞跃，必须依赖于材料原件和工艺的改变；而材料和原件的改进，又重复依赖于工艺的革新。因此火箭工艺的研究发展，成为火箭发展的必要条件。钱学森认为这篇论文很好。建议刊登在内部刊物上。

1962年七〇三所正式更名为材料及工艺研究所。桐斌认为研究所不但要出科研成果，而且要出科研人才。特别是培养年轻一代，更是关系到祖国前途的大事。七〇三所虽然有一大批大学毕业生和一些留学苏联的博士生，但是他们实际工作经验不多，为了帮助这些工程技术人员成长，桐斌付出了巨大精力。他亲自讲课、指导，还从外单位请专家来传授知识。冶金界的元老李熏博士和两院院士师昌绪先生就到七〇三所讲过课。

桐斌不但培养工程师，对技术员、工人也很关心。直到他被害34年后的今天，曾在七〇三所工作过的人谈起桐斌时，对他仍十分怀念。

一位工作人员回忆说："每当我踏进这间实验室，就会忆起一件难忘的往事。那是20世纪60年代的一天，我坐在实验凳上操作万分之一天平。我蓦然回头，看见姚所长站在我身后注视我操作天平的动作，我有些慌了，手也不听使唤，咔嚓一下把天平放下。姚所长看出我的心思，连忙说：'小鬼，你是刚来的吧？'我站起来给所长让座。姚所长不慌不忙坐下，一面操作天平，一面耐心地给我描述正确的操作方法。

"姚所长还谈到实验员工作的重要性，说实验员工作像一颗小螺丝钉，它虽小，但关键部位离不开它。姚所长说许多科学家当初从事的工作就是小型实验，它琐琐碎碎，点点滴滴，平平凡凡，但没有这些，就没有以后的成果。当好一个实验员，关键问题是要确保自己所做出的数据准确，有使用价值。使科研人员敢于应用你做



出的数据，这就很了不起。

“听了姚所长一席话，我感到自己身上的担子很重，也为自己能作为一名航天战士而自豪。”

当年被桐斌昵称为“小鬼”的许多青年人如今已成为航天科技专家，这些是和航天事业创造初期桐斌的亲自教导和严格要求分不开的。

有一位老工人对我说：“我原先在工厂，没有在科研单位工作过。1963 年，我调到七〇三所不久，姚所长来到我们这里，我见到他时很拘束，因为在工厂，我从未和厂长交谈过。

“姚所长说：‘你是老工人，经验比较丰富，我们理论知识多一点，互相学习嘛。’

“姚所长还教我们怎样做试验记录，他告诉我们焊料测熔点的温度一定要准确可靠，才能使用。”

另外一位工人拿出他十分珍惜地保存多年的一张七〇三所便笺，纸张已经变黄，上面写着：

> 电梯工人同志必须对电机及电器控制盘时常打扫，防止灰尘积聚。
>
> 电梯变速箱需时常加润滑油，找一块大的塑料布将电器部分罩起来。

这几位工人满怀深情地说，姚所长的话使我们感到亲切，他的敬业精神更使我们钦佩。

一次，桐斌和几位工程师一起到西北地区出差，在火车上，大家热烈地讨论工作，竟然错过了站。为了不耽误工作日程，他们在茫茫黑夜里，手持木棍，在荒野小路上步行几十里，走回到了目的地。多年后，一位高工谈起此事时，告诉我，在途中，要过一座独木小桥，黑灯瞎火的，根本无法行走，他们只好手脚并用爬到对岸。



他无限感慨地说：

"我们那时刚刚大学毕业，可是姚所长是从国外回来的专家，竟能和我们一样吃苦，大家都对他更敬佩了。"

桐斌不但和他们同甘苦，也同欢乐。每当研究所举行联欢晚会这一类活动，他都尽量参加，有时，也和大家一起跳舞、扭秧歌。一次春节晚会，所里几个调皮的年轻人带头起哄，请桐斌表演节目。桐斌从一位老工人那里借来一件老羊皮袄，把它翻过来穿上，头上系一块白毛巾，从黑板旁拿起教鞭，做起赶马的架式，唱了起来：

达坂城的姑娘辫子长，
两只眼睛真漂亮，
你若是要嫁人，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
带着你的嫁妆，领着你的妹妹，赶着你的马车来呀！

桐斌大喊一声："嘿！"再把鞭子挥一下，又接着唱：

带着你的嫁妆，领着你的妹妹，赶着你的马车来呀！

人们没有料到，平日寡言少语，整日只知工作的他，竟然会当众表演。全场先是一惊，寂静了几秒钟，然后爆发出欢快的笑声、掌声。桐斌的这个节目成了当晚最精彩的一出。



研究＝re＋search

1962年春，广州越秀山已喷绿吐翠，玉兰花、茉莉花散发着幽香，好一派莺飞草长的南国风光。就在这春意浓浓的季节里，全国科学技术会议在这里召开，桐斌参加了由聂荣臻元帅主持的这次会议。

聂帅在会上谈道：

“大家集中到广州后，我先找少数科学家谈心，发现知识分子仍然顾虑很大。

“有人问我：对资产阶级这个提法如何理解？他们说，一提起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子女也受到歧视。从没有听到有人提谁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我觉得这个问题要解决，我请示了周总理。他说：‘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人民的知识分子。’”

聂帅在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科学家中，有着崇高的威望。他



的话使与会者受到极大的鼓舞，使他们更加信心百倍地工作。在聂帅主管国防科委期间，我国在火箭这个空白区域，得到了飞跃性的进展。

周恩来总理在会议期间做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周总理就外行领导内行问题做了详细的阐述。

周总理说："外行领导内行要有个范围。以前我们说外行能够领导内行，这是讲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领导……

"我们说外行能够领导内行，不是要外行去干涉业务，对业务确实不懂嘛！外行变内行要经过学习。就是学会了也要尊重专家，尊重群众的意见……"

周总理的讲话受到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就像春雨浇灌大地，滋润着他们的心田。虽然周总理离开我们已多年了，中华大地的知识分子谈起他时，无不充满着爱戴和思念之情。

同年3月6日，陈毅副总理在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会议上说："不能够在经过十二年的改造、考验后，还把资产阶级分子这顶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头上，因为这样做不合乎实际情况。"

陈毅说："应该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劳动人民之冕，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

听到这个报告的全体人员，无不欢欣鼓舞，热烈鼓掌。

遗憾的是广州会议期间，这三位首长的讲话精神，未能得到重视。

桐斌回来后，向单位领导作了汇报，领导只是让桐斌在专家中传达广州会议精神。

领导还指示："你们可以开神仙会，漫谈、漫谈嘛，不要急。"

当时，有些干部认为知识分子只不过是团结、利用、改造的对象。怎么一下子成了人民的知识分子了呢？他们对广州会议精神接受不了，更没有周恩来总理等人这样爱惜人才的胸怀。



桐斌从广州回北京后，兴奋异常，更加不分昼夜地努力工作。由于七〇三所大部分工作人员是新手，他们虽然学过不少专业知识，但是如何应用这些知识到实际中去，还需要掌握研究方法。因此，桐斌写了一篇文章《研究工作方法》，全文约长 25 000 字。钱学森对此文非常赞赏，评价极高，认为此文对整个导弹研究院的科研工作有重大的指导作用，推荐在院刊《研究与学习》上发表。

《研究工作方法》一文强调要按照科学规律办事，树立和培养科学的态度、作风、秩序和程序。文章指出：在进行任何一项研究工作之前，必须有充分的准备，有调查研究，有科学分析，有作业计划。在研究过程中，试验要系统地进行。试验后，要有分析、总结，找出规律和写出科研报告。

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人，英国科学家牛顿（1642—1727）曾说过，他之所以能有新发明，是因为他站在前人的肩上，是受益于前辈科学家。桐斌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在自然科学领域里，世界上有千千万万的前人做过不可估量的工作，流传下来的科学成果、知识和经验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我们必须很好地继承下来，再继续探索钻研，作创造性的发展。

在关于试验研究阶段的论述中，桐斌特别强调两个环节：

一是要认真细致追寻重要线索，解决主要矛盾。什么是研究，他风趣地说："在英语中，研究（research）一词的词根 search，意为寻找；词头 re，意为重复。可见，研究的过程就是反复寻找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过程。只有弄清难题所表现的各种现象，才有可能找出主要矛盾，使难题迎刃而解。"二是要有条理，一丝不苟。

桐斌说，如果不严格按操作规程做实验，不仅容易带来试验差错，引起试验时的质量事故，甚至会造成设备仪器的损坏和危及人身安全。

有一个星期六晚上，吃完饭后，桐斌按惯例，到办公楼去。当

研究 = re + search



他经过一个实验室时，见到里面有灯光，于是走了进去，只见一位年轻的工程师在那里看书，桐斌表扬了这位年轻人好学的精神，并和他攀谈起来。在谈话中，桐斌举目一看，只见室内东西堆得很乱，当时他就批评这位工作人员："这哪里像个实验室？明天是星期天，咱们大家来打扫一下，怎么样？"

翌晨，工作技术人员不敢睡懒觉，早早跑到实验室去。谁知，更有比他们早到的人，那就是桐斌，他已在那里动手干起来了。他和大家一起擦窗户、拖地板，同时还要求大家将器材标明，码放整齐。他说："东西放在固定的地方，你们做实验时就免得浪费时间东寻西找了。同时，应将化学物品标清楚并分开放，以免发生危险。"等他们将这些笨重的仪器搬动整理好后，桐斌才满意地离去。

桐斌还规定，进实验室，一律换上工作服、鞋、帽等。一位总工程师告诉我，现在大家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是不可缺少的规章制度。但那时并非如此，有人还把它说成是资产阶级的"穷讲究"呢！

桐斌要求技术人员做完实验，必须写详细规范的科学技术报告，他亲自审阅七〇三所的每一份报告，并作批改。一位高工满怀深情地回忆：

"姚所长对我们的报告看得可仔细啦！技术方面不必说，哪怕错了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也都改正过来。我至今还珍藏着姚所长在我一份报告上的批示。"

这位高工将桐斌的评语部分影印了一份给我留念。

但是这样的严格要求还是不够，比如，有人一面煽扇子一面操作十万分之一的天平，有人在调整实验室时错将科研资料当作废纸处理，大家说他一根火柴烧掉了两年的科研成果。

为了尽快地提高技术人员的水平，1962 年初，桐斌在七〇三所组织了一次"科研专题作风研究会"，把研究工作，技术学习，技



术管理与技术责任制三个方面的五十个好坏典型，七百七十多件实物展示出来，加以分析对比，使科技人员“加深对正确的科研程序和科研方法的认识，改进作风，在新的基础上，更好地出成果，出人才，为发展我国国防尖端事业更精更好地服务”。

一位高级工程师说，当时他的一份图表，因曲线画得不精确而被陈列出来。

我问：“你们不怪姚桐斌太不给面子吗？”

“据我所知，没有人对姚所长这种做法有意见，他是为了把工作搞好才这样做的。当时他不仅指出我的错误，还认真而详细地教导我怎样正确画曲线，以我的实例教育大家以免别人重蹈覆辙。再说，我的名字没有写上，只有范例作品才标上人名。”

这个展览使七〇三所的人受益匪浅，人们赞不绝口，引得其他研究所的人也来参观。

桐斌强调：为了及时了解现代科学的最新发展，必须广泛地阅读国外的文献资料，这就需要掌握外语这一重要工具。由于留学苏联的已经会俄语，他要求，所内技术人员必须学英语，因为很多科技资料都是用英文出版的。桐斌在所内开办了英语学习班，并亲自授第一课。这件事现在看来不值一提，不论官方还是私人都提倡学英语，不但小学一年级开设英语课，连学龄前儿童、居委会老太太、出租车司机也在学。可那时是20世纪50年代，国门尚未开放，而英国和美国都是非友好国家，提倡全所学英语，起码会被人当作“崇洋媚外”来批判，桐斌心中必然清楚这一风险，可他为了工作，毅然顶风而上。

当时七〇三所的一些技术骨干，现在都活跃在国内外的重要工作岗位上，他们不但精通业务，还纯熟运用一门甚至两门外语，这些都是在七〇三所时打下的基础。

“四人帮”垮台后，中国又重视科学，重视知识了。当年被当作



毒草来批判的《研究工作方法》这篇文章，现在已印成精美的小册子，并配以桐斌的照片，发到每一位新来七〇三所的科技人员手中，成为他们的必读物。

周恩来总理生前曾多次到七机部视察，并提出“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十六字方针。在周总理的关怀下，七〇三所克服了重重困难，获得了可喜的成果，对发展科学技术和尖端工业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有一种高温钎焊合金材料，当时的苏联在中苏友好时期，就对中国严加保密，不肯透露它的成分和工艺。苏联专家曾带着几分轻蔑、几分怜悯的口气说：

“材料成分嘛，不能告诉你们，其实就是告诉你们也没有用。这样吧，你们需要时，向我们订购好了。”

1960年，赫鲁晓夫撕毁合同，撤走在中国各部门的专家，并带走所有的图纸资料。当然，这时即使订购也不可能有了，这种材料成了发展航天材料工业的一只“拦路虎”。

桐斌他们咽不下这口气，在新型号火箭制造急需的情况下，桐斌亲自部署了这场战役。这就是18年后，在桐斌被追认为烈士的当天，全国科学大会上获得重大成果发明奖的高温钎焊合金。

没有生命的金属材料从一个耻辱的空白点变成为戴着桂冠的国家定型产品，不但凝聚了桐斌和七〇三所一些工作技术人员的智慧和心血，还像镜子一样映出了桐斌宽阔的胸襟和大无畏的气概。摆在他面前的困难不仅仅是工作上的，还有多倍于工作的人为灾祸。

除了产品的牌号外，桐斌他们没有任何资料作参考。但是，他们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反复分析实验，当年就确定了这种高温钎焊合金的成分。确定成分只是一个开端，还必须找出每种成分的比



例，在什么温度下才能使这种合金成为钎焊材料，以便运用到火箭发动机上去。

火箭发动机结构复杂，有些地方要求这种材料很薄，薄了又易脆，因此对温度要求得特别苛刻，只有在某一特定温度点上，才有可能使这种材料达到发动机使用要求。然而，他们最终成功了！

在科学的攀登上没有捷径可循，桐斌是如何带领众多科技工作者一步一步向着顶峰迈进的呢？

他首先召集会议，将不同的意见列为试验方案。这看起来平常，却需要决策人不怀丝毫门阀之见。桐斌一眼看出七〇三所条件不具备，立刻决定把实验人员派出去，到分布在全国的有关合作单位。

桐斌严格要求下属，一切按计划执行，每项实验都要有正规的记录。对关键的问题，无论多么细小，桐斌一定亲自动手。比如，向外单位借真空熔炼炉，就是他亲自去的。

当然，这里需要的不仅仅是勤勉的工作态度，首先是判断问题的能力。桐斌处理问题果断，各个方案，该否定的否定，该加强的加强。他从早至晚不分昼夜地工作，听取汇报，召集会议，处理问题。

有时周末我俩难得在客厅中小憩片刻，只要七〇三所的人员一来，我就知道他们又该谈工作了，立即知趣地离开。

桐斌从不和我谈论工作，只是说："工作真艰难呵，幸好我年富力强，精力旺盛。"

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桐斌对工作全心全意，毫无私心。他那时还没吃过挨整的苦头，既没有担忧什么"帝国主义的烙印"这种莫须有的罪名，更不会想到日后泼在他身上的种种诬蔑、不实之词。

桐斌总是说："这是我们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党，我又是一名共产党员，有什么可以顾虑的呢？"



但我们的科学家能这样一心一意地工作多久呢？到 1964 年底，桐斌已经开始挨整，手脚被束缚了。

高温钎焊合金投产，开始还好，后来质量越来越不稳定。桐斌怀疑是合金中某种材料的某种成分的纯度有问题。他建议从国外买一点样品做比较实验，这事要发生在今天，是天经地义再平常不过的了。但那时竟作为"洋奴哲学"被顶了回来。后来被国家授予奖状的高温钎焊合金，在当时竟被打成了"资产阶级科研道路"的典型。

桐斌毕竟不是一个脆弱的人，只要他认定为正确的事，就坚持去干。为了解决高温钎焊合金的质量问题，他立刻带人到上海生产这种材料的工厂去，了解一切细节。

进厂后，桐斌向该厂领导、技术人员和工人介绍产品的性能、用途，并循着生产线路，亲自进行调查。问题很快就找出来了，这个厂的设备太简陋，许多环节不合乎文明生产的起码要求。因此，正如桐斌所怀疑的那样，是某种成分不纯。

桐斌亲自去生产第一线解决产品质量问题，是顶着政治罪名的，但他不推卸、不指责，而以最诚挚的态度向厂方以及上海冶金局说明情况，提出建议。厂方非常感激，马上着手改进，前后用了四十多天时间，问题就迎刃而解。

正当桐斌埋头在上海解决难题的这段时间，对他的"资产阶级科研路线"的批判，已经从揭发到定性阶段。而就在产品质量问题临近解决的前夕，桐斌被抽调回七〇三所，接受批判。H 甚至动员和桐斌一起研制这个项目的工程师和桐斌划清界线。

我素来喜欢岳飞的《满江红》，在我写桐斌这篇回忆录时，我似乎听到了《满江红》那激越悲壮的歌声：

>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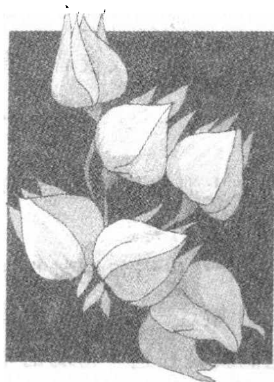
桐斌他们终于研制生产出两种性能优良的高温钎焊合金及其相应的钎焊工艺，使我国火箭发动机的独立研制成为可能。这种高温钎焊合金的性能和质量，在世界同类产品中也是佼佼者。直到现在，俄罗斯对它的成分仍然保密。

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上，七〇三所和上海协作单位因“高温钎焊合金及钎焊工艺”获得了重大科研成果发明奖。

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热泪不禁夺眶而出。想当年桐斌为研制钎焊合金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当他们开始这一工作时，中国的材料工业只是民用建筑钢材的水平。他们就是在这个薄弱的基础上，克服重重阻力，研究生产出高温钎焊合金，并使其成功地应用于我国以钎焊结构取代老式结构的液体火箭发动机产品生产中。

这种合金不但及时满足了中程火箭发动机研制生产的需要，后来又广泛地应用于远程火箭等各种发动机上，成为我国自行研制的王牌钎焊合金和普遍采用的钎焊工艺，使我国航天事业向前突进了一大步，也为我国随后一系列锰基钎料合金的发展打下了技术基础。

桐斌如能活到今天，亲眼看到他的科研成果已经开花结果，并受到了国家的嘉奖，他该会多么高兴啊！



在芬兰

1963年，我的身体状况逐渐好转，经检查，肝功能已恢复正常。我在家就呆不住了。可是一想到要回科技大学教公用英语，就感到索然无味。正好此时外交学院在西郊筹办了一所分院，从各单位抽调外语教员，趁此机会，我就设法转到了外交学院分院。

我去报到时，见到这所学校环境幽静，校园内外树木郁郁葱葱，一条小溪从校门外潺潺流过。水流清澈透底，可以看到溪里的鹅卵石。走进学校的大铁门，是一条宽阔的石板路，高高的白杨树排列两旁，迎面是一座六层高的红砖楼，掩映在绿荫之中，分外显眼，这就是学校的教学大楼。

这所学院规模较小，名曰外交学院分院，实际上，学生以学外语为主，外加政治理论、汉语和体育几门课。外语有英、日、法、德、西、俄等语种。



像这样的课程安排，和我在美国上大学时不一样。没有主修、副修之分，不是学分制，也没有选修课。

每个班有学生 15 至 18 名，一位主讲老师和一位辅导老师主管一个班。有时中途换人，有时负责直到学生毕业。

每两班还配备一名政治指导员，专门负责做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这些指导员都是中共党员。而在外语教员中，党员是屈指可数的。

校方安排我在英语系负责一个班。我们班共有 16 名学生，其中 4 名是女生。学生全都是“红五类”出身，也全是共青团员。

辅导老师姓景，年纪较大，20 世纪 40 年代曾在上海海关当过帮办，英语笔头不错，但有点重听，不适宜教课，后调至图书馆工作。组织上又安排一位中年的余老师来当辅导老师。余老师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

一般来说，辅导老师只管辅导，教课由主讲老师负责。从二年级开始就逐步增加课程，如精读、泛读、口语、听力、写作等。

我们班的政治指导员名叫顾波，广东人，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中共党员。因为管两个班，整天为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忙忙碌碌，听取和阅读学生的思想情况汇报，找他们个别谈话，给他们必要的指导等。顾指导员为人正派，对我们这些党外人士也不歧视。

每一个班的学生，都在一个固定的教室里上课、自习。学校的图书馆很小，只有几张长方形桌子，看看报纸、杂志还可以，倘若要安安静静地看书，就不如教室里有单独课桌方便，不受打扰。

老师新调进，校长要接见一次。校长是一位在延安时就办教育的老干部。他是东北人，中等身材，一年四季头上戴着一顶列宁帽。

校长谈话轻声细气。他喜欢个别谈话，而不愿做大型报告。和我谈话时，校长说我校是以“抗大”的办校方针来办校的。“抗大”全名为抗日军政大学，是共产党在延安为培养党政干部办的一



所学校。毛主席为其规定了三条教育方针:“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我觉得用抗大的办学方针来办外语院校未必合适,但未敢吱声。

北京的天气,说变就变。我上班没几天,突然变冷了。我不得不回家取条被子。从家里返回学校途中要转换几次公共汽车,正赶上几路车都拥挤不堪,我抱着被子站了两个多钟头,返校后身体即感不适。经校医检查,说有流产先兆,立即将我送进医院,结果仍没有保住胎儿。

我当时的心情,实非笔墨能形容。因为我一直渴望能有一个男孩。那时,桐斌正出国在外,到芬兰参加国际焊接学术会议去了,他知道我流产后不知会多么难过。

早在国外时,桐斌就是国际焊接学会会员,先后到过瑞士、荷兰、南斯拉夫等国参加学术会议,和各国科学家进行过学术交流。回国后,他就和国外学术界同行中断了联系。

1963 年,国际焊接学会会议在芬兰召开,桐斌率领一个代表团前去参加。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列席国际焊接学会会议。

在会上,桐斌不但会见了不少老朋友,也结识了一些新朋友。这个时期,桐斌对焊接疲劳(断裂)现象颇感兴趣,就此和同行们交流了经验。他的学术见解、纯正的英语,以及流利的德语,都给与会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交谈中,有位外国专家好奇地问桐斌:“你在我们国家工作那么久,为什么舍弃良好的科研条件回到中国?”桐斌毫不迟疑地回答:“我是中国人,当年出国留学,就是为了学成之后回去报效祖国。别看现在中国比较落后,将来一定会强盛起来的。”

会议期间,桐斌向组织委员会索取会议的资料,有一个会务工作人员,趁机提出了一些对中国不友好的问题。桐斌用标准英语



耐心地予以回答和解释，并对他说："你所提的问题，可能是出自你们报刊的宣传，而我的回答却是来自我本人的亲眼目睹，事实胜于雄辩。"桐斌实事求是的回答，使提问者信服了，他笑着递给桐斌所需的资料。

在回国途中，桐斌对同行的人说："外国人瞧不起咱们中国人，是历史的偏见。我们一定要奋发图强，将来拿事实给他们看。"

从芬兰回国后，桐斌大力主张我国科学家应和外国科学家保持联系，多参加国际会议，以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并向上级领导机关打报告，阐述他的看法。他的建议得到了主管部门的重视。以后，我国参加了国际焊接学会的年会，并争取到该学会第 47 届年会在中国成功召开。

1979 年秋天，我接到清华大学张维副校长的电话，他作了自我介绍后说：

"哎呀，好不容易才和你联系上了。"

我和张维素不相识，他来电话使我感到突然，宾寒暄几句后，就等待他说下去。张副校长告诉我，桐斌在德国亚亨工业大学的同事 D. Boenisch 教授前来清华讲学，多次打听桐斌的消息。当被告之桐斌已不在人世时，教授就提出要见见我和孩子们。

我问张校长："我怎么对他说呢？"

"你可以将情况如实告诉他嘛！"

"人家会不会说我是给'文化大革命'抹黑啊？"

张维说："'四人帮'已经垮台，现在可以讲真话了！"

翌日，我带着小罗汉去友谊宾馆，拜访了这位德国教授。他开门一见面，就说小罗汉长得极像她父亲，见到我们更加怀念旧友。

教授还告诉我，前两年亚亨大学校长访华时，就曾经到处打听桐斌的消息，他希望桐斌能回亚亨大学工作。但是，那时人们都说不知道桐斌的下落。



"这一次,我下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找到桐斌。我们过去一起合作得很愉快,合写过好几篇论文,我是多么希望能和他再一起工作啊!姚夫人,如果您不介意,能否将当时的情况详细地告诉我?亚亨大学的同事们都很怀念桐斌,我校俱乐部至今还珍藏着他和我们一起聚餐时的照片呢!"

我将桐斌惨遭打死的经过,从头到尾说了一遍。Boenisch 教授凝神静听。人们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德国人素以冷静闻名于世。但是这位教授听到一半眼睛就湿润了,终于没有能忍住眼泪,我和小罗汉更是泪如雨下。

教授一再向我道歉,说由于他的缘故,使我又谈起了伤心的往事。还问小罗汉长大后,要不要去亚亨大学学金属材料。小罗汉此时十五岁,十多年前她父亲被害的惨状已经模糊不清,这次听我一讲,她也哭得成了泪人儿,顾不上回答教授的问话……但教授的话提醒了我,应该让女儿出国留学,继承父志。

1983 年春,美国圣母大学教务长来华访问,他邀我带小罗汉到他们下榻的北京饭店见面。

当教务长在美国时,我就向他提出,希望将来我女儿有机会去圣母大学学习。

这次,教务长带着英语和数学的试卷让小罗汉当场考试,小罗汉的成绩很出色。

随后,教务长又对小罗汉进行了这两门学科的面试,虽然他提出了一些刁钻古怪的问题,小罗汉都能用英语应对自如,教务长十分高兴,一个劲夸我女儿聪明。

就餐时,教务长的儿子、圣母大学一位硕士生对我说:"我父亲以出难题闻名,也以慧眼识人闻名。您女儿扎实的基础和能用英语随机应对的能力都令我父亲欣赏。他一定会向校方大力推荐小罗汉的。你们就等待佳音吧!"



1983 年 10 月，小罗汉去美国留学。

1984 年秋，我飞往美国，抵达旧金山时，恰逢我国国庆，我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举行招待会，我也应邀参加。

会上，旧金山女市长 Dianne Feinstein 发表了热情友好的讲话。市长身着绿色洋装，把她棕色的头发衬托得十分漂亮，看起来好似美丽的红发一样。演说完毕，一位港客请她签名，我恰好在近旁，她朝我笑着走来，主动和我握手寒暄，非常热情，真不愧为一名女政治家。

我对她的讲话十分称赞，我告诉她："认识你，很荣幸，现在你是市长，说不定哪一天你会成为第一位美国女总统。"

她很高兴地为我签名，并谢谢我。看来，我的祝愿有实现的可能，女市长现在已是国会参议员了。

从旧金山飞抵芝加哥国际机场，四处张望没见到小罗汉！

"妈妈，我在这里。"

怪不得我没认出她，去年出国时，她头上梳着两把刷子，白衬衫，蓝裙子，很朴素的中国女生模样。时隔一年，不仅人长高了，衣着也不一样，一身牛仔衣裤，耐克鞋，披肩长发，典型的美国女大学生装。

小罗汉和我一起登上开往她们学校的"灰狗"长途汽车。

很远就看见了圣母大学办公楼金色的圆屋顶。进校园后，只见绿草如茵，古树参天，活泼可爱的小松鼠跳跃其间，蓝色的湖面上一群群鸭子游来游去，景色美丽如画。

我的一位美国大学同学在此任校长助理。她请我和小罗汉吃饭。为了照顾我们住在一起，她还安排我住该校一套住房，内有客厅、卧室和厨房。她对我说："佩妮，你们可以烧中国菜，可别忘了请我啊！"



小罗汉从圣母大学毕业后，即获耶鲁大学奖学金，攻读硕士学位。一年后，她就取得学位，然后到德州某公司求职。该公司一位总工程师面试了多位应征者后，认为小罗汉成绩突出，决定录用她。当她填表格时，人事部门才发现小罗汉不是美国公民，他们对总工程师说：

“我们公司的这个部门没有录用过非美国公民。”

“那我不管，你们为她申请美国公民好了。姚小姐是我近几天来面试的人中最优秀者。”

后来，小罗汉取得了绿卡。公司还为她读博士后的未婚夫办理了绿卡。小罗汉现在已结婚并有一子一女。外孙女出生时也是八斤七两，又是一个小罗汉！

从我同窗处得知我的另一位同班好友在华盛顿乔治敦大学法学院任职，她只有好友的地址，没有电话，因此，到华盛顿后，我只好星期天贸然去拜访她。

一按门铃，一位很胖、花白头发的女士出来，站在门口看着我，等待着。

“玛丽凯，你认不出我？我是佩妮呀！”

玛丽凯大呼一声“我的上帝”，将我拥抱起来。

“佩妮，你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我指指地下，“从地球的另一边，中国。”

“请进来，快进来，真是一个天大的惊喜，我们有三十多年没见面了吧！”

玛丽凯是我大学时的同班同学，分别多年，自然特别亲热。她如今是修女，在乔治敦大学法学院任职。玛丽凯单独住一栋小楼，楼下是客厅、书房、餐厅、厨房、洗衣室等，楼上两间卧室和卫生间，她请我当天就搬至她处，以便作彻夜长谈。

玛丽凯告诉我，由于她的内分泌失调，故而体重猛增。我却不



敢苟同她的看法，玛丽凯是一位烹饪能手，烧出的菜鲜美无比。我在她家时，大快朵颐，体重直线上升。她天天有此美食，无怪乎体重是大学时的两倍。

玛丽凯很热情地将我介绍给她校医学院的一位系主任，这位女系主任的先生是参议员，本人是教授，又是美国知名女权运动者，活动能力强，故而该系经费充足。

系主任办公室舒适、优雅，书架上放满了各种书籍，写字台后面的墙上贴着一副横条："I am my sister's keeper"（意即：我为我的姐妹们奋斗）。

系主任虽已年近花甲，却保持着苗条的身材。她肌肤胜雪，白里透红，一头黑发，再加上剪裁合体的套装和名贵首饰，真是风姿绰约，仪态万方，在大学衣着随便的教授中，好似鹤立鸡群。见到我后，她诚恳而亲切地说：

"佩妮，欢迎你重访美国，玛丽凯已经将你的情况告诉我了，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

我指指墙上的横条向她说："我就是这些姐妹中的一员。"她友善地一笑。

我接着说："我的一个女儿已经从医科大学毕业，现在是实习医生。她希望来美深造，可否来贵校进修？"

我随即将二女儿的成绩单和推荐信递给她。

系主任仔细地看了成绩单，又详细询问了我回中国后的情况，我们谈得十分融洽。系主任笑着说："你使我想起我母亲。"

虽然我知道这是赞美之词，听后仍然一愣，因为系主任看起来比我还大。

她接着说："我的母亲也是为儿女操尽了心。"

思索片刻，她说："现在已是秋天了，只有一位教授还有一个空额，我现在就陪你去他办公室面谈，怎样？"

真是无巧不成书，这位教授恰好在头一年访问过中国，对中国



印象深刻。

教授和我作了详谈，仔细询问了我女儿的学习、工作情况和英语水平。我告诉他，我女儿的英语比我稍差一些。他听后面露喜色，当即决定给我女儿一个读博士生的全额奖学金。

1985年老二整装赴美，玛丽凯去机场迎接，并为她在乔治敦大学附近一家教堂里找到一间不收房租的住房。

乔治敦大学在华盛顿西北乔治敦区。肯尼迪任参议员时，就住在该区。那时，他们全家都到乔治敦大学附近的天主教堂望弥撒。

在美国，医学院学生功课之重是有名的。幸亏有奖学金，老二只是周末打打工，两年后竟节约出一笔钱，将其男友小周从上海接到美国，并资助他上大学。

在这样艰苦的情况下，老二坚持读完了博士学位，现在在美国东部某大学医学院做研究工作，该大学为她和她先生都办了绿卡。此时，小周也已读完会计学课程，在该校谋了一个职位，他们现已结婚，并有两个男孩。

再回到1963年吧，我流产以后，在医院只住了一晚就回家休养。一天，忽然听见有人用钥匙开门的声音，我躺在床上大声喊道：

"谁？"

一个熟悉又亲切的声音回答：

"是我呀！"

听到桐斌的声音，我顾不上穿鞋袜，赤着脚飞快地跑去开门。

"是你回来啦！为什么事先没有告诉我？你是否想要给我一个惊喜？哎呀！我真高兴。"

进卧室后，我才告诉他，我已不幸流产。

"只要你把身体养好，我就放心了，其他都无关紧要。"



见到了桐斌，听到他这句话，我什么也讲不出来，只是把脸埋在他的怀里。他身上的热气，温暖着我的心房。

对他经常出差，桐斌总是感到内疚，想方设法弥补。回家时总带些东西，如天津的狗不理包子或大麻花什么的。

有一次去上海出差四十多天，回家时竟然替我买了一条红黑相间的羊毛长围巾。

虽然我可以在北京买到同样的围巾，虽然我不太喜欢红色和黑色作为上装，但我不愿扫他的兴，没有告诉他这些，只是说了声“谢谢”，他转身进入书房。

我想了一下，将围巾围上，并呼唤：

“桐斌，快出来，我有事。”

他急急忙忙跑出来问“什么事？你哪里不舒服？”

“我没有病，只是想让你看看我是否和平时不一样。”

他仍然关心地问：“你真的没有不舒服吗？”

“哎呀，人家将你送的新围巾围上了，好看吗？”

“好看，好看。”他一面说，一面向书房走去。他的心全放在工作上，根本就没好好看他老婆一眼，真是气煞我也！

几天后，我就去学校上班。为了赶在早晨8点钟到校，我一般5点多钟就起床，匆匆漱洗，吃早点，再去挤公共汽车。和往常一样，桐斌和我一起起床，然后送我到公共汽车站。在晨光熹微中，我一眼看见了他因睡眠不足眼边出现的黑眶，心中一阵酸疼。

“别送我了，你刚回国，时差还未调整过来，还是回去休息吧！”

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我工作太忙，和你在一起的时间实在太少了。我俩还是充分享受这难得相聚的片刻吧！”

由于他工作忙，我们俩是分离多于相聚。我自然希望和他多一点时间在一起，只是看见他双眼的黑眶，不忍心他早起，但是又拗不过他，他还是一如既往地陪我走到了车站。我转身上了公共汽车，找到一个靠窗的座位，轻轻地用嘴形说：“亲爱的，星期六



见!”他自然看懂了,微笑着向我挥手告别。

回国已经五年多了,但我这个人一向把丈夫放在首位,始终如一。我俩各有各的工作,我和桐斌不能天天见面,对我来讲,真是苦不堪言。虽然结婚多年了,我和他在一起时,仍如热恋时一样,心中激荡着缠绵的情意。

圣经上说,夏娃是上帝从亚当身上取下的一根肋骨造成的。也许是这个缘故吧,我离不开我的丈夫。

当我在家养病时,桐斌送给我一套《毛泽东选集》作为春节的礼物。这份礼物,人们不会认为罗曼蒂克,但我知道桐斌用心良苦,他是希望我能认真阅读,以便提高思想觉悟,适应国内的环境。为了取悦他,我就很认真地读起《毛选》来了。

毛主席的文章写得漂亮,文字通俗易懂,逻辑严谨,说服力强。尤其是那篇《纪念白求恩》的文章,使我感受极深。

诺尔曼·白求恩(Norman Bethune)是加拿大医生,1936 年,他亲赴西班牙内战前线,为反法西斯战争服务。1937 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率领一个由加拿大和美国医生组成的医疗队来到中国。1938 年,从延安转到晋察冀边区,在那里工作了两年。他那高度的工作热忱、强烈的责任感和为正义事业而牺牲的精神,受到了中国人民的极高的赞誉。1939 年冬天,在为一个患丹毒的伤员做手术时,不幸受到感染,终于医治无效而去世。

白求恩是个加拿大人,尚且能够帮助中国,我作为一个炎黄子孙,回国参加建设,理应加倍勤奋工作。当我在政治学习小组会上谈出自己的学习心得时,正巧抓政治思想工作的副校长来到我们小组,后来他让我在全校教职员工“毛选讲用”大会上作了发言。

虽然我回国从事教学工作后,天天站在讲台上讲课,但是,当我面对全校同事作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讲用”时,心中仍然很紧张,脸也红了,愣在那里。这时,我想起桐斌说过,做报告时,吐字要清



楚，讲话速度要慢，每句停顿一下。我稳定了一下情绪，将自己学习《纪念白求恩》这篇文章的心得，按照提纲，向大家报告。

我说："我虽然人在学校，但心总在家中，天天惦记着爱人和幼女。白求恩不是也有亲人吗？他怎么就能为革命事业放弃祖国舒适的生活及温暖的家庭呢？和白求恩对比，我感到惭愧。我一定要学习白求恩那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

我将心中所想的，如实向同事们报告，得到大家的好评。

回家后，我将这些情况告诉桐斌，他为我高兴，鼓励我以白求恩为榜样，继续努力。

桐斌既是我的爱侣，又是良师。他对祖国、对党的忠诚，对工作的热忱及他高尚的情操一直萦绕在我的记忆里。

在国外，桐斌自己节衣缩食，仍资助弟妹，对他们的学习更是关怀备至。他弟弟就读清华大学，妹妹去苏联留学。

桐斌回国后每月寄50元钱给母亲，以便老人家颐养天年。

他有一位寡居的姨母，未曾生育。年老后，受她养子夫妇虐待。桐斌得知，将姨母接到老家，陪伴母亲，并且负担她的生活费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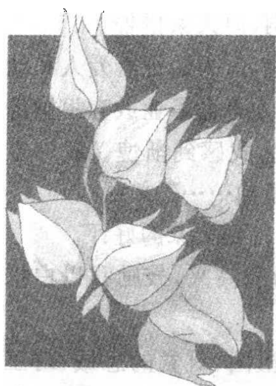
七〇三所有的同事手头拮据，向桐斌借钱时，桐斌总是毫不犹豫地相助。桐斌还曾多次将粮票支援孩子多的工人师傅。

桐斌对人，平等相待；对同志，热情相助；对工作，认真负责；发现问题，直言不讳，毫不姑息。

桐斌就是这样一个人。

时至今日，当我在人生旅途上碰到难题时，往往问自己：

"我这样做会合乎桐斌的心意吗？"



奉献

桐斌日日夜夜紧张地工作，他想方设法提高工作效率，对瞎指挥和松松垮垮、拖拖沓沓的工作作风深恶痛绝。他常说：

“把浪费在这方面的时间，用在科研上有多好！”

1962年秋，黑云压城。国内各单位的政治气氛越来越紧张，H召开七〇三所党委常委会议，对桐斌进行批判，他采取车轮战术，事先组织几个人在会上轮流发言，这种批判会有时长达十多个小时。

做好科研工作，本应具备一定的条件。“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句话是人尽皆知的。七〇三所建成以后，经上级批准，桐斌从国外购置了一些设备。H调到七〇三所后，对此事表示不满，他认为去国外购置设备是贪大、求洋、求全。

他说，不购买高、精、尖的仪器同样可以搞科研嘛。他举着手



中的茶杯说“我这个茶杯用了多年,还不是照样能用吗?”

在他的主持下,七〇三所购置的设备,有的以低价转卖给其他单位。有的干脆拆掉丢在室外,任凭日晒雨淋。上述种种事情,现在听起来好似天方夜谭,但 H 当时硬是做出如此匪夷所思的荒唐决定。

桐斌主张有计划按比例地安排当前研究和预先研究。他认为材料研究应先于火箭设计试制,不仅应考虑现有型号的火箭材料,同时应开始为新型号的火箭材料作准备。

桐斌列举了当时苏联和美国火箭技术发展的经验后说,研究与发展所需周期较长,设计与生产所需周期较短,如果研究与发展能创造充分条件,则设计与生产所需周期可大大缩短。因此,桐斌主张加强预先研究,要有技术储备。

然而 H 却认为这是浪费金钱、时间和人力,是学院式的研究,是资产阶级的科研道路。他指示下面:人家要你干的,你就干。没让你干的不要预先干。

就在他讲过此话不久,某火箭型号设计的变动,要求一些不同的材料。此时,桐斌已在挨批斗了,H 召集工程师开会,拿出一张单子,照本宣读了一串所需的航天材料名称,大家一听“乐”了。

“这些材料不都是被砍掉的项目中的吗?”

“当时砍掉这些项目是对的,现在提出需要这些材料也是对的。”

总之,他永远是对的,是一贯正确的。

他想过没有?研究一项航天材料需要付出多少时间、精力,以及组织者的远见、学识和才能!

火箭发动机中的燃料在燃烧过程中,会产生 3 000℃ 以上的高温,容易烧坏零部件,引起事故。桐斌他们研制一种“发汗材



料”,利用它本身的分解和气化来吸收大量的热,从而降低火箭结构的温度(这与人体发汗可使体温降低的机理相似)。为此,桐斌他们立了一个“发汗材料”的科研课题,被H否定,不许搞。并嘲笑说它是一项“胡子课题”,意即等姚桐斌做了白胡子老爷爷时,这项科研课题还不会出成果。

桐斌坚信自己的主张,在他的支持下,几位工程师悄悄地、坚持不懈地进行研究。

他们终于成功了。当我国第一枚火箭上天时,这种发汗材料和工艺将火箭发动机的几千摄氏度高温降到一百摄氏度左右,同时还提高了比推力,使火箭增加射程。而其花费也不过是几位工程师数年的工资(当时工程师每月工资六十余元)。如果不做这项预先研究,试车时,哪怕出一次事故,国家的损失就可能达数百万元之多,比工程师们数年工资的总和要高出不知多少倍。

这种被H诬蔑为“胡子工程”的发汗材料,后来荣获了国家发明二等奖,这是对H的讽刺、嘲笑及无知的最有力的回答。

H还上书领导,说七〇三所存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

领导不同意他这样上纲上线,他们对他说,你和姚桐斌同志的分歧只不过是工作上的不同意见。H坚持己见,一位领导同志火了,对他说:“我就是不承认你们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如果是的话,那就是说你是一条路线,姚桐斌是另一条路线,这样的提法不对。不信的话,过三十年再看。”

三十年弹指一瞬间。权力大于知识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H那种利用手中大权整人的事再也没有市场了。再说,他已离休,想整人也不可能了。

另一位领导说,你们开会批判姚桐斌,一批就十多个小时,把人家整得精疲力竭,七〇三所的科研工作谁来抓?

H不服气,他竟然想越级上告,非要把桐斌整垮不可。但当时正值火箭研制的关键阶段,工作离不开桐斌,他的企图未能



得逞。

其实当时的领导对 H 这种做法是不满的。不久前,《人民日报》的一位记者和我与某副部长在谈到桐斌时,已离休的副部长对桐斌的评价是:姚桐斌同志的一生,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无私奉献”。他即使在受到不公平批判,受冤屈时,也不闹情绪,照样满腔热情地投入工作。这体现了他高尚的情操。他在国外有地位、有名誉,但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回到祖国,难得啊!

这位前副部长说:“姚桐斌同志为我国航天材料及工艺打下了基础,他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是当之无愧的。”这位老干部的话掷地有声。记者连声说“您说得好!您说得真好!”

然而,H 并未就此罢休,他在全所大会上,抓住一件小事做文章,大张旗鼓地来整桐斌。

七〇三所一位工程师翻译了一本书,经几位所领导商量后,请桐斌审校,桐斌把它当作一项任务,利用晚上和节假日,认真仔细地校完了书稿。

1964 年,桐斌分到了 75 元稿费。H 得知如获至宝,在大会上含沙射影地说,有的所领导是为了稿费才布置那位工程师翻译这本书的,是追求个人名利。他的用意乃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整不倒你,也要把你搞臭。

这些事,桐斌对我只字未提,只是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H 离休后,我才略有所闻。因为他在位时,人们害怕挨整,不敢告诉我。可是,桐斌为什么不对我讲呢?有人说,因为桐斌组织纪律性强,不愿在家里谈论工作。这可能是一个原因吧,但桐斌知道我脾气烈,倘若发现他如此受气,我是不会甘心忍受下去的。

不忍受,又如何?我去大吵一顿,只会给 H 提供炮弹,说姚桐斌泄密,将党内事务告诉非党员的老婆。



现在我听到桐斌生前受到种种折磨的情况，心里十分痛苦。如果桐斌像 H 所说，追求名利，他何必回国？在国外既有地位，又有高薪，75 元人民币，不到 10 美元，在他国外的薪水中能占多大比例？

桐斌当时的同事弗贝格教授(M. G. Frohberg)在 1997 年给我的信中写道："桐斌当时就是研究金属及合金粘性现象的著名科学家，曾自制仪器研究金属粘性。"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H 又旧事重提，布置人就此事贴桐斌的大字报。为此，桐斌给七〇三所一位副所长写了一封信，澄清此事，并退还了 75 元稿费。一直到桐斌被害后，七〇三所才把桐斌的信和 75 元钱退还给我。现在我把桐斌给一位副所长的信全文抄录如下：

> 刘副所长：
>
> 六二年，五室一组同志由于工作需要，请丁工程师翻译了一本《高温短时试验》的书。翻译完后，科技处徐同志根据五室同志的要求，嘱我作文字和技术校对。由于丁工程师翻译错误较多，我利用了几十个晚上的时间和去青岛疗养的一部分时间，作为一项任务，完成了校对工作。当时，对丁工程师和参与这件出版工作的同志来说，大家并没有把赚取稿费作为目的。当时党委主要成员如叶副政委等都知道这件事，而且表示同意。五室同志和科技处资料室同志也知道这件事。
>
> 六三年，该书由分院资料处交国防出版社出版。有一天刘秘书送给我七十五元钱。据他说，这款项是出版稿酬的一部分，是经你和几位同志开会研究后决定的分配原则。对于是否接受这份稿酬，我曾犹豫很久，后来因考虑到出版这本书本身是正当的，同时听说丁工程师不愿一人得稿酬，而稿酬又无法退回出版社，我也就收下了这笔钱。



六四年及六五年初，所内某些领导同志曾不止一次地对这事在大会小会上对丁工程师及我本人提出了批评，甚至认为这书是我为了获得稿酬有意布置丁工程师翻译的，我曾为这事感到非常痛心和遗憾。

文化大革命以来，所内少数同志对这事也提出了意见，我经过再三考虑，始终认为翻译出版这本书系出于群众的要求和五室工作的需要，是正当的。但是我作为所的领导同志，即使付出了劳动，是不应接受稿酬的。此事已在有些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在某些所领导中产生了误解，对我说来是一个极其沉痛的教训。

因为分配稿酬的事是你主持开会决定的，这里我将七十五元全部退回给你。至于此款如何处理，请你和有关同志裁酌决定，但请千万不要退回给我。

此致

敬礼！

姚桐斌(签字)
1966年8月3日

桐斌写给刘副所长的信是我现在仅存的一封桐斌书信。其他信件在“文革”中全烧毁了。每当我想念桐斌时，便忍不住拿它出来，看看这熟悉的笔迹，希望能从中寻求到一点安慰，但实际带来的只是无以名状的悲伤和气愤。

记得1962年，我和桐斌去青岛休假时，由于他没日没夜审阅丁工程师这本书，将我冷落在一旁，总是我一个人带孩子出去玩，气得我跟他“吵”了一场。

当时他一再解释说，审稿比自己翻译还费劲，还费时间。桐斌所投入的精力和时间，岂是区区75元所能补偿的？再说写文章拿稿费是完全合法的，难道H会不知道？他只不过想找一个借口来



整桐斌罢了。

桐斌,像中国许多知识分子一样,碰到什么事,总是首先否定自己,他给刘副所长的信正好为H提供了整桐斌的“炮弹”。

“姚桐斌自己都承认了错误,我们一点也没冤枉他。”

“文革”中,给桐斌贴的大字报有时一天竟多达二百多张,那都是H在下面煽风点火刻意布置的。他说:“什么叫资产阶级,谁是资产阶级,我们所领导里就有。同志们,要擦亮眼睛啊!”

“姚桐斌不是党员吗? 怎么会呢?”

“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不一定入党。”

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后来,他们还到桐斌入党介绍人单位调查桐斌入党的情况。

两位介绍人都说:“不错,是我们介绍他入的党,姚桐斌同志绝对不是假党员。”

“你们根据什么介绍他在国外入党?”

“这是一个中央文件的决定。”

“什么文件?”

“这是组织上的机密,我们不能讲,你们也无权过问。”

那几个想把桐斌打成假党员的人只好灰溜溜地去复命了。

1964年8月,我家又添了一口人。这次怀孕我反应较厉害,也许是怀孕前不久刚刚流产的缘故。

这次有喜,令我十分高兴。我是多么渴望生一个男孩,总是缠着桐斌问,会不会是个男孩。

他回答得很妙:“你永远会得到你所希望得到的。”

明知这是一句戏言,却使我惴惴不安之心平静了不少,同时认为他的话有一定道理,我一直祈祷能有一位如意郎君,不是就如愿以偿了吗? 而且随着岁月的推移,我们的爱恋,我们的欢乐不是也更深,更浓了吗?



几年的灾荒终于过去了，食品的供应已大大好转。怀孕时，我大吃特吃，因此胎儿比较大，分娩时相当困难。

当护士笑嘻嘻地向我祝贺，恭喜我生了一个8斤7两的胖闺女时，精疲力竭的我，犹如当头一棒。护士见我面露不悦，便问：

“为什么不高兴？是你爱人不喜欢女孩吗？”

“不，是我想要一个男孩。”

桐斌兴冲冲地捧着一束鲜花来医院看我，我有气无力地对他说：

“真倒霉，又是一个女孩。”

“女儿有什么不好？俗话说，一个女儿一千金嘛！我已见过她了，胖乎乎的，很可爱。她是这几天医院里出生最重的婴儿，大家都在议论，这样苗条的妈妈，怎么生了这么大的胖娃娃。”

见我不回答，他仍然笑眯眯地对我说：

“外宾参观时，护士总是抱出我们的女儿，把她举起来以便人家在玻璃外看得清楚，可见我们这个宝贝女儿是多么可爱啊！”

“什么可爱，还不是因为她胖得像一个罗汉一样才抱出来让外宾参观。”

“既然如此，我们干脆叫她小罗汉，好不好？”

从此，全家人就叫她小罗汉了。

我还在医院时，桐斌就急不可待地将我已生孩子的喜讯电话通知我的好友。

“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

“一个胖千金。”

我的女友听后未加思索脱口而出：“怎么又是一个女孩？”

说完，她感到不妥，赶快弥补：

“女孩也不错，人们都说女儿贴心。”

桐斌立即表示赞同。



这位女友是我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同事，她记得有一次我们请她和她先生来我家吃饭，阿姨做了好些菜，桐斌还特地为客人买了一瓶酒。作为主妇，我总得做点事吧，拿起酒瓶，我就说："我来开，让我开。"当我打开酒瓶时，酒沫竟冒得好高，把我弄得不知所措，桐斌一面为我擦干酒水，一面安慰我："不要紧，没关系，没关系。"关怜之情溢于言表，令我好友感动不已，至今记忆犹新。

产前，桐斌和我一再商量，这个孩子生下后，再不要小孩了。当我一听到护士告诉我又是个女孩时，立刻改变了主意。我们还年轻，经济情况也不错，再生一个并不为多。

我多么希望能有一个和桐斌长得一模一样的儿子啊！这样，当桐斌出差时，我就会感到他还是在我身旁。

桐斌见我这次生孩子，由于胎儿大，身体恢复得慢，怕我再生小孩会把身体搞垮，就毅然决然地自己去做了绝育手术。那时候，中国还没有提倡计划生育，而作为男性，做绝育手术的更是凤毛麟角。丈夫如此爱我，我何其有福，此生无憾矣！

桐斌和别人一样，也有七情六欲，虽然他不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观念所束缚，但自然也是希望膝下有儿有女，"品种齐全"。除了担心我的身体健康以外，他还认为多一个孩子要多分散一些精力去抚养，他要把整个身心放在工作上。因此，他劝我：

"我们有了3个可爱的女儿，不必再要孩子了，趁我们还年富力强，集中精力，多为祖国做点工作吧！"

桐斌就是这样一个执着的人，这样一个认真的人，这样一个愿为祖国奉献一切的人。

从桐斌回国后到1968年被害，他在七〇三所主持开展了许多项科研课题。除高温钎焊合金外，还有新型不锈钢、钛合金、高强铝合金、复合材料、难熔金属（钨、钼、钽、铌）焊接新工艺，化学铣切



工艺，密封件、金属软管、波纹夹层结构、蜂窝结构，等等。这些都是桐斌在排除阻力克服困难的情况下，极力坚持才得以开展或完成的，可以想像是多么的不容易！这些课题的成果，有的（如当时被批判的难熔金属课题）在稍后的远程火箭以至第一颗通信卫星上开了花，结了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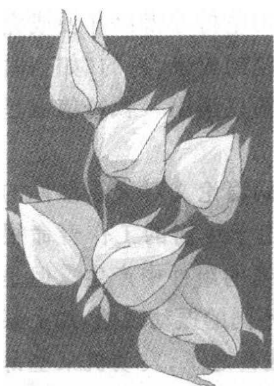
桐斌还写出好多篇科研论文，其中有两篇论文对火箭部件的疲劳破坏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他写道："由于火箭的工作寿命很短，很多人曾误认为疲劳破坏不可能在火箭的组件中产生。但是实践证明，由于火箭发动机在工作中产生不同的振动现象，加上某些零组件在火箭工作时又处于复杂的动载荷之下，发动机某些部分的材料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达到'疲劳寿命'而发生破坏。金属材料疲劳破坏的积累性加深了生产这种破坏的可能。"桐斌在此文中提出几个有针对性的措施。从此，七〇三所开创了一个"失效分析"专业，并多次对发射事故进行了极具说服力的分析，对火箭部件的设计制造起了指导性的作用。在此后多年中，这一专业为我国火箭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失效分析已成为导弹、火箭、航天器的研制和生产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可惜桐斌的好些论文在"文革"中丢失。而他在国外发表的论文，更是被某些人当作"资产阶级代表作"没有保存下来。

虽然桐斌所写的一些论文已散佚，但是，他主持领导过的一些科研项目，却获得了丰硕成果。

1985 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评奖委员会为桐斌生前在运载火箭的发展与研制方面做出的重大贡献颁发了"科学与进步奖"特等奖。同年，该委员会又为桐斌生前主持的"高温热物理性能测试基地的建立与发展"颁发了二等奖。

尽管桐斌已被害，但他的科研成就将载入史册。



宝贝罗汉

北京的老式住宅，一般是平房四合院。随着人口的猛增，新建的居民住宅都是高楼，而且层次越来越高，从十几层发展到几十层。但不管楼房高低，建筑的传统习惯还是沿袭下来，楼房一般都是南北向，只有少数是东西向，街道也都是方方正正的，很少有斜向的街道和房屋。

当时外交学院分院只有六栋宿舍楼，都是三层高的筒子楼。每层楼有 40 个房间，厕所和厨房是公用的，还有两间水房，所有的人都在那里漱洗。水房边是男、女厕所，女厕所里仅有三个蹲坑。厕所旁各有一个房间作为公厨。

厨房里只能放四个蜂窝煤炉，还要放碗柜，堆蜂窝煤等杂物。因此，有的人家房间离厨房较远，就只好把炉子放在自家房门口烧饭，煤也堆在过道里。学校上自院长，下至职工，都住在这种筒子楼里。



我在学校住的宿舍楼呈L形，南北向是三层，有32个房间，东西向是两层，只有8个房间。

我住在二层204号，房间朝西，冬冷夏热，人们都不愿住。我喜欢清静，楼上是平台，没住人，正好合了我的心意，不会有人吵。

但是，黎明时竟从平台传来雄鸡“喔、喔、喔”的啼鸣声。开始，我以为听错了，跑去问邻居听见没有？他告诉我，现在有些人家饲养公鸡。

“困难时期已经过去，还养什么鸡？尤其是公鸡？”

“人家是要注射鸡血针！”

“什么？”

“不知何时，突然有人相信公鸡血能增强体质，使人返老还童。”

“哎呀，竟然有这种事。”

回家后，我立即将这件新闻告诉桐斌，他不以为然，说这种做法毫无科学根据，怎么可以将鸡血注入人体？他对这种不科学的做法竟然有人相信，感到不可思议。

住在我隔壁的是一位姓李的英语老师，天津人，妻子儿女仍在天津。李老师个子不高，黑胖的圆脸，细长的眼睛有点往上吊，像一尊弥勒佛。李老师是朝鲜族，但他从上幼儿园起，就和外国孩子在一起，故而英语特棒。李老师主管一个英语班。他讲课活泼生动，非常受学生们的欢迎，教室里经常传出哄堂大笑声。

伍老师带着上小学的女儿和小儿子，住在我房间的另一边。伍毕业于南开大学英语系，她在我系当辅导教师。

伍老师身材高大，皮肤白皙，高高的鼻梁，深陷的眼睛，活脱脱一个外国人的模样。我们大家一口咬定，她的祖先一定有一个是老外，伍老师矢口否认。

伍老师的先生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在北京东郊一家工厂任工



程师。只有周末，伍老师才带着两个孩子回城里西四的家，和丈夫、婆婆团聚。

学校创建不久，教员宿舍设备都很简陋，每个房间里只有一张木板床，一张三屉桌，两把木椅和一个书架。只有极少数负责老师才另加一个五斗柜。

伍老师有腰痛病，从西四家里运来一张“席梦思”床自己睡，让孩子睡在木板床上，她那间房子就显得格外拥挤了。

我的另一位近邻是陈老师，陈是北平辅仁大学英文系的高材生，家住天津，丈夫仍在天津工作。陈老师带着一个上中学的女儿在身旁。女儿刚来时，满口天津话，几个月后，就和妈妈一样能讲字正腔圆的“京片子”了。

有一次，陈和我们几位老师闲聊，她说在辅仁大学上学时，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是该校的高班生。王光美出身天津名门望族，在学校时，就穿戴高贵，气度不凡，很引人注目。一位老师听到此处，急忙打断了话题：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副食店来了豆腐。”

“真的？那我们得赶快去买。到月底了，不买，豆腐票就要作废。”

陈老师一听急了：

“你们怎么搞的？我又没说王光美的坏话。”

好话也罢，坏话也罢，中国人哪敢议论国家主席的夫人。可是谁会料到，三年以后，刘少奇和王光美竟然都成了阶下囚。

产假满后，我决定把孩子带到身边，请了一位保姆照料。我申请再要一间房子，校方给了我 207 号房间。

207 号原来住的是两位年轻的西班牙语教师，那间房终年不见阳光，他们也就乐于搬迁。

我们南郊的家，另有一位保姆。这样，我们家就一分为二了。



我周末回南郊一次，桐斌有时到西郊开会，也顺便看看他最小的宝贝女儿 —— 小罗汉。

桐斌第一次来看我时，恰巧被陈老师碰上，她咋咋呼呼地告诉其他老师：

“新女婿来了，大家快来看呀。他看起来真年轻，长得又高大，又英俊。”

陈老师这样一嚷嚷，好几位同事都到我们门口探头探脑。我对桐斌说：

“人们都来看俊女婿来了。”

桐斌倒很大方，说是老夫老妻的，还怕人家看？索性把门打开，请大家进来坐。房间里只有两把椅子，大家挤坐在床沿上，嘻嘻哈哈地说笑了一会儿，也就散了。

我房间对面还住着一对夫妇，先生姓洪，太太在一所中学教政治。他们在门外放一个蜂窝煤炉，除了做饭时和邻居交谈几句外，一般不和别人来往。两口子没有孩子，安安静静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洪老师十分活跃。他虽是外语老师，中文却很棒，写了不少大字报。洪老师的文笔流畅，字写得龙飞凤舞，引用毛主席语录也恰到好处。他的大字报引起了一番轰动。可惜，好景不长，洪出身资产阶级家庭，又有一个右派哥哥。破“四旧”时，学生首先抄了他的家。记得那时已是晚上九十点钟了，只听见一个学生拍着桌子大骂：

“看看你写的东西，够‘黄’的了，你竟然还有脸写别人的大字报……”

我在自己房间里大气也不敢出，其他邻居也和我一样。我心里想，小两口平日恩恩爱爱的，洪怎么会写黄色东西呢？后来从学生对洪老师的训话中才明白其中歪理。原来学生查看了洪老师过去写给妻子的信件，把夫妇间的相思之情竟说成是“黄色东西”。

洪老师的妻子结婚时在外地工作，他们新婚燕尔就劳燕分飞。



洪在一封信中写了皓月当空，更加思念娇妻，不知她是否和他一样，也在思念丈夫。学生念到此处，又破口大骂：

“你他妈的真不是东西，你一天到晚净想你的臭老婆，什么乱七八糟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另一个学生说：“别和他多废话，都拿走。”

我们这些老师一个个心惊胆战，怕他们来抄家。但那一晚，他们没来。可能是抄走的信件多，他们在仔细检查阅读吧！

洪老师隔壁住着一位日语系的于老师。于是台湾人。几年前，取道日本来到大陆。于老师只会讲闽南话，到大陆后才学会讲普通话。于老师和她先生离了婚，带着两个女儿过。

于老师长得明眸皓齿，娇小玲珑，楚楚动人。她虽然已是两个小学生的母亲，但腰细如杨柳，令人十分羡慕。

一次，我忍不住问她，是何妙法能使腰细如处子，因为我生一个孩子腰就要粗一两寸。

于老师说她的婆婆很厉害，每次生孩子后都让她缠腰。当时痛得很，但惧怕婆婆，不敢松绑。

“你婆婆是什么地方人，有这么怪的风俗？”

“她是日本人。”

“啊！怪不得。”

这位日本婆婆把于老师训练得十分能干，她会烧一手好菜。那时，大家都从一个副食店购买副食，每家吃的菜几乎相同。比方说，副食店来了带鱼，家家都做鱼，可是，于老师烧出来的鱼，就别有风味。我向她学做了肉羹、豉油鸡等几样菜，桐斌吃后，大为赞赏。

得到桐斌的夸奖，我好比吃了蜜糖一般。于是又向于老师请教，学织毛衣。桐斌的毛衣过去一直是买现成的，我想悄悄地为他织一件，作为赠送给他四十六岁的生日礼物。

我相信，不管我把毛衣织成什么样子，桐斌都会喜欢的。穿在



他身上，他会感到我对他的情和爱。

谁知没等到他生日那一天，桐斌就惨遭杀害了。

我们学校除了本科生外，还有干部培训班，简称干训班。学员都是有外事经验的干部，他们外语水准参差不齐，有的从 ABC 学起，有的已有一定基础，来进修口语、听力等。这些学员年龄一般在三十岁以上，学习时间一至二年不等。他们绝大部分是中共党员，因此，学校不派政治指导员。每个班的学员自己组织一个党支部，负责政治思想工作。

一般来说，干训班每班配备一至两名外语教员。住在我们附近的韩老师，就是干训班的教员。

我们这几家邻居，年龄都是三十岁左右，只有韩老师年纪较大，快五十了。韩老师是上海人，他妻子在上海给私人教钢琴。不知是迁户口难，还是安排工作难，从外地调来的教员，家眷几乎都没有来。

韩老师平日少言寡语，见人总是点头打招呼，极有修养。我见他每天提着热水瓶下楼打开水很不方便，就让他使用我家的炉子。要烧个菜什么的，我家保姆也可以帮忙。但韩老师从未打搅过我，也不到别人家串门。倒是我们去过他房间几次，言谈中发现他中、英文皆有很高的造诣，说话时，引经据典，是个相当有学问的人。

在一次闲聊中，韩老师说："只要有一本书，一杯茶，一支烟，则我愿足矣！人生岂有他求？"

听了韩老师的话后，我觉得此人情趣蛮高雅的，也挺洒脱的。谁知韩老师胆小怕事，在小组生活会上，几次为这句话做检讨。因为他没提到学习毛选，也没提改造思想。

"文化大革命"期间，韩老师被隔离审查，住进"牛棚"[①]。从大字报中得知，他原来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英文秘书。解放后一直闲住在上海家里，替人补习英语为生。由于当时缺少英语教



员，在外语人员归队期间，韩老师才得以进入北京高等学府。

我们这些教员，尽管各人的背景不同，性格各异，但对工作都是认真负责的。白天上课，晚上自习时，还都到教室转转，为学生解答疑问。9 点多钟回到家里，看书或备课直至深夜。

同楼一位邻居对我说，她原以为当老师很轻松，每天上几节课就没事了，没想到竟然这样忙碌。

且说我家分住在两处，实在不方便。小罗汉 6 个月时，我就把她带回南郊的家，除周末外，我平时也回家二三次，因为那时学校经常放映电影，是我回家的好机会。

在北京，除了城里，郊区几乎没有电影院，但每个大的单位，都有电影放映机，有专职放映员，可以租来影片，冬天在礼堂里，春暖花开以后，在露天操场上放映。各人带着折叠小凳子，银幕两边都坐满了人。电影票价低廉，每张一角钱。

那时，正在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人民日报》不断发表文章，批判有问题的小说、戏剧和电影等。大量过去被认为是好的电影，如今都成了“毒草”。例如电影《林家铺子》是根据著名作家茅盾的小说改编的，被批判为美化资产阶级；电影《早春二月》是根据 20 世纪 30 年代革命作家柔石的小说改编的，被批判为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影片《舞台姐妹》讲的是两位越剧演员的生活经历，其中有一句台词：“认认真真地演戏，清清白白地做人”，被批判为抹杀阶级性。

学校把这些电影拿来当作反面教材放映，看完后，组织大家批判。因为是政治需要，看这种电影不用花钱买票，学生也不上晚自习，必须看电影。我总是趁这个机会回家。政治学习讨论这些电影时，我胸有成竹，因为报上总会刊登批判这些电影的文章，只要重复报上的话，就可以应付过去了。是否看过电影，人家也无从知晓。当时我们谁也没有料到这种批判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自从亚当和夏娃偷尝禁果后，人们大概都有一种逆反心理。社会主义中国的老百姓也不例外，越是“批判影片”，越想看。记得放《早春二月》的时候，正好轮到我发电影票，当我敲开英语系黄老师的门，问他要几张今晚的电影票时，他一听是批判片子，脱口而出：

“太棒了！”

“什么？”我问。

黄老师自知失言，马上改口：

“有机会能看到被批判的电影，对照报上的批判文章，能提高思想觉悟，实在是太好了。”

我笑了笑，没有说话，心想，你何必如此？我是决不会去向党支部汇报你的言论的。

1964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们学校于该年年底，由主管政工的副校长为首组织了工作队，去河北省遵化县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队员绝大多数是政工干部和职员，也有一些政治理论教员。由于教学离不开，没有派外语教员去。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运动”②。不仅在农村，而且在城市也进行，因此，除了往农村派工作队外，也往工矿、企业派工作队。

有一个晚上，我趁学校放电影，又跑回家去，只见桐斌正在整理行装。

“哎！你这是干什么？又要出差吗？”

“不完全是，我将随工作队去七机部下属工厂搞‘四清’。”

“你一个管技术的所长去搞什么‘四清’，党委书记、副书记是干什么吃的？不是还有管行政的副所长吗？”



“你怎么这么多话啊！我能有机会参加‘四清’，锻炼一下又有什么不好？我们回国后，还没有参加过重大的政治运动。”

桐斌的话很有道理，令我无言以对。

“你去的工厂不会太远吧？能每天回家吗？你什么时候走？”

“我们明天先集中学习文件，然后下厂，工作队有纪律，除了节假日，不许回家。”

“又不是打仗，干吗搞得那么紧张？”

他没有理我，只顾继续整理行装。

我提出一个要求：

“那你每天给我打电话，好吗？”

“在工厂打电话不方便，再说也没有时间，我给你写信好不好？”

此后一段时间，我们夫妇间，只有靠鸿雁来往了。

返回学校后，好几天我都忐忑不安，茶饭不思，直等收到桐斌的来信，才定下心来。

邻居和我开玩笑：“怎么这样甜蜜啊！在一个城市里还信来信往的。”

我苦苦一笑，没有作声。英文系的教员没有一个参加“四清”工作队的，我怎样才能把我的心情说得清楚呢？

桐斌有时也请假回家，取点衣物什么的。他告诉我，他们搞“四清”的办法，主要是帮助厂里干部“洗澡”，工人“洗手”。工作虽然紧张，但也熟悉了许多过去不了解的情况，交了不少工人朋友。

的确如此，桐斌离开工厂后，还有好些工人来看望他。

“文化大革命”前夕，各地的“四清”运动都停下来，桐斌也就搬回家了。

小罗汉出生后，桐斌做了绝育手术，我们再也不会有孩子了，自然而然对她的疼爱比两个姐姐要多几分。



还在小罗汉几个月时，有一天保姆休假，我将她抱到大床上，桐斌坐在窗前看报纸，还有一搭没一搭地回答我的话。

"桐斌，你是在看《人民日报》吗？"

"是。"他头也不抬地回答。

"你在办公室不看报吗？"

"不。"还是没抬头。

这个人真怪，连看报都舍不得用办公时间，回家后不是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工作就是阅读报刊杂志。这次，我非得引起他的注意不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正在这时小罗汉帮了我的忙。

我发现她会用背"走路"。她小肚皮向上一拱一拱的，就从床这头拱到那一头了。

"桐斌！快，快来看！罗汉才几个月，就会用背'走路'了，多好玩呀！"

桐斌放下报纸，搂着我的腰，和我一起并立床前，欢眉笑眼地对我说：

"哎呀！瘌痢头的儿子自己的好啊！瘌痢头的儿子自己的好啊！"明明是他偏爱小罗汉，却故意对我说这些话，气得我直捶他。

小罗汉一岁多时，能到处跑了，她头大，走路又快，好像头带着身子走，人未到，头先到，偏偏她又喜欢小步快跑，因此，老是摔跤。

小罗汉的长相十分可爱，一笑就露出几颗小门牙，桐斌视她为掌上明珠。七〇三所有人结婚，桐斌必带她一起参加婚礼，姐姐看着眼馋，问她：

"跟屁虫，你跟爸爸干嘛去？"

姐姐们对小罗汉又喜欢又羡慕，她们总是取笑小罗汉的大锛儿头：

锛儿头，锛儿头，
下雨不用愁。
人家有雨伞，



我有大锛儿头。

“妈妈，姐姐骂我。”

“乖乖，姐姐逗你玩的啦，谁都知道我们家的小罗汉大锛儿头漂亮！”

这回姐姐们又趁机骂小罗汉为跟屁虫。

小罗汉十分开心能和爸爸一块出去，没有告状，而是大脑袋一歪，得意地说：

“我跟爸爸结婚去呀！”

把桐斌乐得哈哈大笑。

那时七〇三所调来的单身汉很多，找到意中人后，都在节假日办喜事，很多新人请桐斌当主婚人，把桐斌忙得不亦乐乎。在国内，这种场面一般都不带妻子同行，桐斌又不愿将家里人冷落在旁，因此，小罗汉就有福同往了。

别看桐斌平日话不多，有时也会幽他一默。一次，桐斌应邀主持所里两位留苏工程师的婚礼。当大家请桐斌讲话时，桐斌自然祝这一对新人白头到老。他说，我认为他们一定会永远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为什么呢？他停顿一下，环顾四周，然后自己回答，因为新郎的专业是金属材料，而新娘是焊接专家，在座各位一定都知道，焊在一起的金属材料就变为一体了，永不分离。桐斌的话引起了满堂的笑声和掌声。

我们楼的后院相当大，有一些松柏和芙蓉树，还有葡萄架，在树下有几张石桌石凳。我每次回家，小罗汉总要我带她下楼玩，围着石桌和她玩“藏猫猫”(捉迷藏)。这时二层楼一家的小孩也来一起游戏。

二层楼住的是院政治部易主任，易主任是大校，曾任中国驻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使馆的武官。易主任小时家境贫苦，他曾为地主喂过猪，十几岁就跟着红军长征。女主人是一位眼



睛大、皮肤白、头发乌黑的陕西美人。易夫人特别喜欢小罗汉，每每都要抱她、亲她，还说小罗汉长得如何如何逗人喜爱，脑门这么大，聪明，长大了一定也是一个科学家。

“什么可爱啊！小丑八怪，你看头上就几根胎毛，活脱脱像漫画里的三毛。”

“经你这样一说，我看小罗汉倒是有点像三毛。不过你们家的孩子，小时候大头，塌鼻子，可是长大后，都越来越俊，这个小丫头长大了只会比她姐姐更漂亮。”

她亲了一下小罗汉说：“是不是，小罗汉？”

小罗汉奶声奶气地说：“系！”

“小罗，你像不像三毛？”

“小罗像三猫。阿姨，小罗要玩‘藏猫猫’。”小罗汉牛头不对马嘴的答话，引起一片笑声。

易夫人对我说：“你看这小把戏可爱不可爱？她长得比三毛不知好看多少倍。再说，她生在新社会，又是这样一个幸福的家庭，我看你们这个宝贝丫头，一定会有福气的。”

我感谢她的福语吉言，心中默祷，我们这个宝贝罗汉女儿，将来会像花儿似的美丽，前程光明似锦，绝不可能像《三毛流浪记》里的三毛那样命苦。

注释

① 牛棚：指“文革”中关押受害者的地方。一般是阴暗、潮湿、窄小、简陋的破房子。（参见金春明等编：《“文革”时期怪事怪语》，第 123 页，求实出版社，1989 年）

② 四清运动：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



八月的太阳红似血

1966年春天，北京春光明媚，风和日丽，但是政治气候却是雷声隆隆，风雨交加。

5月16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了《五·一六通知》。

《通知》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身旁……"

那时，我们这些人都没有猜到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是谁。

我在美国时，从电视上看到过赫鲁晓夫在联合国大会讲台上用皮鞋敲桌子的丑态。



回国后，又听说他诬蔑中国三个人轮流穿一条裤子。因此，从心里感到，应该把赫鲁晓夫这个粗暴无礼的家伙清除掉。

《五·一六通知》公布后，“文化大革命”像熊熊的燎原之火，一下子就在中华大地上燃烧起来。北京市各大学学生纷纷起来造反。

5月25日，北京大学几位教师贴出了一张反对学校党委的大字报。

《人民日报》6月2日在第一版以醒目标题《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将该大字报公开发表。顿时，北京大学成了全国“文化大革命”的中心。

北京大学原先的校址，在城里沙滩，那座红楼已成为国家文物保护建筑，因为毛主席年轻时，曾在北大图书馆里工作过。

现在的北京大学是原来燕京大学的旧址，坐落在北京西郊海淀区。校舍是仿中国古典建筑，朱红柱子，木格窗户，掩映在一片绿树丛中，显得典雅幽静，景色绮丽。校园内有一个未名湖，垂柳倒映水中，年轻的学生在湖畔看书散步，一派高等学府风光。

这宁静安详的气氛，从6月2日以后，就完全改观了。校园内贴满了反党委的大字报，墙不够用，就用芦席搭起棚子往上贴。

与此同时，许多大、中学校学生也都把校党委成员、教师作为斗争对象，掀起了“斗黑帮”① 的浪潮，学校的形势一片混乱。

6月初，我们学校也停课闹革命。教职员工纷纷贴反对校党委及系领导的大字报。接着，北京市委也派来了工作组，李富春、张经武、丁国钰等领导都先后来过我校。

学生们受到北大的影响，也开始反对工作组，主张踢开工作组闹革命。

记得7月的一个星期六晚上，两派不同意见的学生，就此问题在学校大操场进行了通宵达旦的辩论。用学生的话说：“直到霞光



万道从东方射出，我们的辩论会才以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而结束。”

辩论进行到晚上 9 点多钟时，我见辩论短时间无法结束，便打电话告诉桐斌，晚上不能回家了。他在电话中什么也没问，第二天我回家时，他才松了一口气，原以为我已被学生关起来了。

这是我惟一的一次给家里打电话。我所住的六号楼，只在一层有一个公用电话，无人管理。电话铃响，住在附近房间的人得扯着嗓门大叫“某某某电话”，他们嫌烦，别人也嫌吵，后来他们擅自把电话拆掉了。

那时，家里有电话的人不多。公用电话被拆除影响不大，又无人向上反映，领导班子也早已瘫痪。因此，没有人管这类闲事。

7 月下旬，陈伯达和江青去北大，恰巧我和几位同事一起去北大看大字报。人群中传说，江青在东操场召开万人大会批判工作组。我们边问路边往那里跑，都想一睹江青的风采。

谁都知道，毛主席的这位夫人是 20 世纪 30 年代的电影明星蓝苹。但是，我们这些人中，没有一个人看过她演的电影。“文革”前，报上很少报道她。因此，我们都不识她的庐山真面目。

我们赶到东操场时，大会已经开了好一阵，只见黑压压一片人席地而坐，后面还站了很多人。这时恰好江青在发言，我们拚命往前挤，以便看得更清楚些。

江青瘦高个子，皮肤很白，头发漆黑发亮，虽然她已五十多岁，但腰板挺得很直，显得年轻。可是，当高音喇叭传播出她那略带颤抖的声音时，我的第一个感觉是，这是一个老妇人的声音；第二个感觉是，此人身体不好；第三个感觉是，作为电影明星，江青的声音不够悦耳动听。我虽然有这些想法，却不敢和身旁的同事议论。

江青的讲话很长，主要内容是反对工作组，把北大工作组的问



题提到阶级斗争的高度。

江青在谈阶级斗争时，不知怎么一下子扯到北大物理系实验室在做放射性物质实验时，没有保护措施，使有的工人得了癌症。

江青大声叫喊："这是变相迫害工人。我得过癌症，深知接受化疗的痛苦。"

接着江青话头一转："我们家中也有人受迫害。毛主席有一个儿子有病，但是，张文秋不肯放过他，硬是要把女儿嫁给他。"

江青尖着嗓子叫道："张文秋是政治骗子，我们要查清她的历史，我们不承认她的女儿是我们家的儿媳妇。"

江青这一段话，令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返校后，同事们告诉我，张文秋的丈夫是革命烈士。毛主席的夫人杨开慧有三个儿子，大儿子毛岸英，娶张文秋长女为妻；有病的二儿子名叫毛岸青，他的妻子是张文秋的次女；最小的儿子幼时流浪街头，不知去向。

江青嚷了好几次："张文秋是有目的地将她的女儿嫁给毛岸青，她连我们那个生病的儿子也不放过。"

不知道江青在那样庄严的大会上，怎么把家庭里的矛盾抖搂出来。看来，这位前电影明星讲话之前，没有底稿。有关儿媳妇之事，是一时冲动，信口开河，使听众感到莫明其妙。

后来江青又回到反工作组的话题上，她表示坚决支持学生反工作组。这时，操场上的学生，兴奋无比，齐声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此时，桐斌已被"请"回七〇三所看大字报。"文革"开始，H就布置群众贴桐斌的大字报，给桐斌加上个人主义、成名成家、白专道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一时间，桐斌的大字报铺天盖地。

当人们告诉我这一情况时，我不禁深为担心，而桐斌却要我不



用害怕。他说，对群众提的意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桐斌告诉我，有的人迫于形势，不得不贴他的大字报。贴什么内容呢？大字报说，桐斌每次出差，往往挑星期六返回北京，这样可以在家里休息一天。又说什么桐斌从上海一次就买了十几双鞋……桐斌笑着对我说，这些同志多好啊，既应付了上面，又未给他扣什么政治帽子。

8月1日，中共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

《十六条》充分肯定了已经开展起来的“文化大革命”，规定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样一来，政工干部成了运动的重点，想打倒桐斌的企图未能得逞。

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上百万红卫兵代表，头天半夜就聚集在广场。

当太阳刚刚从东方升起时，毛主席身穿绿色军装，头戴红五星军帽，在《东方红》乐曲声中，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一刹那，天安门广场沸腾了。红卫兵挥动着红色的《毛主席语录》，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云霄，震耳欲聋。

此后，在中华大地，只要开会，都有固定的模式。发言人在讲话开始，总要手持“红宝书”高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会场上其他人则挥动“红宝书”齐呼“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然后发言人接着高呼：“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身体健康！”于是大家又跟着高喊：“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我每次参加大会，也是手举“红宝书”，满怀虔诚之心喊出这些口号的。

会议结束时，全场起立，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大海航行靠舵手，



万物生长靠太阳，
雨露滋润禾苗壮，
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鱼儿离不开水呀，
瓜儿离不开秧，
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
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

“八一八”这一天，在天安门城楼上，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一位女学生，把一个红卫兵袖章，佩戴在毛主席的左臂上。毛主席亲切地问女红卫兵的名字，她尊敬地回答说：“彬彬”。

毛主席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

“是，主席。”

“要武嘛！”

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消息时，彬彬的名字已经改成“要武”了。

从这以后，红卫兵兴起了改名热，到处是叫“卫东”、“爱武”、“永红”的人。他们不仅自己改了名，还将街道、商店的名字都改了许多。如北京最繁华的王府井大街改为“人民路“，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中苏友谊医院成了“反修医院”，东安市场改为“东风市场”等。

8 月 19 日，我去协和医院看病，正赶上红卫兵为其改名叫“反帝医院”。我从医院出来时，经过“全聚德烤鸭店”，只见砸烂的招牌还放在地上，门上换上了一块新招牌，写着：“北京烤鸭店”。我正想进去吃一顿午餐，恰好我前面的一名顾客被服务员挡住，大声喝问：

“你是什么出身？”

我和另一位顾客见此情景，掉头就走。看来，不是“红五类”出



身，无法到饭馆进餐了，谁会去自讨没趣？

新上台的党中央副主席林彪，在“八一八”大会上号召红卫兵小将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林彪号召全国人民支持红卫兵小将敢闯、敢干、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

紧接着，北京就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破“四旧”运动。各个街道口都有红卫兵把守，不许穿尖头皮鞋，不许穿瘦腿裤，不许穿高跟鞋，不许……红卫兵见有梳辫子的姑娘，就用剪刀剪辫子。一时间，人们都穿蓝色的、灰色的、黑色的衣服。年轻的“红五类”则想方设法搞一套绿军装穿上，引为无上光荣，而且他们认为，只有他们才配有此殊荣。

我也在王府井的百货大楼买了一条肥大的蓝色布裤和一双黑布鞋，准备回校后换上。刚走进学校大门，就碰见我们班上一位女生，她大声责问我：

“喂！你怎么还穿瘦腿裤、尖皮鞋？”

“文革”后，学生就不称呼老师了，要么直呼其名，要么一声“喂”。我赶忙解释：“我已买了一条布裤子和一双布鞋，马上去换。”

这位女生总算手下留情，没有把我的裤管用剪刀剪开。但是，她指着我的鼻子训斥：

“你呀！就是换上布裤、布鞋，也改不了你那资产阶级的派头！”

我惹不起她，装作没听见，赶快离开。

在远处我还听到她的声音“瞧她走路的样子，整个的资产阶级！”

“文革”后我很想请教这位女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走路有何区别？但一直没见着她，也不知道她现在走路是什么“阶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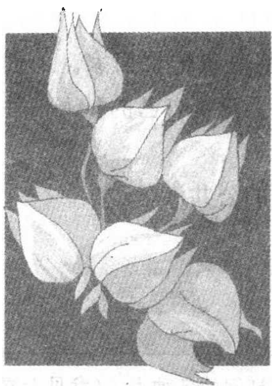
就在这个晚上，我们对面洪老师的家被抄，并把他给妻子的信，全部没收。

20日是星期六，城里有家的教员，全都急急忙忙回家。他们一定像我一样，赶回家去自我清查，谁也不愿意将自己的私人信件公之于众。

因此，一吃完午饭，我就挤上了回家去的公共汽车。

注 释

① 黑帮：原指黑社会势力。"文革"中泛指被打倒的各种人。（参见金春明等编：《"文革"时期怪事怪语》，第370页，求实出版社，1989年）



破“四旧”

到家后又热又累，桐斌不让我马上清理东西，非要我先休息不可。

第二天，恰逢保姆休假，我一整天都和桐斌在清理。首先翻看我俩的信件，他给我的信里有柔情、有思念、有幽默。而我给他的信就更“精彩”了。有时中、英文一齐上，用桐斌的话说：“像是约瑟芬给拿破仑的情书一样。”

我一遍遍地读着这些信，舍不得扔掉。桐斌劝我说：

“我们还是烧掉吧！何必让别人看我们的私房话？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啦！等‘文革’过后，我一天给你写一封信好不好？”

我也觉得没有办法保存，只好将信都烧了。回想起来，我好后悔啊！

桐斌走后，每当我思念他时，只有凭我的记忆来回忆往事，手里没有他留给我的任何信件。他给刘副所长的信，是七〇三所后



来连同75元钱一并退给我的，直到今天，虽然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但只要拿起那封信，看到桐斌的笔迹，我仍然忍不住凄然泪下。

桐斌喜爱摄影，不但照得好，而且自己冲洗。

我不爱照相，而他只要有时间，总是软磨硬泡地为我们照相，然后，将卧室改成临时暗室冲洗底片。这时，只有我俩在这密封的小天地里，我紧紧地坐在他身旁，闻着他身上男子汉的气息，珍惜这难得的时光。

“你不是不喜欢照相吗？怎么对冲洗这样热心？”他不解地问我。

“哈，本人自有理由，只是不告诉你。”

我们保存了很多照片。它们记录了我和桐斌相爱以后的美满生活，这是绝版了的纪念物啊。

“文革”期间，我校举办了一个“黄色照片展览会”。内容是一派红卫兵将一个“黑帮”女儿的一些照片拿出来公布于众。所谓“黄色”照片实际是艺术照片，其中一张仅仅因为是斜照，而不是端端正正的正面照，也被列入“黄色”之列。

因此，我不得不将我和桐斌两人的合照付之一炬。当我写完这本书寻找照片时，再也找不到我和桐斌在“文革”前的合影了。

我为此举抱憾终生。

我们一个箱子一个箱子地寻找“四旧”。忽然，我从箱底找出一张桐斌的证书，上面有国民党的国旗和党旗，以及教育部长的印章，我惊出一身冷汗，立刻拿去烧掉了。像这样的证件，如被红卫兵抄去，轻则说你是怀念国民党，等待变天，重则说你是国民党的特务。其实，那只不过是桐斌的大学毕业证书，或者是考取官费留学的证书，我连看都不敢细看，也没顾得上问他就烧了。

我们从国外带回来的唱片，成了一个令人头痛的难题，不管我



怎么往地上摔，也砸不破。当时古典音乐一概被斥之为封、资、修的东西。轻音乐又一律冠之以靡靡之音。桐斌看我摔不破那些唱片，就说：

“把它们放在那里，等红卫兵来时上交吧！”

对于书籍的看法，“文革”前，是以 1949 年为分界，这以前出版的书是“反动”的。而现在，则是以 1966 年为分界，这以前出版的书，都成为“修正主义”或“毒草”了。

更有甚者，对历史上一些有名人物，也都全盘否定。如说岳飞是愚忠，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清官比贪官更坏，维护帝王统治，更有欺骗性。因此，中国的古典小说也都留不得。桐斌的书太多，要烧也烧不完，只好和唱片放在一起，等着上交红卫兵了。

我带回一些高跟鞋，回国后没穿过，现在这些鞋也成了棘手的难题。总不能用火烧吧？只好让桐斌骑上自行车，拿去丢进外面的垃圾箱。临出门时，我嘱咐他：

“你尽量走远一点，一个垃圾箱丢一只。”

他去丢鞋时，我在家把长筒尼龙丝袜全部都烧掉。看到这些袜子变成一堆白灰时，我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滋味。这些衣物，都是我们在国外挣的血汗钱买的呀！但有理又同谁讲得清楚！

桐斌买了一张毛主席像，挂在客厅最显眼的地方。他除了跑出去给我丢高跟鞋以外，还进进出出地买菜、做饭。

桐斌的拿手好菜是榨菜炒肉丝，这是在国外当学生时锻炼出来的，既省钱，又下饭。这天，桐斌做了一个榨菜炒肉丝，一个凉拌黄瓜，一碟凉拌西红柿，一碗紫菜蛋花汤。黄瓜碧绿，西红柿鲜红，上面覆盖着一些雪花似的白糖，再加上黄澄澄的蛋汤。好一桌色香味俱全的午餐！

我们大家都夸他：

“爸爸真棒！做起饭来又快又好吃。”

见我们吃得开心，桐斌喜笑颜开，说是以后保姆休息，做饭烧



菜由他包下来。

我那天忙着清理我们的"四旧",无暇下厨。当时,我和桐斌都以为,出问题的将会是我。我不是党员,社会关系复杂,又有海外关系,在大学教书,又是一个"大炮筒子"。谁知,黑手已悄悄地伸向桐斌。

晚上,桐斌又自己烧水,灌热水瓶,准备第二天带到办公室去。

我返校后的第二天,红卫兵果然来抄家了。一进我家,他们就把花盆、金鱼缸砸个稀巴烂。地毯被搬走,说这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尽管地毯是公家提供的。

桐斌那几柜子书籍,他们乱翻乱撕,又看不懂洋文,撕了一地纸,直到不耐烦了,才扬长而去。桐斌回家后,将散落在地上的书捡起来,整理好后,再放进书柜里。就这样,邻居还为我们庆幸说,这些红卫兵还算是文明的呢,既没罚跪,又没打人。

回到学校,我身心疲惫地躺在床上。忽然,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我有气无力地应答"请进!"原来是隔壁伍老师的女儿小英给我送报纸来了。我和伍老师合订一份《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

小英进来说:"阿姨,给您今天的报纸。"她没有往日天真活泼的笑容,脸上似乎还有泪痕。

"小英,你怎么啦?妈妈生病了吗?"

小英低着头看着地面轻轻地回答说:"没有。"

往常都是伍老师看完报纸亲自送过来,顺便和我聊聊天,今天伍老师为何不来?小英神色又不对,是怎么回事呢?我就和她一起到她家去。走进房间只见伍老师头上包着纱巾,穿着一件长袖衬衫,呆呆地坐在椅子上。

"大热天的,你怎么又是纱巾,又是长袖衬衫?"

"我被红卫兵剃了阴阳头,不包纱巾,孩子们见了伤心,出门也无法见人。"



伍老师一面回答，一面将衣袖往上一捋，只见她手臂上布满了伤痕，我不禁大吃一惊。

“你怎么被打，还被剃了阴阳头？你不是黑帮，又不是地主资本家的老婆，怎么把你打成这样？”

剃阴阳头是红卫兵的“杰作”，只要他们认为是“黑五类”，不管男女老少，将头发的一半剃个精光，另一半留下的头发再用剪刀剪得乱七八糟。红卫兵在造反精神的鼓舞下，发明了这种侮辱人格的做法。想不到，伍老师是我同事当中第一位受害者。

伍老师告诉我，礼拜六深夜，一群红卫兵在居民委员会造反派带领下，破门而入。他们命令伍老师和她先生、两个孩子(女孩刚上小学，男孩还未到上学年龄)，以及年过花甲的婆婆，通通跪在院子里。一部分人用皮带没头没脑地抽打他们，另一部分人翻箱倒柜，甚至用刀将床垫割开，还在墙壁挖洞，说是要找“变天账”。“变天账”没找到，砸坏了一些家具，才悻悻离去。

过去伍老师婆家很有钱，在西城区有不少房地产，公公去世后，由婆婆当家。1949 年后，伍老师的婆婆将房地产陆陆续续地上交给政府，只在西四一条胡同里，留下一个四合院，和儿子、儿媳住在一起。

我曾去过伍老师的家，她家的四合院，向南三间房子作为卧室，东西厢房用作客厅、书房、厨房等。北边有一个可冲水的厕所。院里有一棵丁香树，一进小院，花香扑鼻而来，十分雅静。北京这种古老的四合院，比起小洋楼，确实别有一番情趣。

伍老师被抄家过后不久，居民委员会即命令他们腾出东西厢房，搬进去几家“红五类”住户，每家都在自己门前，搭一个小厨房。

俗话说，“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这话一点不假，院里住的人多了，厕所反而无人打扫，搞得小院臭气熏天。后来那些人干脆把厕所拆掉，盖了两间房子，又搬进去一家人，当然也在门前搭了一个小厨房。这样，本来挺幽静的小



院，就变成既嘈杂又拥挤不堪的大杂院，而那棵丁香树也被砍掉了。当时的人哪有心情欣赏树呀、花呀的，也不敢有此念头。

“红卫兵怎么会让你离开？”

“我告诉他们，我们学校也有红卫兵组织，如果不按时返校，会来揪斗我的。不论哪个单位，都有红卫兵，到哪里接受批判还不都是一样？于是他们批准我领着两个孩子返校了。”

此后，破“四旧”、抄家之风愈刮愈烈……

北京是全国的串连中心，每天要接待数以十万计来串连的学生。北京大的单位，都成立了红卫兵接待站，招待这些客人。我校也不例外。

由于本校学生大部分出去串连，传授他们的造反经验，不少教室都是空的。我们把教室里的桌子堆放在一个角落里，在水泥地上铺上草席，天冷后加上稻草，成为长长的通铺，让他们住宿。

这些客人可以免费乘火车、公共汽车，吃饭也不用交钱。我们这些没有资格出去串连的教员，都到厨房帮忙洗菜、切菜。我被分配在食堂为学生打饭菜。有的红卫兵，脾气还很大，嫌饭菜不合他们的口味，向我们大发其火。我们只能赔着笑脸解释，厨房大师傅的工作量突然增加了好多倍，有些菜是教职员帮忙炒的，味道不地道，请他们多多包涵。此外，我们还到他们住的地方打扫卫生，打扫厕所当然也是我们的事，因为红卫兵们忙于“革命”，顾不上这些小事情了。

一天干下来，累得腰酸背痛，却不敢埋怨一句。这时，有人注意到，好几天没看见陈老师了，她女儿也不知道妈妈的去向。她给天津家里去信，请爸爸立刻来北京。我们系也派人到北京各处去寻找。最后，在丰台火车站的一节空车厢里找到了陈老师的尸体，已经腐烂发臭，原来她已自杀好几天了。

我校虽然有好多学生到外地串连，但也留下一部分在本校闹“革命”。陈老师的学生开会批斗过她好几次。他们说，陈老师结



婚前有一男友是个特务,因此,她必然也是特务。

陈老师从小就学英语,长大了上北京辅仁大学英文系,是该系高材生。她英文基础扎实,教书极有条理,学生很佩服她。一夜之间,却变成了狗特务,被学生臭骂并对她大打耳光。陈老师对这种侮辱人格的做法无法忍受,竟抛下丈夫和独女而去。至于她为什么要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自杀,是否不想让丈夫和爱女看到自己死后的惨状?这将永远是个解不开的谜。

陈老师没有留下任何遗言,人们在她身旁只发现几个敌敌畏(杀虫剂)空瓶子。

后来,又在全国刮起了“早请示、晚汇报”之风,我校也和全国各地一样,每天早晨都要面对毛主席的像背他的语录,名曰“早请示”。每天晚上再次面向毛主席的像背语录,叫做“晚汇报”。

几天后,我感到这种形式似曾相识,突然想到,这和教堂里的早晚祈祷,和我那信菩萨的母亲早晚烧香拜佛又有什么两样?这种念头刚一闪现,我就责怪是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怪不得报上说要“兴无灭资”,要在灵魂深处闹革命。这不,我一碰到新生事物就暴露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了。

谁知“文革”过后,当人们谈起当年“早请示”和“晚汇报”时,才发现好多人都有和我相同的感觉,只不过不敢说出来罢了。有一位中学教员,就因为说出了这样的想法,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送去劳动改造。

在农村,家家都有“宝书台”,把《毛泽东选集》系上红带子,供在上面。墙上贴着毛主席的像,每个村庄都安装有线喇叭,整天播放革命样板戏和毛主席语录歌。

前一阵,神州大地突然再次兴起毛主席语录歌热,市面上出售“红太阳”的录音带,被年轻人一抢而光。据传,销售量高达几百万盒。



我一位朋友的女儿也买了一盒。她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出生的，自懂事起听的是郎爱妹，妹恋郎一类的情歌，猛然听到“红太阳”这种歌曲，觉得新鲜，在家不停地放。母亲对女儿说，别放了，它使我想起“文化大革命”的岁月，受不了。

有一天，我去王府井，经过一家商店门口，那里正在播放“红太阳”录音带里的一首歌，我驻足聆听：

金色的太阳升起在东方，光芒万丈。
东风万里，鲜花开放，红旗像大海洋。
伟大的导师，英明的领袖，敬爱的毛主席。
各族人民心中的太阳，心中的红太阳。
万岁毛主席！（男声再喊口号：毛主席万岁！）
万岁毛主席！（男声再喊口号：毛主席万岁！）
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万岁万岁毛主席！

他们将这首歌用流行歌曲的方法处理，节奏犹如“迪斯科”一样，一位女歌星软绵绵地唱着。

听着，听着，我不由忆起“文革”时我和桐斌一起唱这首歌的情景。我俩都很喜欢这首歌的曲调。那时，我们是以极为虔诚的心情唱这首歌的。

如今，虽然岁月流逝，唱法不同，我听到它时，仍然抑制不住对桐斌的思念。

在国外，桐斌就一直把毛主席当作祖国的象征。他在英国宿舍的墙上，就高高挂着一张毛主席像。为了祖国，桐斌可以洒热血，抛头颅，可以含冤工作，虽九死其犹未悔。他对七〇三所同志表示过，“只要能把我们的国防科研搞上去，我就是死了也心甘情愿”。

想到这里，我泪水盈眶，听不下去了。如果桐斌仍然在我身旁，情况会大不一样，我也会以欢快的心情来欣赏这首歌曲的。



杏儿

1967 年的一个礼拜天，我们全家都坐在客厅里，像往常一样，孩子们缠着她们的父亲讲故事，桐斌笑眯眯地说："好，好，让爸爸想一想。"

"爸爸不用想，我知道爸爸要讲什么故事。"

"你怎么知道？你又不是爸爸肚子里的蛔虫。"

"我就是知道……"

孩子们互不相让，你一言，我一语，正当她们争得不可开交时，忽然听见敲门声。我走去开门，只见门外站着一个高高的女孩，短短的头发，高高的鼻梁，大大的眼睛，看见我后莞尔一笑，露出洁白整齐的牙齿，显得又健康又美丽。她对我说：

"姑子，我是杏儿，您不记得我了吧！"

真是黄毛丫头十八变，1958 年，我见到她时，还是个小学生，黑黑胖胖，羞羞答答地躲在她母亲身后，不敢说话。几年后，竟出



落得如此风姿绰约，已是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杏儿是在杭州长大的，杭州话称姑母为姑子。她单名彭杏，但家人称她为杏儿。

我领着杏儿进了客厅，几个孩子早已围拢过来。杏儿见了桐斌，亲热地叫了一声“姑父”。

杏儿是我二哥的女儿。我二哥是黄埔军校十二期毕业生。

杏儿上完初中，因家境困难，不能继续求学，就进一家纺织厂当学徒工。她从小就喜爱越剧，整天哼哼唱唱的，后来江西越剧团招演员，面试时，老师见她身材高挑，五官端正，嗓音洪亮甜润，是唱小生的好苗子，虽然出身不好，也破格录取了。

杏儿出师后，一跃而成为剧团的台柱，在当地成了一位家喻户晓，受人喜爱的演员。

杏儿告诉我，“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们剧团负责人因为培养她这个“反动军官”的女儿，被认为是丧失了阶级立场而挨批斗，杏儿本人也被隔离审查，遭到毒打。

“他们打伤了你，谁演戏？”

“剧团本来已经瘫痪，后来江青同志说，越剧是靡靡之音，谁敢再演？大家更无事可做了。姑子，您看我身上的伤痕。”

“先不看了，我去给你腾个房间，你先去洗洗。”

说实在的，我神经衰弱，不能受刺激，不敢正视杏儿身上的伤痕。

杏儿接着告诉我，他们那里发生了武斗，都已经动刀动枪了。杏儿每天都挨打，她怕被打死，深夜偷着逃出来，换上一套旧军装，大家看她年轻，以为是学生。杏儿扒上了火车，到北京来避难。

我们为杏儿报了临时户口，可以住三个月。她那时只有二十岁，休息几天后，又生龙活虎般的了。

我家保姆是上海人，一听说杏儿是越剧演员，硬是要她唱一段，我没有同意，既然江青已为越剧下了结论，怎能再唱？万一被



人听见，岂不是自找麻烦，惹火烧身。

杏儿性格活泼，在家无事可做，呆不住。我给她买了一张公共汽车月票，让她到处去逛。

这是杏儿第一次来北京，她对什么都感到新鲜，除了天安门、北海公园、颐和园、长城这些风景区以外，她还跑到北大、清华、人民大学去看大字报。我带杏儿到我们学校去过一次，她的美貌引来不少男生的注目。

一晃三个月就过去了，申请延长临时户口不容易，加之北京形势也开始紧张，于是，我只好给她买了火车票，送她南下。

一直到“文革”结束后，才又恢复演越剧。杏儿从众多追求她的戏迷中，挑选了一个革命干部家庭出身的大学生做她的丈夫。婚后，随夫移居南昌。

十年浩劫期间，杏儿东躲西藏，荒废了大好时光，失去了往日在舞台上的风采，只好改行到她先生的工厂当一名仓库保管员，她先生是工程师，杏儿对她的生活很知足，对我说：

“挑一个出身好的爱人，我的孩子也就会有个好出身，他们不会像我们兄弟姐妹那样，过着受人白眼的日子了。”

杏儿走后不久，北京兴起了一股绣毛主席像之风，称之为“绣忠心”。

我家几个女儿也买了纱窗布，用十字花绣出毛主席头像，栩栩如生。老大还要求爸爸在她的小手绢上描出“毛主席万岁”几个字，然后她很认真地一针一针地绣。她们把这些放进镜框里，挂在墙上，以表示对伟大领袖的热爱。

在那时，人们身上都佩戴毛主席像章，这些像章开始是用金属做成的，有毛主席的头像、半身像或全身像。后来发展到用竹子、陶瓷和有机玻璃做成。



在做像章方面，七〇三所这个材料工艺研究所，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们有各种金属和非金属材料，技术也高超，做出来的像章又精致又漂亮。不但式样繁多，而且越做越大。因此，我身上佩戴的像章，总是引起人们的羡慕。

一次，保姆带小罗汉出去买菜，看见排队的人很多，就把小罗汉放在副食店门外的石墩上坐，等她买完菜出来，小罗汉身上那红彤彤、金光闪闪的像章早已不翼而飞了，气得保姆直跺脚，骂那个小偷不是东西，光天化日之下，竟敢从孩子身上偷毛主席像章。

我劝她："阿姨，别骂了，这个小偷也许是热爱毛主席才偷的，就当送给他的好了！"

这时，各单位掀起了批判走资派的高潮。我校的红卫兵认为校长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网罗了一大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教师，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派，多次开大会批斗他。偏偏这位校长脾气倔强得很，就是不承认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于是学生们把他的帽子揪下来，给他戴上了用纸糊的高帽子，上面写着"走资派"三个大字。

红卫兵命令校长坐"喷气式飞机"，一弯腰就是几个小时。发言人在讲到激烈的地方，就用脚去踢他。

有一次开批判会，校长的妻子正好站在我身旁（她是本校职工），只见她眼含泪花，拚命忍住。眼见自己的丈夫挨打，被侮辱，连哭的权利都没有，其心情可想而知。

这时，一位在行政科工作的党员实在看不下去了。他年轻气盛，自恃是贫农出身，站起来和红卫兵辩论，说我们校长不是"走资派"。红卫兵想不到竟会有教职员敢反对他们，把他推到台上，用笤帚沾着浆糊，在他身上贴几张报纸，用笔写了三个大字"小爬虫"[①]。纸糊的高帽子不够用了，他们就用字纸篓扣在他头上，代替高帽子，把他拖上台去陪斗。他不服气，几个人就拳脚交加，一



个头头带领大家背毛主席语录：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

背完之后，他又带领群众高呼口号：

"打倒走资派！"

"打倒小爬虫！"

"走资派，小爬虫不投降，就叫他们灭亡！"

除了这种全校批斗大会以外，还开各种中小型批斗会。一天下午，在教职工食堂临时搭起一个讲台，又开批判校长的会。主持会的人说，我们学校是"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这时，青年小章走上台，控诉校长对她的"迫害"，说校长叫她这个矿工的女儿当服务员，打扫卫生，却把一批乌龟王八蛋捧上讲台，这是什么样的阶级感情？小章慷慨激昂地引用毛主席语录：

"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小章接着说："你们这些臭知识分子都有罪，统统滚到毛主席像前跪下，向他老人家请罪！"

台下的教职员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总不能自己承认自己"臭"吧？

小章掏出一张纸，她念一个名字，就叫那个人跪下，一个接一个地点名，不久，台上跪不下，就让他们原地跪在台下，面向毛主席请罪。我抬头一看，周围跪着的人比站着的还多。正在这时，她走到我和伍老师面前，大喝一声：

"谁是伍某？"

"我！"

"跪下！"

伍老师跪下后，小章走到我面前问：



“你叫什么名字？”

我正待回答，进来一个男红卫兵把小章叫出去。小章的这位战友可能认为这种做法不太妥当，和小章嘀咕了一阵，回到会场对大家说：

“小章同志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要你们向毛主席请罪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们无产阶级有解放全人类的胸怀，难道还不能改造你们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你们必须老老实实地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

说完，他让大家起立，高歌《大海航行靠舵手》。此时，我感到大家都轻轻地松了一口气，因为只有会议结束时才唱这首歌。

一天，我让几个孩子擦窗玻璃，打扫室内卫生。她们一面干活，一面齐声背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我听见后问：“你们干嘛背起毛主席语录来了？”

“老师说，碰到困难时，一背毛主席这段语录，就会力量倍增。”

“打扫卫生有什么困难的？还用背这段语录？”

“那我们就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三不怕累！”老二说。

小罗汉也跟着学舌。我一听大吃一惊，真是不懂事的孩子，毛主席的指示怎能随意更改，这还了得？我急忙大声制止：

“快别背了，快别背了！”

孩子们见我这样害怕也吓得不知所措。桐斌闻声走来，问明情况，一面摸摸孩子们的头，一面对她们说：

“毛主席的原话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红小兵热爱毛主席，对毛主席的指示不要随意更改，以后注意点，好吗？”

孩子们点点头，桐斌接着又夸奖了她们，卫生搞得很干净，说她们热爱劳动，都是乖孩子，好孩子。

回我们房间后，桐斌埋怨我不该这样大声斥责孩子，我分



辩说：

"不是有人把毛主席语录写错被关进牢房吗?"

"你可以好好地跟她们说嘛，都是做妈妈的人了，怎么还和当学生时一样性急啊!"

这几天桐斌在家休息，每年5月他就患花粉过敏症，鼻涕眼泪的，不停地打喷嚏，还发烧。医生为他打了针，让他休息。

那一阵七机部两派发生了几起小规模的冲突。我们家离某"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总部很近，被他们宣布为戒严区，晚上9点后，就不能外出。

我向桐斌建议，到我们学校去避几天，那里离中医院近，反正这一段时间也没有什么工作，不如去医院检查一下，也许中医对这种过敏症有治疗办法。

但是，桐斌不同意，说是6月初有一个重要会议，只要能起床，他必须去参加。后来，桐斌还是带着好些条手帕，抱病去参加了会议。

注释

① 小爬虫："文革"中评论人的一种政治用语。有时和"变色龙"一起用，一般用来比喻见风使舵的政治投机分子。(参见金春明等编：《"文革"时期怪事怪语》，第247页，求实出版社，1989年)



留取丹心照汗青

1968年6月8日，早晨一起床，我就想着回家，因为最近几天，桐斌工作地区形势紧张。另外，我们学校将于10号去农村参加夏收劳动。我得回家准备一些衣物用品。正在这时，有位同事来告诉我，凌打字员上吊自杀了。

凌和她的先生宗老师是20世纪50年代初从法国取道香港回国的。宗老师在巴黎留学。凌是一位贤惠、能干、好客的家庭主妇。他们的家经常高朋满座，被朋友们称之为“留学生沙龙”。

凌打字员是广东人。兄嫂在香港定居。当他们路经香港时，兄嫂见他们结婚多年，没有子女，便将刚刚会走路的小女儿过继给他们，一同来到北京。

到了中国，他们发现，生活和在巴黎时大不一样。政府鼓励家庭妇女走出厨房，参加工作，凌就做了英文和法文打字员。她一如既往地热情好客，把家整理得有条不紊。



1957年，大鸣大放时，宗老师曾对上级的某些做法有过不满的言论，这就可能被打成右派。为了摆脱自己的困境，宗老师听从了上级的话，揭发了另一位老师不满某领导的言论，该老师被打成右派，宗只是受到批判。

宗的行为遭到同事们的鄙视，凌也跟着遭殃，忍受别人白眼，她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文化大革命"开始，宗老师被当作漏网右派关进牛棚，挨打受骂。有个红卫兵还以各种酷刑折磨宗老师，拔他的眉毛，还命令宗舔他的鞋底，宗老师几次自杀未遂。人们要凌打字员揭发其丈夫，并和丈夫划清界限。凌一言不发，被说成是包庇右派分子。

6月7日，在凌打字员住的七号楼墙上，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指名道姓地说她和一位政工干部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心高气傲的凌，大字报还未看完，就跑回家中。她上初中的女儿回忆：

"妈妈哭了一夜，直说有冤无处申。第二天早晨，我离家上学前，妈妈从床上起来，为我整理头发，摸平衬衫的衣领，要我好好学习。谁知中午放学回家，一开门，发现妈妈高高吊在屋梁上。"

小姑娘见状吓得放声大哭，等邻居们闻声赶来时，凌早已气绝身亡了。

凌在打字室工作，每个系的教员都认识她，对她的自杀，无不为之震惊，心里也很难过，但什么也不敢说。凌的女儿刚上初中，爸爸被关在"牛棚"里，一个小姑娘怎么生活？虽然我们都为这个小姑娘的命运担心，但却爱莫能助。

谁知就在这天下午，一场飞来横祸却降临到我的头上。

6月8日早上，桐斌手提一热水瓶开水，骑着自行车，按时上班。一进办公室，他就擦桌子，扫地，泡上一杯茶，然后静下心来办公。

快12点时，桐斌收拾办公桌上的书籍文件，下楼准备回家吃午饭。这天去办公楼上班的人不多，有两位七〇三所的工程师，见



到桐斌，急忙打招呼："姚所长，您还在'抓革命、促生产'啦！外面都有人在武斗了，您还是等一等，先别回家。"

"谢谢你们的好意。上午我只批完了一个技术报告，吃完饭还得回来接着干。再说，武斗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现在七〇三所仍然保存着桐斌于 1968 年 6 月 8 日在技术报告上的批注，这是桐斌最后一次签写他的名字，竟成为他的绝笔。

一进家门，孩子们立即围过来，"爸爸回来啦！爸爸回来啦！"桐斌洗完手，亲了一下跟在后面的小罗汉，抱着她走进饭厅，还未坐稳，传来一阵粗暴的捶门声。

"开门！开门！"

住在我家的另两家人吓得躲进各自的房间。桐斌将小孩哄进保姆房里，向大门走去。

咚！咚！咚！"到底开不开门？"

正当桐斌走到门边时，门已被钢管砸开，一伙人冲进来。

"请问，你们找谁？"

"妈的，找的就是你，干嘛磨磨蹭蹭不开门？"

接着一阵噼叭的耳光。

打耳光，桐斌见过，在上海，在无锡，他亲眼见过日寇打同胞的耳光，汉奸打老百姓的耳光。正是这些，使得他发奋图强，刻苦钻研，立志用科学报效祖国。正是这些，使得他向往共产主义，后来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今天，他的脸上却被"同志们"一再狠狠地打耳光。

暴徒们骂骂咧咧地将桐斌连拖带推地架下楼去。在楼门前，一个暴徒上前左右开弓又是两个耳光。这样还不解恨，眼镜，那副伴随桐斌无数个日日夜夜的眼镜，在显微镜下，在熔炼炉前，就在一个多小时前，还用它阅读关于我国将要试制第一颗人造卫星文件的眼镜，被一把从桐斌脸上抓下，扔在地上，踩得粉碎。



在中国，往往将眼镜和知识分子连在一起。那时，知识分子被认为是“臭老九”，是“反动学术权威”。人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知识分子不会做工，不如工人；不会种地，不如农民。因此，他们从心里厌恶蔑视知识分子，将憎恨发泄在眼镜上，发泄在桐斌、留过洋的博士身上。

人越围越多，他们对桐斌拳打脚踢。这时有两个混入“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暴徒——一个是七机部下属七一一厂的炊事员高某，用他那切过肉，砍过骨头的手；另一个是从七机部在永定路下属某所调来武斗的电工于某，用他那受过操作榔头训练的手——各执一根暖气管，狞笑着向桐斌头上猛击，桐斌当即被打倒在地。

四十多年来，桐斌智慧的头颅，不息地工作运转，不敢有片刻的懈怠。小学、中学、大学、双博士，哪一次不是尖子。在国外工作时，那些外国同事无不以能和桐斌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中国人共事而自豪。桐斌在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博士导师康德西教授(V. Kondic)曾在给我的来信中称赞桐斌是他最好的学生之一。桐斌在亚亨工业大学的同事弗伯格教授(M. G. Frohberg)在给我的信中道：“桐斌有着阳光般的魅力，我们大家都喜欢他，也都钦佩他的学识。”

四十多年啊，桐斌吸取、包容多少学问与知识，正义和博爱。他爱科学，爱事业，爱祖国，爱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桐斌的头颅运转着，从未停歇过，不仅在逝去的日子里创造了殷殷的果实，而且对未来充满憧憬。

“等‘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咱们还要大干一场！”这是桐斌在1968年5月对七〇三所工程师们讲出的期望。

“洁清，我们的甜蜜日子还长着啦！我们还能为祖国工作二三十年。”这是桐斌对未来的憧憬。

然而，就在这一瞬间，无知与残暴就这样灭绝人性地毁灭了这无价的瑰宝。



死，本来是自然生命的结束，我和桐斌曾经谈到过死亡。

有一年的中秋节晚上，我们一家在阳台上赏月，当孩子们去睡觉后，我和桐斌仍然留在外面，在如水的月光下，我们静静地坐着，幸福和宁静充满我的心田，我俩此刻是如此心心相印，我对他喃喃细语：

"桐斌，我真希望能和你生生世世为夫妇！"

"你这个小迷信，哪有什么今生、来世！"

"可是我小时候妈妈总是要我听话，说这世如果是乖孩子，来世也会投胎变人。"

"老人家信佛，你怎么也相信？"说完他挽起我的手，向卧室走去。

那时，死亡对我们来说，是遥远的事。而现在，死亡却已成为可怕的事实。

桐斌被打死了，我们美好的一切都被狂风掠去，这残酷的现实令我悲痛，也令我恐惧。失去了桐斌的日子怎么过？我想都不敢往下想。

但是，太阳照常从东方升起，星星依旧在夜空中闪烁，我也不得不勉强自己，强打精神来面对这严峻苦难的日子，直面惨淡的人生。

到了星期一，我托人把这个噩耗通知桐斌在北京工作的弟弟和在成都大学教书的妹妹和妹夫。他们手足情深，哥哥被杀害的噩耗，使他们夜夜在梦中惊魂。

妹妹和妹夫来京后暂住我家，照料我和孩子们。当他们清理桐斌的遗物时，发现他除了中外文书籍外，只有几套换洗的衣服。

妹夫无限感叹地说："唉！工作这么多年，还是和做学生时一样，不讲究吃穿！"

妹妹说："我二哥正如鲁迅先生说的一样，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



她眼泪盈眶地接着说："二哥！你为什么会落到这样惨的下场啊！天下竟会有人将如此温和善良的人活活打死。他们有人性吗？"

妹妹还告诉我，每个月桐斌一发工资，除了向老家母亲寄生活费外，还给他们寄一些营养品。6月初，他们刚刚收到奶粉和白糖等物，谁知才过一两天，却收到了哥哥不幸被害的电报。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哥哥不是刚刚给我们寄了包裹吗？

周恩来总理听到桐斌被害的消息，震惊得手中的茶杯跌落在地。他指示公安部长谢富治立即查明此案。之后，七〇三所和七机部其他部门的人，才敢来我家探视。他们说，早就想来看望我，但我们家的四周，总是有人在监视，不让入内，直到周总理明确指示后才撤走。

这些来我家的人，绝大部分是工程技术人员，他们对桐斌的被害，既悲痛又惋惜。

有一位工程师说，5日和6日两天桐斌还参加了一个会议，参与讨论了我国计划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技术问题。在会上，桐斌提出七〇三所可以负责卫星的防热系统群。回所后，桐斌立即向各有关科室布置具体任务。

另一位工程师提到他在清理桐斌办公室的遗物时，发现就在被害的当天上午，桐斌还在批改卫星保温防热材料的文件。

一位身患绝症的女工程师听到此处不禁失声痛哭："为什么不是我死啊！我真愿用我的生命来换取姚所长的生命。我死了不足惜，姚所长死了，我们所的工作怎么办？"

她的哭声引起了一片唏嘘，真是流泪眼对流泪眼，断肠人对断肠人。

1961年，聂荣臻元帅做了一个关于科研工作的报告，在报告中，聂帅说，我国科研工作应该尽快出人才、出成果。



聂帅强调，属于技术上的事应该由技术人员来决定，各级要有技术指挥员，对他们的工作我们要支持。聂帅还很谦虚地说："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大管理员，你们（指下面的各级领导）是小管理员。"

聂帅的报告受到广大科技人员的热烈欢迎，报告被简称为"科研工作 14 条"。

这样一个有远见，对国对民有利的报告，在"文革"中竟然受到批判。有人甚至贴大字报，说"14 条"是一棵大"毒草"，说它不抓阶级斗争，是修正主义纲领，走的是修正主义道路。

后来，有人在大街上贴"炮轰聂荣臻"的大字报，桐斌见后认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但他的话有谁听？"炮轰聂荣臻"的大标语在北京街头比比皆是。桐斌对我说，像聂帅这样一位对国家有卓著功勋、德高望重的人竟然受到炮轰，真是咄咄怪事，他无法理解，也不能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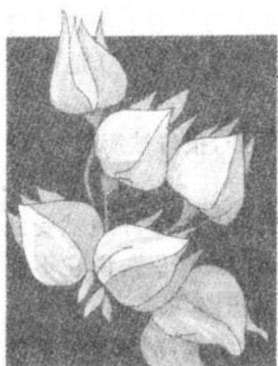
七〇三所的人还谈到在 1967 年 3 月，聂帅曾做过一次报告，强调指出，不能搞乱科研单位，不能中断科研，不能砍掉科研，要着眼于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还提出要大力加强科研机构，要筹建材料研究院和其他研究院。

桐斌在向七〇三的职工传达聂帅的报告时，心情无比兴奋，说到激动处，热泪盈眶。最后他向大家表决心："只要能把科研搞上去，我就是死了也甘心，同志们，我们大家努力吧！"

一位留学苏联的工程师说："我们听后都拚命鼓掌，姚所长的话，也说出了我们工程技术人员的心愿。谁知他竟会遭此不幸，我们不仅失去了一位好领导，也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说着眼眶一红。我一直强忍着的泪水，也滚滚而下。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桐斌！你的言行将激励着你的同事们完成你未竟的事业。今天，我国自制的火箭和卫星早已上天，看到这些你为之付出了辛勤劳动的科研工作结出的丰硕成果，我相信你一定会含笑九泉。



忠字舞

桐斌惨遭杀害已经好多天了，我几次向军管会要求尽早做出政治结论，但军管会一再说，七机部的情况复杂，要我耐心等待。

过了几个月，七〇三所的人来到我家，将抚恤规定讲给我听：

一、一次发给430元抚恤金。

二、孩子每人每月20元生活费，直到十六周岁为止。

对第一点，我无异议。就第二点，我提了一点意见。我认为孩子的生活费应该领到大学毕业或者参加工作为止。因为小孩七岁上学，十六岁刚刚初中毕业，没有独立生活能力。他们点头称是，但是后来发给我的书面证明，仍然是到十六岁为止。

很多人告诉我：



“你知道,他们在外面放出什么谣言?他们说政府给你们发了两万元抚恤金。”

“明明是430元,怎么变成了两万?这些人怎么这样?我家遇此大难,他们还要造谣中伤。再说,就是给我全世界的黄金也换不回我爱人的生命。”

7月初,我返回学校。当时全国停课闹革命,没有寒暑假了。

我们学校原来的领导几乎全部靠边站,很多在受审查,没有行动自由。

回到系里后,当我见到原系主任时,不由得靠在她肩上黯然泪下。系主任像个大姐姐似的轻轻拍拍我,满脸同情和无奈,无言相对。她是我校第一个被打倒的干部,她能对我说些什么呢?

但是别人告诉我,我班上一位极“革命”的学生在教室里讲我:“她爱人被打死了竟没见她流一滴眼泪,我看其中有问题。我们得去调查调查。”这个学生讲完后见班上无人理睬,调查之事胎死腹中。

他是异想天开么?不只他一个人如此,那时,红卫兵把中老年知识分子都当作敌人或准敌人看待。

一次,有一个名牌大学的女红卫兵来我校做报告,传授他们的“先进革命经验”。这个女红卫兵也就二十出头,头梳两把刷子,身着绿军装,腰系皮带,并佩戴红色袖章,看起来神气活现。

她一上台就高举手中的“红宝书”,带领大家呼口号:“敬祝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然后又领着全体人员背诵:“马克思主义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我们也都高举随身带的“红宝书”,大声呼喊:“造反有理!”

她在报告中有一条经验,我至今想起来还毛骨悚然。

那位女红卫兵说:“这些老家伙都是一些顽固不化分子,对他们不能手软。他们不老实时,我们就用老虎钳给他们拔牙,让他们尝尝无产阶级铁拳头的滋味,这样,他们才会交待自己的罪行。”她



一面演讲，一面将手握成拳头向上高举，以示其革命决心。

我听后不寒而栗，红卫兵的这种做法和狄更斯《双城记》中那位一面织毛衣，一面泰然自若地数着当天断头台砍下了多少脑袋的那个妇女有何两样？这样的学生，以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返校时将孩子们全都带过来了。从此，我既是母亲，又是父亲。白天，我强打笑容，以免孩子们伤心。她们的学习，原先是桐斌管，检查作业，答疑，开家长会，都是他。现在突然落在我的头上，这副担子好沉重。

我提心吊胆地度日，生怕再飞来一场横祸。我对孩子们很严。听说社会上有"手抄本"，故而她们看的书，我都先检查一遍，生怕稍一不慎又会带来无妄之灾。

夜里，我感到桐斌仍在身旁，安慰我，鼓励我，开导我，用手轻柔地摩挲我。我对他说，"桐斌，请放心。我一定会把孩子们抚养成人。"

我实现了对桐斌的诺言。如今女儿们全都成家立业。我虽然备尝艰辛，但是，只有这样，才能表达我对桐斌的眷恋之情。

我对桐斌的思念，生生世世，魂牵梦萦，至死不渝。

回忆当时，我家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桐斌的弟弟为了减轻我的负担，提出领养一个孩子住在他家，我婉言谢绝了他。孩子们已经失去了父亲，岂能再让她们离开母亲？

那时提倡艰苦朴素，我的孩子穿着布衣布鞋也很高兴。她们膝盖和袖子上打着补丁，认为是光荣。

冬天，我买很多的胡萝卜，吃起来又脆又甜又凉，孩子们说比苹果还好吃。

夏天，西红柿便宜，凉拌后冰在凉水里，一点也不比西瓜逊色。

北京鱼头价格低廉，2 角 5 分钱一斤，我经常买鱼头，做沙锅



鱼头，孩子们吃得津津有味。

大骨头上面没有肉，只要 7 分钱一斤，我买回后，用斧头劈开，里面有骨髓，和大白菜、粉丝一起熬一锅汤，营养丰富，味道鲜美。孩子们把它当成美味佳肴，齐声说："妈妈，真好吃。"

磨难就是成长，几个女儿一夜之间成熟不少，很懂事。她们提议到居民委员会取些纸盒子糊，或找点挑补花的针线活，以补贴家用。她们的话，令我心酸，我强忍眼泪说：

"乖孩子，你们只要用功读书，妈妈就喜欢，家里的费用由妈妈安排。"

其实，随着孩子们长大，上中学，进大学，我家的经济状况也越来越紧张，我不得不卖掉我们的照相机、电视、收音机和桐斌的手表、衣物。我心中虽然舍不得，但我相信桐斌一定会支持我这种做法而不愿我申请补助。

尽管家境困难，我还是给她们一些零用钱。上小学时，每周 5 分钱，中学时，每周 1 角钱，大学时则加到 1 元钱。她们将钱存在"聚宝盆"里。有时，老大会拿出 3 分钱给小罗汉买一根冰棍。她没上学，不发零用钱。

当时，每逢节日，每户都可以买平价糖果。我总是购买有色彩鲜艳包装纸的水果糖，每种花色买一两。买来后，我将它们混在一起放在我们的饭桌上。我喊："一、二、三"让她们各自挑选喜欢的糖纸。老二手快，又有主意，总是抢到她想要的。小罗汉也不落后。只有老大，拿起这颗，又想改成另一颗，最后，只好拿别人剩下的。

她们很珍惜这难得的机会，将糖纸也保留下来，以便和同学交换。

看到这些，我笑在脸上，却伤痛入骨。

每天放学回家，她们都抢着帮我做家务，小罗汉一颠一颠地跟



在后面，跑来跑去，也想干点活，姐姐们却不领情。

"小罗汉，快走开，别在这里帮倒忙！"

有一回，小罗汉肚子里有蛔虫，我立即去买了一些驱蛔灵，拿回家后，竟然看不清上面的服用方法，我向邻居抱怨："怎么搞的，把字印得这样小。"她拿去一看，"不是清清楚楚的吗？你的眼睛有毛病吧？是不是老花眼？""什么？"，我不敢相信，我和她都才三十八岁呀！难道心灵的创伤会给身体带来如此大的变化？怪不得我还大把大把地掉头发。

平时，我们住在学校，到了周末，我们母女都回南郊的家。只要有一次不回去，就会有谣言出来，说我是特务，被抓起来了。因此，不管我们多么疲惫，也不管天寒地冻还是烈日当空，我们每个周末都往家奔。实在太冷时，就在西单下车，找一个小饭馆吃点东西暖和一下。由于小饭馆卫生条件差，使得女儿们先后都传染了急性肝炎，令我懊悔莫及。

那时，在我的意念中，总是下意识地认为桐斌只不过出差到远方某个国家去了，不定哪一天，我推开家门，会喜出望外地发现他已经回到家中，静静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等我。

过去曾有一次，我在动物园换车，抬头一看，桐斌和几人向我迎面而来。

"哎呀！桐斌，你怎么会在这里？你现在回家吗？"

我高兴得大声喊叫，身旁的人都笑了起来。其中一人说：

"老姚，这位是你爱人吧。"

桐斌一一向我作了介绍。原来他们都是科学家，和桐斌一起参加一个会议，开完会正准备各自回家，恰巧被我碰上了，就搭他的车一起回家。

如今，我每次经过动物园，总要向四周看一看，盼望着还会巧遇桐斌！



此时，我们学校已经进驻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它由军宣队和工宣队组成。这种接管权力的形式，是毛主席亲自决定的。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各地群众都分成了两派或更多的派。中央文革小组支持造反，所以各个组织都标榜自己是造反派。他们把老干部打倒后，自己掌权，其他派不服，为争夺领导权，不断引起冲突，以至于发生武斗。无论哪派，都标榜本派忠实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最革命的。

在外地，武斗之风早已蔓延。譬如安徽省，就分成两大派。夺了权的那一派认为形势好得很，称之为“好派”。没有掌权的那一派说形势好个屁，称之为“P 派”。他们为着争夺权力，真枪真刀地武斗了起来。

到了 1968 年初，北京的造反组织也分成两大派。一派以北京航空学院“红旗造反兵团”为首，称为“天派”。另一派由地质学院“东方红造反兵团”领头，叫做“地派”。这两派的头头都是最早冲锋陷阵，造反起家的，都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因此，谁也不服谁。他们在校园里筑工事，用大棒、长矛做武器，打得不亦乐乎。

一些厂矿企业也卷入了两大派斗争之中。今天这一派夺权，把另一派打成反革命。明天另一派夺权，又把这一派打成反革命。局势混乱不堪，于是毛主席决定派解放军和工人进驻大学。

“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我们学校以后，掌权的是军宣队，工宣队只不过是做些具体工作而已。他们首先抓阶级教育，让大家挖野菜，加上一点玉米面，做成“忆苦饭”，让大家忆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

老工人说，国民党统治时，工人收入很低，无法养家，只好挖野菜度日，解放后才过上好日子，这一切都得感谢大救星毛主席。

这时，会场上“毛主席万岁！”、“永远跟随毛主席干革命！”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声震屋瓦。



另一位工人也上台忆苦。解放前，他和母亲要饭时，地主非但粒米不给，还放狗咬他们。说到此处，这位工人卷起裤腿，露出一块伤疤，一面哭，一面指着伤疤说："你们看，这就是地主的狗咬的，我们决不能忘记旧社会的苦。我们一定要打倒走资派。"

说完他带头高呼："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我们大家高举"红宝书"跟着他大声喊口号。

这种阶级教育的继续，是让人们对毛主席"表忠心"，在军宣队领导下，教大家跳"忠字舞"。当时全国城镇、农村，不论男女老少，都在跳。

我校组织了宣传毛泽东思想联欢会，每个系的教员和学生各演出一个向毛主席表忠心的节目。有歌唱、舞蹈，活报剧等。

英文系教职员被指定跳"忠字舞"。一共 12 人站成 3 排，每排 4 人。教职员中，没有被隔离审查的不多了，因此，我也被指定去排练"忠字舞"。

我们每个人都胸佩毛主席像章，手捧《毛主席语录》，一面唱着"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首歌，一面跳舞。歌词如下：

敬爱的毛主席，
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敬爱的毛主席，
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要对您讲。
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给您唱。
哎！
千万颗红心向着北京，
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
我们祝福您老人家，
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按着音乐的节拍，我们或前或后，或左或右地踏着舞步。唱到“敬爱的毛主席”时，大家回头看看墙上的毛主席像。唱到“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时，便把毛主席语录紧贴在自己心口处，表示“心中的”。接着两手分开，有节奏地来回高举摆动，然后用手势比划个圆形，代表“红太阳”。

这种做操式的舞蹈简单极了。但有一位年近古稀的易老师从未跳过舞，没有节奏感，总是慢一拍。但是为了向毛主席表忠心，他还是上台和我们一起表演。

学生们对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教员，能上台表演“忠字舞”颇为满意。一位圣约翰大学毕业的女教员手风琴伴奏得棒极了。因此，我们的歌舞一停，立即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大家心里很是高兴，我的孩子们更是雀跃不已，逢人便讲：

“我妈妈上台表演啦！”“我妈妈跳‘忠字舞’啦！”

可惜，这种欢乐的气氛很短暂。一天夜里，高音喇叭响起了到大操场紧急集合的命令。那时，晚上经常有最高指示发表，因此，睡觉时把衣服放在床头摆好，喇叭一响，立即穿衣，头也不梳就往外跑。黑灯瞎火的，谁也看不清谁。整齐是次要的，必须按时排队。

这次紧急集合，不是传达最高指示，而是有人在教室黑板上，发现了一条“反动标语”，叫大家排队到那间教室。我校红卫兵站在那里观察大家的脸色，以确定谁有嫌疑。经过黑板时，只见字迹模糊，写的是“社会主义……我止步”。我想仔细看一下，又不敢多停留，好像自己做了亏心事似的。后来，同事都说，没有看清楚反动标语的内容，也不知道用这个方法是否揪出了“反革命”。

一天，已过了放学时间，老二还没有回家，我很焦急，跑到学校后门去寻找。她上的小学在我校后门外，每天上学、放学时后门开放，以便让孩子们进出。我走近后门时见它已关闭，表示孩子们都



已回家了。我带着不安的心情，跑回六号楼，回到房间里，见老二已在家，我才松了一口气。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家？妈妈好担心。"

"我早就放学了，是解放军叔叔找我们到办公室写字，所以回来晚了。"

"写字？他为什么叫你们写字？写些什么？"

"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叫我们每人写两句话：一句是毛主席万岁，一句是打倒刘少奇。"

老二一说，我心里便明白几分，后来别人告诉我，在我校后门墙上，也发现了"反动标语"，写的是"打倒毛主席！"他们从标语的高度、字迹的幼稚推断，可能是小孩子写的，所以召集小学生写字，辨认笔迹，经过他们核对，孩子们的笔迹和标语的不一样，他们只好再到别处去查找作案者了。

此时，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每个人再次受审查，要求大家重新写一份自传。我们教员写的自传都交给了工宣队，由工宣队和系革委会审阅。系革委会主任是我班那一位"左派"学生，这样，学生们就掌握了教员们的人事档案。当然，也找到更多"阶级敌人"。

一个星期一，我从南郊的家回到了六号楼，只见对面203号于老师的门上贴了一张大字报，宣布于老师是台湾特务，勒令她老实交待，低头认罪。在于老师的姓名上用红笔打上×××。

据说，在封建王朝时代，将死刑犯绑赴刑场时，背上都插着一块牌子，写上犯人的名字，用红笔打上×。红卫兵将封建王朝这一套东西搬来了。"文革"时，他们要打倒谁，就把那个人的名字打上×或者将名字倒过来写。

红卫兵在大字报上，勒令于老师老老实实呆在房间里写检查，交待自己的罪行，不许出门一步。



做饭时，于老师只好让两个上小学的女儿把炉子抬进房里，做完饭再把炉子抬出去，以免煤气中毒。至于买菜、打水、倒便盆这些活，都得由女儿干。放学后，这两个女孩子就进进出出地忙个不停。

于老师的公公，曾在日本留过学，并娶日本女子为妻。他在日本是学桥梁工程的，回国后是武汉长江大桥主要设计者之一。

于老师本人出生于台湾南部，长得婀娜娉婷、娇柔欲滴。高中毕业时，被一个国民党官员看中，于老师不甘心做姨太太，逃到日本求学。该官员势力大，又派人到日本向于老师纠缠，她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来到大陆。

在大学时，于老师认识了未来的丈夫，她的先生虽然只有一半日本人血统，但像日本男子要求妻子那样，也要于老师做个百依百顺的日本式太太。于侍候他稍微不周，非打即骂。于老师无法忍受，只得和丈夫离婚。她的丈夫和婆婆在"文革"前就回了日本。于老师在我校教书，养活两个女儿。她的女儿本来是红小兵，这时，也被开除出红小兵组织了。

1974 年，于老师的前夫把两个女儿接到日本定居。现在一个在电台工作，一个在医院当护士，两人都与日本人缔结秦晋之好。

于老师留在北京重新组织了家庭。经调查，所谓于老师是特务纯属无稽之谈。

邮递员送信，只送到学校传达室，不送到宿舍。因此，我们在取信时，总是顺便把邻居的信带来。

一天，我见有两封 202 号李老师的信，就拿回给他送去。我敲了好几下门，他才开门，站在门口没有请我进去，只是告诉我，他已被隔离审查，不能和任何人来往了。我听后，把信交给他，默默地转身走开了。

在那个年代，今天是同志，明天就可能成为阶级敌人。今天是



台上的英雄，明天就可能是牢房的囚徒。今天是战功显赫的将军，明天就可能被指控为土匪、军阀。这种事例屡见不鲜，我对李老师被隔离审查，也就见怪不怪了。

由于每个星期我都去七机部找军管会，要求给桐斌做结论，因此，没有注意到学校里的新动向。从李老师门口走开后，我到校园去看大字报，才知道李被牵连进一个重要的案件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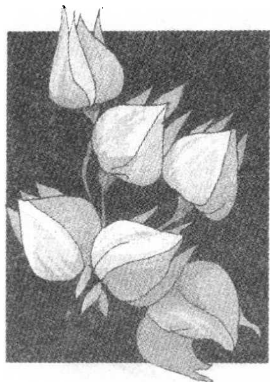
这位李老师，年富力强，精力充沛，家眷又不在身边，除了和本系的学生来往外，他还认识一些日语系学生。这可能和他是朝鲜族有关吧！

同李老师来往的日语系学生中，有一个姓谢的学生，从鸭绿江偷渡到北朝鲜，企图取道北朝鲜去日本，被北朝鲜公安机关遣送回中国。

谢被公安机关关押，在审讯中供认，他曾和李老师偷听过外电广播。

当时，对外国电台，一律称为"敌台"，禁止人们收听。他们真是胆大包天，竟敢偷听敌台广播。我们一般人都奉公守法，不敢偷听。

谢还说李老师曾经和他一起议论毛主席，李否认有过此事。由于没有第三者作证，李老师没被关押，只是留在学校里隔离审查，并监督劳动。而那位姓谢的男生，因叛逃罪被判了徒刑。



周总理的关怀

回国以后，经常听到一个称呼，就是“苏联老大哥”。

当时中国的官方宣传，把苏联描绘成一个忠厚的兄长，给中国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以无私的援助。苏联真是这样一个国家吗？我疑信参半。

在科技大学教书时，遇到一位俄语老师，曾当过翻译，我问她苏联专家怎么样。

“苏联专家可好啦，工作认真，生活严谨，不多讲话。”

曾几何时，“牢不可破的中苏友谊”发生裂痕。1960年，苏联从中国撤走了全部专家，两国关系趋于紧张。这个时候，关于苏联的说法就大不一样了。还是那位俄语老师，但她的口气完全变了。

“苏联趁我国三年自然灾害逼债，中国人民饿肚子，还得勒紧裤带还债，而且苏联要求苛刻，故意刁难。中国用来还债的苹果，他们放进圆筒里量，大一点不行，小一点也不行。给他们的猪肉，



也用尺来量厚度。”

“苏联专家和他们的夫人都住在‘友谊宾馆’，除了工作以外，从不和我们中国人来往。”

这位俄语老师此时之言，我毫不怀疑。从中学时代，我学了中国和世界历史，就知道俄国远非礼仪之邦。

满清末年，沙皇侵占了我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大片的中国领土，面积是法国和德国的总和。据说，列宁曾经说过，一俟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就将沙皇非法侵夺的领土交还中国。斯大林根本不提此事，这句话至今没有兑现。

1969 年春，一天，学校的高音喇叭又响起来了，召集全体师生员工在大操场集合。红卫兵宣布：苏联侵占了珍宝岛，要求大家到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去游行抗议。珍宝岛是乌苏里江上的一个小岛，历史上属于中国的领土。苏联人称它为“达曼斯基岛”，说它是属于苏联的，两国一直对这个岛的主权有争议。这时，苏联趁中国“文革”混乱之机，占领了珍宝岛，不让中国船只靠岸，挑起了武装冲突。

我们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无不义愤填膺。大家怀着同仇敌忾的心情，爬上了学校为我们准备的大卡车。到了苏联大使馆所在地区，大家一面绕着大使馆游行，一面高呼口号：

“打倒苏联！”

“打倒新沙皇！”

“打倒苏联社会帝国主义！”

一时间，苏联使馆周围，人山人海，群情激昂，口号声响彻云霄。许多中老年教员，虽然在挨整被斗，但拳拳爱国之心却丝毫未减。

这时，毛主席发表了最新指示：“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此后不久，每个单位都放映《地道战》。

《地道战》这部电影是描述抗日战争时，华北农村挖地道以打击日寇的故事。然后又组织大家去前门外大栅栏，参观地下防空洞。该洞挖得很深，里面曲里拐弯的，面积不小。经过这一系列活动后，军宣队就动员我们在本校挖防空洞，同时进行战备教育，教大家急救方法。

北京的居民，每家每户也必须挖防空洞，一时弄得人心惶惶，似乎战争迫在眉睫。有些人甚至将衣物家具变卖，准备逃难。我校一位牛老师，是归侨。他把一套英国料子西服送到旧货店，只卖了 5 元钱。

这年 10 月，总参谋长黄永胜向全军发布了《林副主席第一号令》[①]，命令部队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第一号令》发布后，全国各机关、学校大力精简人员，将大批干部下放到农村"五·七干校"劳动。

我们学校在 1970 年初，也被宣布为撤销单位，全校师生员工下放到河北农村插队落户。学校图书馆的书一本也不搬，全部处理掉。教职员们都排着队，把自己的书以每公斤 7 分钱的价格当作废纸卖掉。下乡务农用不着书，更不要说洋文书了。

军宣队宣布：3 月底，全校人员必须搬迁完毕。不料正在此时，小罗汉传染上了急性肝炎，住进了医院，我无法下农村，心急如焚，只好向军宣队报告，要求暂缓下乡。军宣队领导回答：

"不行，必须和大家一起走。"

"那么我住院的孩子怎么办？"

"你带大的先下去，等小的出院时再回北京接她。"

"她只五岁，又是女孩，住院期间我不去探视行吗？"

军宣队没有应允我的要求，我只好跑到医院，看看能否将孩子接出院，医生以惊愕的目光注视着我：

"传染病怎么能提前出院？"



我只好回家，一面整理东西，做去农村的准备，一面焦急地想办法。

突然，周恩来总理慈祥的面容在我的眼前出现。桐斌入党他不是也知道吗？他对桐斌一直很关心，于是我提笔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

敬爱的周总理：

我的爱人姚桐斌同志原为七机部一院党委委员，七〇三所所长，于1968年6月8日被人杀害，我们的三个孩子一直由我抚养。现在我的工作单位——外交学院分院是撤销单位，学校全体人员将迁至河北省农村插队落户，可是我家中有些具体困难，特此向总理汇报。

我们的三个孩子都是女孩，最小的年仅5岁，因患急性肝炎住院，现在仍在医院。我一个人带着她们去插队，实有困难。这些情况，七机部军管会杨国宇副主任和钱学森同志是比较清楚的。

我是1947年在南京高中毕业后获得奖学金出国的，在美国上的大学，并且工作了一段时间，于1957年底回国。回国后，先后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外交学院分院教英语。

我和姚桐斌同志家中都没有什么亲人。因此，他被害后，一直由我抚养这三个孩子，恳请总理对我的困难予以考虑。

此致

敬礼！

彭洁清敬上
1970年3月25日

我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抱着试试看的心情，给周总理写了这封信，怎么也没有想到，日理万机的总理，竟然在一周之内，就在我的原信上作了批示：



请彭绍辉同志告外交学院分院军代表，暂不忙动员彭洁清插队，请与七机部军管会副主任杨国宇同志、钱学森同志一谈。看姚桐斌同志是如何被害的，案件是否有人在查，家属应如何安置，均望查清，并提出处理意见上报。

周恩来
一九七〇年三月三十日

彭副总长很关心这件事，于是杨国宇和钱学森给彭绍辉打了一个报告，摘抄如下：

关于姚桐斌同志被打死后处理情况的报告

彭副总长：

遵照总理三月三十日对彭洁清同志的批示精神，现报告如下：

一、原七机部一院党委委员七〇三所所长姚桐斌同志，一九六八年在两派武斗时，姚桐斌同志中午由办公室下班回家被打死，当即报告总理……凶手现在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关押。姚桐斌案件已列为清队中一个重点问题，正在追查。

二、姚桐斌死后，对其遗留的三个孩子生活补助，按国家规定，每人每月二十元，对其本人，则是按军队师级干部标准发给六百五拾元。[2]

三、彭洁清同志，目前插队确有困难，已按总理指示告外交学院分院，暂不忙动员插队，其工作如外交学院分院不能解决时，建议由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安置。

此致

敬礼！

钱学森、杨国宇
一九七〇年四月三日



当时,我既不晓得总理批示的内容,也没听说有杨国宇和钱学森的报告,多年以后,我才得知。

我校军宣队接到上面的指示后,派人到河北,把我的档案调回北京,并交到彭绍辉副总长办公室。同时通知我,不必去插队了。

孩子病愈出院后,我一再催问关于我工作之事,他们总是含含糊糊地不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我只好自己去总参谋部了。

真是无巧不成书,我在科技大学教书时,认识一位俄语老师,她是新疆少数民族,家住中苏边界一个小镇上,在苏联上过学,俄语讲得十分流利。一次,我在她家串门,当我谈起要去见彭绍辉感到胆怯时,她告诉我,她曾当过彭副总长的俄文翻译,她给我打气:

"别紧张,彭副总长人可好啦,一点架子也没有,你尽管把你的困难详详细细地对首长说。"

她还告诉我:"首长爱人也很随和,她原来是位中医医生,现在彭副总长秘书室工作。她人挺好,你就去吧!别怕!"

听了她这番话,我胆怯之心顿减。

于是,我就去了彭绍辉家。彭家地处北京景山公园附近的一条胡同里,院子不大,进大门,有一条石板铺的路,通往一幢两层灰砖小洋楼。院子里有很多树,环境十分幽静。

我走进大门后,警卫员将我带到秘书室,一位穿军装的男秘书,电话请示彭绍辉,然后陪我到客厅。等我们走到客厅时,彭绍辉已在等候我了。

彭身材不高,瘦瘦的,头发花白,左臂空着一只袖子,使人一看就知道,他曾经是一位驰骋疆场的将军。

彭绍辉向我问寒问暖,还关心地问起孩子们的情况,又和气又亲切。我的紧张情绪顿时消失殆尽。

彭绍辉的夫人也是一身绿军装,笑盈盈地坐在一旁,听我和她丈夫谈话。



我把桐斌和我的情况给彭绍辉作了简单的汇报，并向彭提出，希望能安排一个用得上英语的工作，彭绍辉用很重的湖南口音劝我："莫急，莫急。"他要我先在家照顾孩子，并表示会设法为我安排一个合适的工作。

彭绍辉和他的夫人留我在他们家吃午饭。饭厅陈设与客厅一样，朴实无华，只有一张方桌子和几把木椅。那天正赶上彭绍辉的几个老部下来看他，吃饭的人多，就把方桌四周撑起来成了一个大圆桌。他们从"东来顺"叫来一桌涮羊肉。

"首长，我可是不吃羊肉的啊！"

彭副总长用湖南话劝我："涮羊肉冒得膻味，不信你先呷一口试试。"盛情难却，我尝了几片，果然鲜美无比。

彭绍辉让我坐在他身边，频频为我夹菜，这哪像一位高级将领，完完全全是一位忠厚长者。饭后不久，彭绍辉亲自送我出客厅，夫人直送我到大门口。以后，我每次去他家时，都是如此热情，如此亲切。

彭绍辉为我安排了几次工作，但都离家远不方便，这样就耽搁下来了。

注释

① 1969年10月17日林彪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10月18日，黄永胜把"紧急指示"以《林副主席第一号令》下达全军。（参见金春明等编：《"文革"时期怪事怪语》，第324页，求实出版社，1989年）

② 实发430元。



今生不悔

老二这时已经上小学五年级，他们学校遵照毛主席"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的教导，让学生到附近一家鞋厂去"学工"，孩子们觉得很新鲜，都兴高采烈地劳动。工人只安排这些小学生干些打扫卫生之类的简单活，没有让他们上机器。

此外，他们每天都在学校里挖防空洞。五年级在小学算是高年级了，重体力活都让他们干，挖土、抬土、拉车，到几里地外拉沙子，不但劳动强度大，而且比学习时间还长。我们几个家长有意见，在一起发牢骚：

"毛主席不是教导以学为主吗？怎么他们学校以劳动为主？"

我对学校这种做法，心里也不满意，俗话说"枪打出头鸟"，谁也不愿牵头去向学校提意见。

一次，老二学校排队上街游行，在整个队伍中，她比别的学生高出一头，有些女老师还没有她高。老二可能有所感觉，尽量弓着



背，还是无济于事，仍然比别人高。见此情形，等她放暑假，我决定送她到杭州去上中学。

当时，杭州的学校，遵照毛主席“学制要缩短”的指示，已将小学改为 5 年，北京仍为 6 年。因此，老二凭五年级成绩单，在杭州可以上中学。

小罗汉此时已经六岁，北京的小学规定七岁才能入学，其他城市没有北京那么严。于是，我就带着她们姐妹俩，踏上了南下的火车。

这次坐火车我只买了一张硬卧票，孩子们都是坐票。白天，我们三人坐在我的铺上。入夜，我将带的被子铺在两排卧铺之间，她们姐妹俩睡在上面。同车的人还和她们打趣说：“你们两人的铺真高级啊，还是软卧，比我们的棒多了！”

同车人的逗乐勾起了我回国后和火车打交道的回忆。

一次，桐斌到上海出差，正碰上学校放假，我和他一起南下，按级别，桐斌乘软席卧铺。我是私事，为了省钱，就买了一张硬席卧铺票。为此，桐斌心中过意不去，一再对我说：

“真抱歉，让你受累了。”

晚饭后，他非要和我换铺，还说他喜欢睡硬铺。我拿他没办法，只好遵命。

另一次是 1965 年，老大已经快七岁了，但她的生日是 10 月，不能入学。北京市规定，只有 1958 年 9 月 1 日以前出生的孩子才能上小学。

我十分焦急，天天对桐斌唠叨：

“喂！快想办法啊！等到明年，她就要八岁了，八岁的孩子才上小学也未免太迟了一点吧？”

后来，在无锡的大哥来信说，老大可以到无锡去上小学。

从未见过火车的老大，一上车又蹦又跳，以为马上可以看到大伯父了。当火车铃响，我和她爸爸要下车时，她才感到不妙，哭了



起来。列车长立即哄她，给她糖果。还告诉我，晚间让她睡在列车员休息室，保证将我女儿亲手交给无锡的亲戚，她让我放心。

我和桐斌看着飞速向前驰骋的列车。

“咦！大太阳天的怎么下起雨来了？”桐斌突然说。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坏，人家难过死了，你还有心开玩笑。”我边说边捶他。

“是你天天吵着要送她走的啊！什么八岁上学太大啦！什么这种一刀切的做法不合理啦！什么桐斌快想办法啦！现在女儿刚走就反悔了？”

桐斌笑意更浓，不在乎我捶他，他是想转移我的注意力，以免我当众哭鼻子。

老大在无锡上完一学期，才由大伯送回北京。

回京后，桐斌又亲自测试老大，对她的学习十分满意。后来又教她习字，什么横平、竖直啦，怎样握笔啦，等等。由于他的悉心指点，老大的字在几个孩子中写得最好。

1958年，我第一次来杭州，是和桐斌一起来的，正好是杏花春雨季节，一下火车，只见杏花夹径，绿柳垂湖，青草如茵，红花掩映，这美景在细雨中显得分外娇娆。

“真美！”我大声赞叹。“怪不得人们都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那次，我们还游览了“三潭印月”、“柳浪闻莺”，并去花港观赏了金鱼。湖水清澈见底，鱼儿有红、有白、有黑、有花，游来游去，好似一幅色彩缤纷的图画。

虽然只是一个短短的星期天，但我俩在柳树下，鲜花前，留连忘返，暖洋洋的春风吹在身上，醺醺欲醉，我俩如度蜜月的恋人一样，沉醉在西湖美丽的景色中。

这次一下火车，看到西湖风景依然美丽，而陪伴我的却不是桐斌了。真是：那年游此处，人和风景如画。今年来此处，心已碎、万



念灰。

在北京，小孩入学，要有当地的户口，杭州无此要求。同时，老二的跳高很棒，体育老师认为她有培养前途，就破格收她上初中。小罗汉也成了一年级小学生。

她们学习很用功，体育又好，而且说一口地道的北京话，一时成为学校的明星人物。

南方学校比较注重学习，不但考试评分，期末成绩还张榜公布。“文革”期间，这种做法在北京早已绝迹了。

在杭州住了一个多月以后，我发现当地的政治气氛远远没有北京浓厚。人们整天为挣钱吃饱饭操心，无暇顾及什么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了。

在马路上，我见到不少拉平板车的人。车上总是堆满水泥、钢筋或其他货品，前面一个人背着绳子吃力地拉着，旁边还有一个小孩帮着拉套。他们满头满身大汗，有时腰都弯到快90度。只要看到这种情况，我心里就感到极不好受。在北京，这种载重货的车，一般是牲口拉的，为什么此地还是用人拉？

几天后，我到一个亲戚家里做客，不料他家就是以拉车为生。

这家的男主人是小学教员，耳朵聋，已经退休。妻子虽已中年，但身体健壮，和两个女儿轮流拉车，那两个女儿都是小学毕业后，就开始停学干活。

“你为什么不让孩子多读点书？”我问那位母亲。

“多读书有什么用？她爸爸当小学教师，工资还没有我女儿一半多。”

我瞅一眼男主人，幸好他没戴助听器。

“是呀！”她大女儿接着说。

“我们若是中学毕业，就得下乡，在乡下种田，比拉车苦得多，还养不活自己。我们年轻，一天拉一两趟车，不算什么。有吃又有穿，不是很好吗？”



经她们这么一说，好像真是读书没有什么用。我们这些大学老师，难道不是被打发到农村去插队，去向农民学习种地吗？

他们留我们吃午饭。饭桌上，菜肴很丰盛。吃饭时，一个女儿问我，为什么江青总是戴顶解放帽，不男不女的，多难看。

听了此话，我感到难以应对，赶忙扒了一口饭，再吃一口鱼，把话题岔开。

“你们做的鱼，味道真鲜，我在北京很难吃到这样美味的鱼。”

她母亲一听此话，喜形于色，赶忙给我夹了两大块鱼。

“你喜欢吃，就多吃一点。这是我从‘楼外楼’饭馆学做的‘西湖醋鱼’。来我家的人，都说比饭馆做的还好吃。”

这样一来，大家忙着为我们夹菜，江青戴帽之事，已无人提及了。

她父亲听不见我们谈什么，只是一声不响地埋头吃饭。我们大家说说笑笑的，吃得倒很开心。

饭后，母亲和女儿一道，陪我们到西子湖畔散步，只见湖水黄黄的，混浊不清，真是大煞风景。

“这是什么缘故？1958 年我来时，湖水又清又亮，好美啊！”

“你走后不久，不就是‘大跃进’吗？要增产，又没有那么多肥料，只好挖湖泥当肥料，到处乱挖，西湖的水就变成黄汤了。”

我为美丽的西子湖叹息！

她接着说：“这样搞来搞去，苦的还不是我们这些平民百姓。”

闻她言，我心惊肉跳，如雷击顶。她怎么敢说出这样“反动”的话？幸好我的女儿走在前面，没有听见这种言论。我思谋，宁愿孩子少学点文化，也不能冒险让她们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哎呀！此处不可久留，不如归去也。

返回北京后，老二凭杭州的转学证，进了一所重点中学。小罗汉也就近上了小学。



我们学校里冷冷清清，见不到几个人。我们住的六号楼，大部分住户都已迁往农村，只剩下一两家，我们只好搬到八号楼。大床、桌椅、箱子等物都是我们母女四人一件件抬的，简简单单几样家具，竟然搬了一整天，我还累病了一场，要是桐斌在，岂会让我如此劳累，这样操心。

七号和八号楼是后盖的单元式楼房。第一层两套三居室。二、三、四层各三套两居室。我们搬入二层中间两居室的套间。两间居室皆朝南，每间面积约16平方米。厨房和洗手间也向南。我住一间，孩子们住的那间里还放一张饭桌。吃饭、待客皆在孩子们那一间。条件虽然不如南郊的家，但只要孩子们平安，我就心满意足了。

我将方桌放在孩子屋里，因为它引起我的回忆。记得桐斌生前和我将方桌称为"八仙桌"。有一次，我对桐斌说，八仙桌应该坐八个人。我们要再有三个男孩就好了，正好凑满一桌。他立即说，我们已有三千金。他感到十分满足，非常幸福。

我们楼的四层，住着一对夫妇，都是日语老师，先生姓章，太太姓杨。他们带着一个十几岁的女儿，下放河北农村。

杨老师父亲是由一对英国夫妇抚养成长的，该家族非常富有，是一家银行及一家钢铁公司的大股东。老两口膝下无子女，视杨老师父亲为己出，让他管理在日本的分公司。后来，杨父和一位日本小姐喜结良缘。

杨老师不高不矮，瓜子脸，皮肤白而细腻，高高的鼻梁，大大的眼睛。回国后，虽然饱经风霜，已有华发，但丰姿一如当年，真不愧为东京有名的美女。

章老师家经营轮船公司，他虽出身豪门，但生活俭朴，平日总是一身蓝布制服，看不出一丝富家子弟的风貌。

他们的女儿叫小香，两三岁时，在东京患了大脑炎，家中有钱，请来日本、西德名医抢救，总算保住了小香性命，但她智力仍停留



在二三岁小孩水平上，除了自己能勉强吃饭以外，梳头、洗脸甚至上厕所都不能自理。

章老师一家到农村后，小香不幸生病，杨老师是带着她回京医病的。据杨老师说，下乡后，大家被安排在好几个生产队，住得很分散，极不方便，人人都在忙着自己的生活。

杨老师对我说："你若是带着孩子下乡，肯定会困难重重，光是从井里提水就不容易，井深不见底，女同志根本提不动。"

"是吗？但是，只要我爱人在，哪怕是去新疆、西藏，我也心甘情愿。"

现在校园里人少，我和杨老师天天见面。杨老师有一本很厚的日本织毛衣的书，书内有上百种花样。杨老师织毛衣的水准比起我的启蒙老师更胜一筹，有了她的指点，我的技术突飞猛进。杨老师见我悟性高自然高兴。但是说我织得太快了。

"你怎么可以一个礼拜就织好一条毛裤？不要这样赶，要累坏身体的。"

"都是平针，太简单了，我晚上睡不着，不如起来织毛活。"

杨老师哪里知道，晚上，只要我拿起毛活，就会想起我为桐斌准备好的四十六岁生日礼物。顿时，房间里就会弥漫着他的气息。我感到桐斌仍在我身旁，就像他在冲洗照片时一样。我们紧紧地挨在一起，我闻到我熟悉的气息。

"你不是不喜欢照相吗？怎么对冲洗这样有兴趣？"桐斌这句话仍然萦绕在我记忆里，就像昨天说过的一样。但蓦然回首，爱人已离去，思前想后不能自已。

杨老师为人好，家务料理得井井有条，小香身上总是干干净净的。她天天见我，就认识我了，一见面总是热情地叫我：

"阿姨！妈妈，阿姨来啦！"

"唉！这孩子将来可怎么办？"我轻轻地叹息。



杨老师向同事表示过，如果他们俩离开人世，就带着小香一起归天，以免给组织上添麻烦。我听了以后，心里好难过。

杨老师和章老师是 20 世纪 50 年代初从日本回国的，章老师虽然家财万贯，却向往社会主义祖国。他从东京一所名牌大学毕业后，不愿做大少爷，带着妻子、女儿一起回到从未到过的祖国。

回国后，章氏夫妇皆被分配到新疆教书，在那个偏僻遥远的地方，一呆就是 10 年。1964 年，我校扩建，才将他们调至北京。

章老师一直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始终未获批准。

1972 年，中日建交后，东京通知章老师，父亲给他留下了几十亿日元的遗产，章老师将这笔巨款上交给政府。有人劝他们：

"你们应该给小香留一笔生活费。"

杨老师温柔地一笑："我们有工资，可以负担小香的生活，这笔钱还是交给国家用于建设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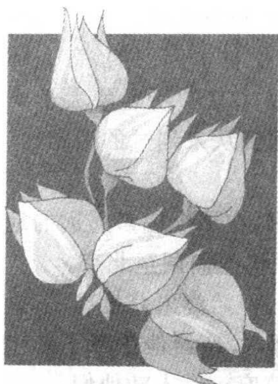
在同事们一再劝说下，他们才从财产中留下极小一部分。

不久，章老师生病来京检查，不幸患了鼻癌。章、杨两家从日本寄来不少药品，但效果不大。在病中，章老师又一次提出入党要求，直到此时，组织上才批准了他入党。章老师生平的愿望，终于得到实现，为此，他流下了幸福的眼泪。可惜，绝症难治，再好的药也无回天之力，章老师很快就离开了人世，留下了妻子和女儿。

当时杨老师的母亲要接她回日本，杨老师不肯去，执着地留在丈夫热爱的祖国。

我同情杨老师的遭遇，我理解她留恋丈夫热爱过的土地的心情。难道我不是和她有类似的遭遇？难道我不是和她有相同的心情吗？

如果时光能够倒流，如果桐斌能够再活一次，我相信，桐斌仍然会选择回国这条路的，尽管此路艰险重重。而我，由于爱他，会伴随他到海角天涯。



乒乓外交

在那“史无前例”的年代，中国国内的政治风云，变幻莫测，弄得人心惶惶，晕头转向。

1971年的国庆就要到了，往年从七八月开始，各单位都抽调人去操练国庆游行。但这年9月下旬，突然发下通知，说是从今年起，节约闹革命，不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国庆游行，只在各公园分散举行小规模的庆祝活动。

当时大家完全相信这个通知所说的理由，没有一个老百姓会料到，是因为林彪于9月13日乘飞机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摔死，才取消国庆节游行的。

1959年彭德怀被“罢官”后，林彪作为国防部长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那一年，我被邀请参加国庆观礼，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林彪。只见林彪身材瘦小，尖尖的下巴，浓黑的眉毛横在黄黄的脸上。看得出林彪的健康状况不佳。



那时，很多关于林彪的传闻，都是赞美敬慕之词。说他是军事天才，常胜将军。抗日战争指挥了平型关战役，大获全胜，等等。

“文化大革命”以来，林彪频繁的露面，原来传说他患有对水和阳光的过敏症一定是医好了，否则怎么能够在阳光下接见红卫兵，一站就是几个小时？

1969年4月，中共九大通过的新党章，正式写上林彪是党惟一的副主席和毛主席的接班人。

其实，远在九大的前几个月，我们政治学习时，就讨论了新党章草案。不管党员还是非党员，都必须学习这个草案。政治学习小组长还煞有其事地征求我们的意见。

党章里关于林彪当接班人是这样写的：“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在正式的党章中，规定接班人的做法，现在看起来真是荒谬绝伦。那时，却没有听到党员提出异议。所谓征求我们这些党外人士的意见，只不过是走走过场而已，我们有自知之明，岂会多言，当然高举双手赞成。

10月上旬传出林彪乘飞机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很多人听此消息后，感到迷惘，难以置信。

林彪外逃事件发生后，关于林彪的说法就不一样了。说他抽鸦片，在井冈山时曾当过逃兵。说他长征时，不愿受毛主席的领导。还说他家里挂的横幅“天马行空，独来独往”，表明林彪一直有野心，等等。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究竟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

林彪虽然垮台了，但是极左路线却照样推行不误。此时，老二已上了高中，中学生都要“学工、学农”。她学校和某个五金厂挂钩，学生每学期分批到该厂劳动两周。



五金厂离学校较远，学生吃住都在工厂。这个小厂连工人都没有宿舍，哪里有房间给学生住？厂方就在车间用木板隔开一角地方，一个挨一个的打地铺，让学生三班轮流在这一席之地上睡觉。

刚去时，工厂只是叫这些学生打扫车间和室外环境卫生，修路并在路旁挖坑种树。孩子们天真单纯，干得挺起劲。一进厂门，石砌的小道，两行笔直的杨树，使五金厂的面貌焕然一新。

后来，厂方就要求学生和工人一样上机器干活，和工人一样上夜班。中学生毕竟还未成年，上夜班时，难免打瞌睡。一个学生不小心被机器轧断了一个手指头，其他学生吓得吱哇乱叫，又不敢停下机器，直到老师傅和工人赶来，才将那个学生送去医院。

学生家长既伤心又生气，向工厂说理。厂方为了安抚家长，应允该生毕业后，可以留在该厂工作。家长只好自我安慰，孩子虽然被轧掉了一个手指，但不用远离北京去农村插队，却也因祸得"福"，也就没有要求赔偿，更谈不上对厂方有任何法律制裁了。

学生家长既然没有意见，校方更是无话可说。还是向工厂源源不断地输送未成年的劳动力。

我们老二身体原来就不太好，人又老实，干活特别卖力，在工厂劳动完了以后，就病倒了。

同学们来看望她时，从谈话中，我才得知，班主任不许他们在工厂食堂买好菜吃。班主任向学生宣布：

"你们是来向工人学习的，是来劳动的，不是来享受的。"

真是天晓得，一个小厂的食堂有什么好菜卖？男生可不管这一套，还是买肉片炒白菜什么的。有个姓朱的男生吃不饱，到处向别的同学要剩菜。

"谁不吃肥肉？谁不吃肥肉？不吃的肥肉都给我。"

其他男生都把饭菜吃得精光，无法支援他。

老二和几个女生听话，每顿只买一小碟咸菜，就开水吃馒头。



这样的伙食，干那么重的活，哪能不生病？哪能不出事故？

夏收的季节到了，干部、大学生都去农村劳动，中学生也不例外，要去"学农"。老二虽然刚刚病愈，但她不敢请假，和同学们一起，到郊区人民公社参加夏收。每天 5 点开始到地里拔麦子，到天黑才回家。两三天后，我发现她双眼红肿。

"咦！你是不是晚上没放蚊帐，让蚊子叮了眼皮！"

刚说完，我就感到不对头，怎么蚊子会将两只眼皮都叮肿了呢？我陪她去医院看病，医生诊断为急性肾炎，要她立即住院。

我们学校的同事，这时仍在河北农村，他们照拿国家工资，这就和学生插队不可同日而语了。尽管如此，对从未到过农村的人，生活还是很困难的。就拿烧柴做饭来说，得从头学起。要么柴烧不着，满屋冒烟，熏得眼泪直流；要么把饭烧焦。要买菜什么的，也得逢集日才有，老师们不得不把全副精力放在生活琐事上。

这时《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敢于同传统观念彻底决裂》。文章说的是河北师范大学女大学生白启娴，在 1968 年毕业后，到河北沧县相国庄插队，1970 年和当地农民结为终身伴侣的事。文章表扬了白启娴这种扎根农村，和贫下中农相结合的精神。

《人民日报》发表这篇文章不久，我校法语系的艾老师也和农民结合了。艾老师是中法混血儿。母亲、妹妹于"文革"初期返回法国。

艾老师思想进步，生活俭朴，平日总是一身蓝布衣裤，黑布鞋。她到河北农村后，和一位返乡的复员军人结婚。艾老师当时已年近四十，工作多年，手头颇有积蓄，办喜事时，大家帮她搬书箱衣被等物，村里孩子大喊大叫："王伯伯娶来了一位财神婆啦！王伯伯娶来了一位财神婆啦！"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艾老师调回北京任法文翻译，她丈夫几次来京看望她，每次都要钱，说是要修房、盖房什么的。艾老师尽



量满足他的要求。但后来，她感到难以应付，又长期两地分居，两人终于离异。不久，艾老师去加拿大多伦多定居，虽然孑然一身，生活却轻松愉快，对自己所走过的一段与农民相结合的道路，已是昨日黄花，往事不堪回首矣！

1971年3月，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了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国自“文革”后就与这类活动断了联系，此次恢复派队参加。

赛后，中国队邀请了美国和其他几个国家的球队访华。美国队和其他几国的乒乓球队陆陆续续来到中国。4月6日美国队到达中国，这是多年来，中国老百姓第一次在报上看见美国年轻人的照片。在中、美双方球队举行友谊赛时，少数人有幸观看，他们对美国年轻人开朗活泼的性格甚为赞赏，对一些乒乓球队员的披肩长发也没提出异议。

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他们，并对美国队员说：“你们在中美人民的关系史上，翻开了新的一页。”这个消息使中国人、美国人都感到意外，成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新闻。怪不得人们称这次的交往为“乒乓外交”。

美国乒乓球队离开后，7月和10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两次秘密来到中国，为尼克松总统访华做准备。

中国政府为迎接尼克松总统，做了精心的准备和周到的安排。从北京机场到钓鱼台国宾馆的路上，两旁的建筑都粉刷一新。协和医院从“反帝医院”改名为“首都医院”（几年后才恢复协和原名）。老字号的同升和鞋店，全聚德烤鸭店等，也都恢复了原名。商店门面全都粉刷油漆一新。

在我南郊家附近的红星人民公社，由于安排尼克松前去访问，竟特意盖了一个小卖部，里面摆满了各种日用品、各种水果、新鲜蔬菜、鲜蘑菇，以及市面上难以见到的精装糖果和点心等商品。

这个小卖部离我家不远，有几个“勇敢”的邻居，想趁机去采购



点紧俏货。售货员对他们翻了一下白眼,大声斥责:“不卖!”

一切准备停当,就等贵宾光临了。

1972 年 2 月 21 日,美国总统尼克松的专机,降落在北京机场的跑道上。机场大楼挂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两侧飘扬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国旗。机场上静悄悄的,没有欢迎群众,只有中央一些高级官员列队等待。

尼克松面带微笑跨出机舱,周恩来等候在舷梯脚边。尼克松可能是想起了 1954 年在日内瓦,当时美国的国务卿约翰·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之事,这次主动地向周恩来伸出手来。尼克松在其回忆录中是这样记述的:

“我走完舷梯时,决心伸出我的手,向周恩来走去,当我们的手握在一起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当天下午,毛主席就会见了尼克松。晚上,江青陪尼克松夫人观赏了革命样板戏《红色娘子军》。第二天《人民日报》和其他报纸都刊登了这些活动的报道和照片。

我们在政治学习时,对邀请尼克松访华,无不赞扬毛主席的英明决策。而后,外事部门规定,每天早晨 8 至 9 点钟是外语学习时间,这和前几年每天早晨“雷打不动”学《毛泽东选集》的“天天读”是多么鲜明的对比啊!

尼克松访华,使中国的国门打开一点点,有些归国华侨,就趁机申请出国。

一位女老师姓刘,在法国大学毕业后,于 1965 年回国。

刘老师父亲原为《大公报》驻西贡记者,后来调至巴黎。刘老师在越南西贡出生,在法国长大。她生性活泼,年纪又轻。1966 年,她和英语系一年轻老师恋爱,申请结婚,被我校的红卫兵骂得狗血淋头。

“别人都是不分昼夜,跟着伟大领袖干革命,你们俩倒好,卿卿



我我的，谈什么恋爱？”

“不许结婚！”

他俩听此言，气愤万分，却又无可奈何。因为没有组织的证明，区民政局是不会为他们办理结婚登记的。

刘老师和男朋友只好耐心地等待。有情人终成眷属，到1970年，他俩已成家并有两个小孩，阖家都去河北农村插队了。

此时，刘老师也申请回法国，但至1974年才获批准。于是刘老师带着一儿一女去法国定居。她的先生是中共党员，无法同去，最后只好分道扬镳。

尼克松访华期间，中美两国领导人在谈话时，不止一次谈到，这次会晤是历史上重大事件，影响深远。从此，好些归国华侨又返回海外，或者将自己的子女送往国外深造。但更为重要的，是改变了人们对外国的看法。

多年来，人们被教育，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现在人们突然发现，外面的世界并非宣传所描述的那样糟糕。

据传，邓小平访问联合国的新闻记录片，特别受年轻人的欢迎。有些人甚至连看数遍。他们对美国汽车之多，楼房之高，室内布置之富丽堂皇，以及人们的衣着服饰的多姿多彩都津津乐道。

上海人手巧，更是一马当先，发廊里美国式的新潮发型，服装店里新款式的服装竞相问世。不少年轻人争相出国，或留学，或探亲。人们借用“文革”初期红卫兵大串联这个词来形容目前的人员外流，称之为“世界大串联”。

原来海外关系像是一座山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多少人因此被审查，被关押。现在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有些人恨不得去查家谱，以便找出一个定居在海外的亲戚，以帮助孩子出国学习。

由于林彪的垮台，中美关系的改善，国内的政治气氛有了些缓



和，周恩来总理开始重建政府机构，并整顿经济、教育、科学等方面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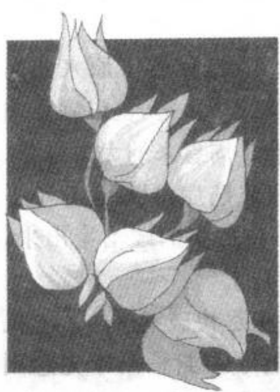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许多老干部恢复了名誉，回到了原来的岗位，而“文革”初期被打倒的“党内二号走资派”邓小平，也以副总理的身份，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这固然是周恩来的大力推荐，也许还有另一因素，即毛泽东知道周恩来身患癌症，只好让邓小平出来帮助维持局面了。能有邓小平这样一位务实的政治家出来，人们都为国家庆幸。

趁此机会，我再次向七机部打报告，要求尽快破案惩凶。七机部的领导更迭频繁。于是，我于 1974 年，写了一封信给李先念副总理，将桐斌被害以及凶手至今尚未受到制裁的情况向他报告。李先念在我的信上做了如下批示：

> 真是草菅人命，虽然事隔多年，似仍应坚决把问题查清楚，首犯应得到惩处，但打击面不能大。如何，请批示。
>
> 先念
>
> 一九七四年五月七日

李先念批示后，交给当时的公安部部长华国锋来办。

华国锋为人谨慎，在公安部逮捕凶手前，先打报告呈送周恩来、叶剑英(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先念、邓小平和纪登奎(国务院副总理)。这些人都圈了圈以后，才下令逮捕于某某、高某某两名杀人犯。此时已是 1974 年夏天，距他们行凶杀人的日子已过了六年之久。



龙年

尼克松访华后，在神州大地兴起了一股英语热，中央电视台开办了两个英语讲座。一个从 ABC 开始，每周三次，由谢冰心的女儿和一位姓陈的男老师主讲。另一个由一位英国女士 Catherine Flower 主讲，也是一周三次，节目叫做“跟我学”(Follow Me)，教材是 BBC 提供的，也是从头开始。中国教师讲得条理清楚，从理性入手。外国教师讲得生动活泼，偏重感性，教学法各有千秋，都拥有一批观众。各涉外单位的干部学英语的热情更高。在这种情况下，1974 年，我们学校从河北省调回十几位英语老师，开办了干部英语训练班，我也回归队伍，重新开始教学生涯。

此时，外单位还在进行着“文化大革命”，我校则用大部分时间，筹办干训班。此后一段时间，政治生活相对平静些，直到龙年 —— 1976 年。



龙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帝王的象征。皇帝自称为真龙天子，过春节时，在锣鼓鞭炮声中，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欢快地挥舞着龙灯。龙历来被认为是吉祥的象征。但1976年这个龙年发生了一连串事件，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使人们把龙和灾难联系在一起了。

1976年1月9日，北京天寒地冻，满目冰霜。像往常一样，我边吃早饭边听新闻。突然，无线电波伴着似乎冻得凝结了的气流，传来了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的噩耗，我顿时惊呆了，急忙放了碗筷。孩子们赶着上学，没有注意，仍然在吃早饭，一边谈笑。我大声呵斥。

“别说话了，快听广播！”

她们愣住了，谈笑声戛然而止，轻手轻脚地将碗筷收走，背着书包上学去了。她们走后，我听着哀乐，泪珠连串地掉下。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从四川转到南京一所教会学校上高中，从报上看到过周恩来的名字。他作为中共代表在南京和国民党谈判。由于我对政治不关心，没有留下更多的印象。

1954年，周总理到日内瓦参加会议。当时，我在国外，从电视上见到了他的英姿，听到了他在大会上的发言。周总理那落落大方的举止，高贵优雅的风度，机智雄辩的谈吐，不论是外国人还是华侨，无不为之折服。

当时，风传在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和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出人意外地邂逅在会客室里。出于礼貌，周恩来总理向杜勒斯伸出了手，但死板僵硬的杜勒斯却把两手背在身后，大步走开。

在场的新闻记者把这件事有声有色地渲染报道了。人们一片哗然，大家都赞赏周恩来总理的雍容大度，没人欣赏阴着面孔的杜勒斯。

那时，人们只注意会议对印支半岛局势的影响，殊不知中美达成的双方侨民回归本国的协议，才是华侨最关心的。



协议规定，在中国的美国公民，要求返回美国时，可向波兰驻中国使馆求助，中国政府不得阻挠。在美国的中国公民，如欲返回中国，印度驻美国使馆将协助办理手续，美国政府不得干涉。这项协议是1954年签订的，但付之行动，已经是一年多以后的事情了。

1955年，从报上读到，钱学森博士申请回国，受到美国FBI（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干扰，他们不许钱学森将研究资料带回中国。

次年，我们的一位朋友向博士和夫人，带着两个小孩从美国归来，人都已经上了船，却被FBI无理刁难，搜查行李，将向氏夫妇全部存款扣留，说这些存款是在美国工作的薪水，不许带出境。他们硬性将此款项冻结在美国银行里，直到中美两国建交后，才得以取出。

我们也是由于有了日内瓦协议，才得以返回祖国的。桐斌回国后，在研制火箭材料工作中，曾多次受到周恩来总理的关怀。当他听到桐斌被害的消息时，即派粟裕大将调查此事，并命令七机部军代表开列一个有贡献的科学家的名单，加以保护，必要时用武力保护。周总理指示："要放哨，谁迫害这些科学家就把他们抓起来。"

周总理是多么爱惜人才啊！直到今天，一些航天专家谈到"文革"时，都忘不了周总理这一保护人才的举措。

任新民，原七机部副部长，火箭总设计师，每次谈到"文革"时，都对桐斌的惨遭杀害表示无限的惋惜。他说由于他是搞火箭发动机的，不是搞材料的，在材料问题上都去找桐斌想办法。

任总说："姚桐斌每次都仔细和我们讨论我们需要的材料及其应用特点，然后把它们提给其他部门，如科学院、冶金部、化工部等的研究和生产部门，并和这些部门合作一起搞。这些材料拿回来后，他还要对其性能特点再进行研究，并根据我们的设计要求，把这些材料应用到发动机上去。"

任总还提到："当时我们国家的工业还比较落后，一切得都从



头来。为了某些航天材料，老姚得向主管部门打报告，申请成立有关的研究所，开工厂，来进行研制。因此，可以说‘两弹一星’带动了我国的科学技术和工业的进步。”

最后任总回忆道：“老姚这个人很能干，除了技术问题外，他的组织能力也很强，这是不容易的。作为技术领导，完全是个读书人不行，因为搞航天材料及工艺必须组织全国协作，他当时对我国航天材料建设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当人们问另一位火箭发动机专家是怎样度过“文革”时，他说：“在‘文革’中，比起别人来，我算是幸运的了。我只蹲过三天‘牛棚’，上台被批斗过一次，之所以能这样，是以我的一位同事的生命为代价，是因为得到了我尊敬的伟人的保护……”

不言而喻，他所说的同事是桐斌，伟人是周总理。

周总理是1976年1月8日上午5时，因癌症去世的。人们听到噩耗后，都悲痛万分，但江青一伙千方百计压低追悼活动的规模，发出各种禁令：不许戴黑纱，不许戴白花，不许去天安门广场，……不许……

在为周总理开追悼会的前一天，即1月14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大辩论带来大变化”的长篇文章。说什么“近来，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人们被激怒了，很多人将报纸撕得粉碎，并纷纷打电话向《人民日报》提抗议。

安排向周总理的遗体告别，规定仅限1月10日和11日两天，人数仅定为万余人。

我特地上书领导，要求瞻仰周总理的遗容，这将是我最后一次能见到他了，我心里又难过又激动。

吊唁的人围着北京医院，排着长长的队伍。人们静静地，无人交谈，只听见压低的抽泣声。我们在严寒中等了一个多小时，才得以进入医院停放遗体的地方。这是靠近医院围墙边一间孤零零的小屋子，那不是北京医院的太平间吗？怎么能在这种地方瞻仰中



华人民共和国总理的遗容？大家既愤怒，又悲恸。

我们向安卧在鲜花丛中覆盖着中共党旗的周恩来总理告别。虽然经过整容，仍然掩盖不住他消瘦憔悴的面容。

一个朴素的小花圈放在他的脚下。花圈上面写着：悼念恩来战友。落款是：小超哀献。这是周恩来总理相依与共几十年的伴侣邓颖超敬献的。

一走出太平间，我随大家一起放声痛哭。我想到，"文革"这几年，全国一片混乱，事无巨细，都得总理亲自过问，幸亏有他，才保护了一批老干部和专家。

桐斌被害后，周总理是如此震怒，有一次在会上谈到此惨案时，他气得站了起来说："姚桐斌是我从海外要回来的专家，国家需要这样的专家，现在被打死了，连凶手也找不到，我限期你们把凶手找出来，否则惟你们头头是问。"

那时，法医不敢去我家，是周总理命令公安部保护派来的法医，并由解放军保证法医的人身安全。

周总理还多次向军代表询问我和孩子们的情况。是总理的关怀，我们才有怃恤金。那时，抚恤金是一种政治待遇，表明桐斌和他的家属没有政治问题。

啊！我们的好总理，你操劳太过，又受"四人帮"迫害，是活活累死的呀！

从12日到14日，周恩来总理的骨灰安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供群众吊唁。但吊唁人数被压缩到四万，使许多想和周总理告别的人没有机会。

15日下午3时，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参加追悼会的人数定为五千人，由邓小平致悼词。江青仍然显眼地戴着帽子。几天前，她向周总理遗体告别时，没有鞠躬，也没有脱帽，遭到了人们的唾骂。传说，有一位老干部是如此地愤怒，抓起手边的茶杯向电视机砸去。

1月11日下午，天阴沉沉的，人们的心情更加沉重。周总理



的遗体从北京医院送往八宝山火化。北京百万市民冒着凛冽的寒风,早早就肃立在长安街两旁,来向周总理的灵车作最后的送别。这是一支由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的,规模巨大的,空前绝后的送葬队伍。

当周总理的灵车经过时,没有仪仗队,没有哀乐,但是群众的哭声撼天动地,人们为失去了敬爱的总理而悲恸,为担心国家的命运而惶惑不安。

周总理在遗嘱中要求将他的骨灰撒在祖国江河大地。他连一座坟墓也没有,但是人们永远怀念他,人们在心中为他建立了丰碑。

这年的清明节,大家不约而同地涌向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牌"周围献花圈,因为纪念碑上有周总理的题词,看到字迹,想起敬爱的总理。

天安门广场堆放了数万个花圈,纪念碑周围的柏树上,插满了层层白花,一片雪白。有的人家全家老幼出动,臂戴黑纱,胸佩白花,前去悼念。许多人以诗词表达哀思。天安门广场人潮汹涌,一片花山诗海。这激动人心的场面,真可谓惊天地,泣鬼神,是对"四人帮"一伙的公开示威。

这时,我校除从河北调回一些英语老师外,又陆陆续续调来一些政工干部。其中有一位领导传达上面指令:清明节是"四旧",是封建迷信。不要设灵堂,不要做花圈,也不许去天安门悼念。大家都对这样的命令愤怒之极。

到了4月5日,江青一伙露出了狰狞面目,他们调兵遣将,一夜之间,将天安门广场包围起来,抓走不少群众,捣毁、搬走了所有的花圈。这样的镇压还嫌不够,又将天安门广场的诗词拍照下来,到各单位查对笔迹,捉拿诗词作者。

我校领导要求去过天安门的人坦白交待,还拿出一些诗词的照片来对笔迹。借此机会,我将一首广为流传的诗偷偷地抄下来了。



欲悲闻鬼叫，
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
扬眉剑出鞘！

这首诗说出了大家的心声。我校清查的结果，没有人交待写过诗词和去过天安门。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将清明节期间发生的事件，定为“反革命”政治事件，邓小平被当作总后台而被罢了官。这种做法，只是更加激发了人们对周总理的深切怀念。

中国真是多灾多难，除了人祸，又来了天灾。1976 年 7 月 28 日凌晨 3 时 42 分，发生了唐山大地震。

自 1968 年夏天，家中发生惨变以后，我就患了严重的失眠症，每晚服安眠药，仍然无济于事。7 月 27 日晚上，也和往日一样难以入眠，躺在床上看书，直到午夜以后才迷迷糊糊地合上眼。

我大概正处于半眠半醒状态，猛然从震颤中惊醒，拉动灯绳，只见电灯在摇晃，窗户玻璃哗哗作响，立即意识到是地震，跑到孩子们的住房，一面推她们，一面大声喊：

“地震，快起来！”

她们一骨碌爬起来，跟着我往楼下跑。半路上，小罗汉说：

“妈妈！粮票、钱！”经她一提醒，我赶忙又跑回去拿了手袋。这时，人们已三个一群，五个一堆，惊慌失措地站在操场上了。

7 月的北京，天气酷热，人们从床上爬起来就往外跑，有的赤着上身，只穿一条短裤，有的用床单裹着身子，真是五花八门，穿什么的都有。

人们只知道是地震，但谁也不晓得震中在何处，范围有多大，也无处去打听消息。这时，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我立即跑回八号楼，拿出一把木椅和两把小竹椅。我坐在木椅上，一边一个孩子，坐在小竹椅上，趴在我的腿上睡。我们虽然穿着雨衣，我还撑着一



把伞,但怎能遮得住这狂风暴雨?不一会儿,我们三个人身上都淋得透湿。

雨停了,朝霞从东方升起,黎明终于来临,我们回屋换了干净衣服,吃了早饭,又跑到楼下,撑开伞,遮住7月的骄阳。

这年夏天老大因肝炎住院,地震时她还在医院,我既打不通电话,公共汽车又已停驶,因为时有余震,急得我团团转。好不容易找到一位领导,他派车送我去南郊的医院。

到达后,从楼下跑到楼上都见不到人,没有病人,也没有医生和护士。总算幸运,在门口碰到一位熟人。他说:"你最好到平房去找你女儿。医生也许在和你联系呢,他们尽量让病号出院。"

我在大礼堂四处寻找,忽然听到从角落里发出"妈妈,妈妈"的呼声,是我女儿!她躺在角落里的草垫上,我去找医生,他十分痛快地允许女儿出院了。

我们学校还没有正式恢复上课,我和孩子们只好呆呆地坐在椅子上。一位好心的邻居借给我一张躺椅。走时,他一面摇头,一面咕哝:

"唉!一个女同志,真不容易……"

驻扎在我们校园里的一些工程兵,找来几顶旧帐篷,在操场上搭了起来。我们总算在里面找到栖身之地,母女四人就挤在一张床上。这张木板床,可说是得到了充分的利用,晚上是床,白天是饭桌兼孩子们的课桌。

帐篷里床挨床,人挤人,白天太阳晒得地面滚烫,热浪从四面八方扑来,晚上除了挨蚊子咬以外,还有别人睡觉时发出的呼噜声、梦话声、磨牙声,此起彼伏,好不热闹。

有一位老先生,两个晚上都被吵得无法入眠。到第三天晚上,他不顾家人的反对,硬是回家去睡了。他说:"我宁愿冒地震的危险,也不愿每晚在帐篷里活受罪。"

我和他一样,也是被吵得整夜睡不着。但是,我要照顾孩子,



只好留在帐篷里睡。

那时的北京城，在空旷的天安门广场，在所有的公园、草坪和空地上，都搭起了小窝棚。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平民百姓，都住进了各式各样的防震棚里。

地震发生后的头一两天，人们到处奔走，打听情况。直到驻我校工程兵被派往河北唐山去救灾，我们才知道震中在唐山。

后来报上简单地报导了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了强烈地震，天津、北京有较强的震感。据我国地震局测定，这次地震为里氏 7.5 级。几天后，再次公布为 7.8 级。仅此而已。有关唐山地震后的状况，一点也没有提及，也没刊登灾区的照片，更别提伤亡人数了。我是直到写此书时，才找到地震局公布的一些数字：

死亡：242 769 人。

重伤：164 851 人。

但是重伤人中，又有多少人不治身亡，就不得而知了。

过了几天，我们逐渐从帐篷中搬出来，大家用单位发的竹竿、木棍、塑料布、苇席等，搭起一些简易防震棚。

我的学生也帮我盖了一个这样的小棚，里面可容纳两张单人床，两把椅子，还挂了蚊帐。我又把蜂窝煤炉子搬下来。我们就在这个小棚子里"安家"，直到深秋。

这时，有一位被分配到唐山附近的老同事，来北京避难，给我们带来不幸的消息。我校原人事处佟处长夫妇的住房被震倒塌，两人当场死亡。幸亏是暑假，两个女儿来北京亲戚家玩，才幸免遇难。但姐妹两人一夜之间成了孤儿。我校一位中文打字员的丈夫 7 月 27 日从北京去唐山出差，当夜即在地震中丧生。打字员不相信丈夫已遇难，天天守在家门口，望眼欲穿地等待着他的归来。

那位在唐山附近工作的幸存者，谈起地震时仍心有余悸。他说唐山整个城市几乎被夷为平地。他是九死一生，捡了一条命。



由于公路运输不畅，政府的救济物资不能及时到达。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没忘记突出“政治”。在断壁残墙上，到处贴了一些大标语：

“它震它的，咱干咱的！”

“它来一次地震，咱来一次革命！”

“活下来的拼命干，建设更美好的新唐山！”

“一次地震，就是一次共产主义教育！”等等。

幸存者说，目光所及，除了尸体和残垣断壁外，就是这些标语了。

据说，当时联合国及英、美、日等国都表示愿提供药品、食物、衣服、帐篷等，但中国政府一概予以谢绝。

《共同社》7 月 30 日报道：中国外交部告知日本驻华使馆，中国不接受外国，包括日本的任何援助。中国人民正在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抗震救灾工作。与此同时，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在纽约散发了《人民日报》社论，社论中说：

> “自力更生的救灾努力，说明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考验的人民，是战无不胜的。说明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

这篇社论向全世界宣布：唐山大震灾不需他国的援助。

十多年后，国门开了，人们的观念有了改变，一位当时抗震救灾指挥部的解放军将领说：“现在认识到，拒援是失策的。但当时我们谁能认识到呢？当时中央领导人于 8 月 3 日率领中央慰问团到灾区时对我们说：‘外国人要给我们援助，我们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用不着别人插手，用不着支援。’

“我们当时听了很激动，鼓掌、流泪，也跟着喊。现在才知道干了大蠢事。”



自然灾害是任何国家都会发生的。1976年唐山地震后，又有好几个国家发生了大小不同的地震。新闻媒体对灾区情况，联合国和许多国家捐款援助等，都如实详细报导，还没有听说过，有哪个国家拒绝这种人道主义援助，也没有任何人就他们这种做法，对他们的社会制度说长道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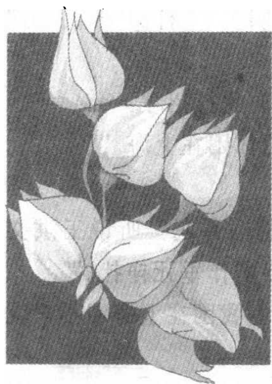
1991年我国遭受水灾时，我正在美国，看到报纸的报导后，大家认为能让中外记者报道灾情，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结果。很多华侨都纷纷捐款，血浓于水，毕竟都是炎黄子孙。

1976年9月9日，中国政府向全国、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逝世了。毛主席的去世使人感到意外，因为报纸上从未提过他患重病，生命垂危的事。中国领导人的健康问题是国家最高机密。

从11号到17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毛主席的遗体旁轮流守灵，哀悼活动持续一周。各界人士共三十余万人向毛主席的遗体告别，还特地安排各国驻华使节瞻仰毛主席的遗容。

江青身穿黑装，头披黑纱，板着面孔，参加了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百万人追悼大会。

追悼会结束时，天安门前的群众一起唱《东方红》，以表示对毛主席的悼念。但大家心里都清楚，老干部对江青这个“文革旗手”的所作所为恨之入骨。毛主席在世时，人们投鼠忌器，没有把江青绳之以法，现在毛主席已去世，江青专横跋扈的日子已是屈指可数了。



青山遮不住

1976年10月来临了，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10月，风雷激荡的10月，剑拔弩张的10月，烈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即将喷出的10月。

国庆节，人民大会堂没有举行国庆招待会，天安门广场一片萧索，白天没有浩浩荡荡的群众游行队伍，夜晚也没有火树银花般的焰火。

10月6日，“四人帮”垮台了。

当时，我正在上海。上街时，只见同济大学外面贴了一条大标语：

“打倒‘四人帮’！”

我急忙赶回招待所，问一位老干部，这是怎么回事，谁是“四人帮”？

“听说中央出事了，已经将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抓起



来了。不过我还没有听到正式文件传达。”

几天后，我返回北京，只见大街上到处刷上了“打倒‘四人帮’”的大标语。

回到学校，碰到一位邻居，她远远地就向我打招呼：

“你可回来了，我们大伙还为你担心，怕你困在上海。”

“那怎么会呢？”

“这四个坏蛋不都是和上海有着紧密的联系吗？听说王洪文他们发了枪支给他们那一帮派的小兄弟，妄图作垂死挣扎。”

“幸亏中央及时识破了他们的阴谋，否则我困在上海回不来就糟了。”

人们对“四人帮”在“文革”时的所作所为恨之入骨。“文革”期间，多少人挨批斗，带高帽，游街示众；多少人关进牛棚，挨打受骂；多少人进监狱，被非法拷打，残酷折磨；又有多少人被打伤、打死、家破人亡……这10年里受打击迫害和株连的干部、群众达1亿人[①]。

粉碎了“四人帮”，万民欢腾，普天同庆，家家户户喝酒庆祝，市场上各种酒都脱销了。还有人特地买回四只螃蟹，三公一母，回家煮了就酒吃，“但将冷眼看螃蟹，看尔横行到几时！”。

从10月21日开始，北京市民敲锣打鼓，燃放鞭炮，连续几天上街游行，文艺界人士披红挂绿。扭起了大秧歌。常香玉用粗犷的河南腔高唱：“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24日，北京阳光灿烂，晴空万里，百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集会，庆祝这个伟大的胜利，愤怒声讨“四人帮”的滔天罪行。

1980年11月，最高法院开庭审判了“四人帮”。1981年6月，对“四人帮”做出了如下判决：

江青，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生。（后改为无期徒刑）[②]

张春桥，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生。（后改为无



期徒刑）

姚文元，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生。[3]

“四人帮”的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罪行累累，罄竹难书。因此，电视播放判决实况时，人们无不拍手称快。但电视只播放了实况的一小部分。据参加旁听的人说，江青在法庭上胡搅蛮缠，有恃无恐，气焰十分嚣张。

江青还把她的一切罪行，都说成是毛主席的指示，当法官最后宣判江青死刑时，江青竟然高呼：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这类“文革”时期的口号。

法官最后命令“把死刑犯江青押下去”，以免她在法庭上撒泼。

1977 年，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了邓小平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职务。

此时，宋任穷被任命为七机部部长，像以往一样，七机部换了新部长，我就去申诉。

1978 年初，我给宋任穷写了一封信，说要找出杀害姚桐斌的幕后策划者，看来一时难以实现，我要求先给桐斌做结论，追认他为烈士。

我亲自将信送到宋任穷的办公室，并请秘书通报，希望见宋部长面谈。

宋任穷中等略高个子，瘦瘦的面庞，戴着眼镜，说话带湖南口音。

宋任穷很认真地听我讲述了桐斌被杀害的情况及我提出的追认桐斌为烈士的要求。他对我这些年的遭遇深表同情，答应向中央汇报，让我耐心等待。谈完话后，他亲自送我到楼梯口。

“文化大革命”前，宋任穷是东北局第一书记，刚到七机部，面



对混乱复杂的局面，工作的繁忙和困难可想而知，但他却抽出时间和我谈话，并答应帮助解决 10 年前遗留下来的问题，实在令我感动。

宋任穷将我的信上报中央，并在五届人大会议期间，当面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建议，追认姚桐斌为烈士，在全国科学大会召开时举行追悼会。经中央批准，追悼会定于 1978 年 3 月 18 日召开。这一天也是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的日子。

七机部一院政治部组织了治丧小组，并印发了一份讣告：

> 原七机部一院党委委员，七〇三所所长姚桐斌同志追悼会，定于一九七八年三月十八日上午八时三十分在西郊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届时请参加。
>
> 七机部一院姚桐斌治丧小组
>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五日

这个讣告只贴在院办公大楼门前，因此很少人看见。虽然如此，给姚桐斌开追悼会的消息，还是在南郊地区不胫而走，很多人想参加，但名单由上面定，不在名单上的人不能参加。但是，这一年清明节，七〇三所好多人，相约去八宝山公墓吊唁他们的所长。

治丧小组 3 月 15 日才通知我追悼会之事，并且告诉我，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小，只能容纳 300 人，因此，叫我只能请至亲好友参加。

此时，离追悼会只有 3 天了。

谈起追悼会，又令我忆起桐斌遗体停放在家中浴池里的悲惨情景，到如今，我已万念俱灰，最宝贵的已然消逝，其他的就只好由他们办了。

由于时间紧，我不但未能通知一些在国外的好友，连桐斌在四川的妹妹和妹夫也来不及通知。



这时，一位同事建议：

“你曾提到过聂帅很关心桐斌，是否通知他一下？”

依他言，我于 16 日给聂帅办公室打了电话，当天下午，聂办给我回了电话：

“聂帅近来身体不好，无法参加姚桐斌同志追悼会，他感到很抱歉。聂帅指示我们送花圈，并请你务必节哀，保重身体。”

3 月 18 日，北京仍然寒冷，我和几个孩子去了八宝山。在追悼会开始之前，他们请我先到灵堂看看，我见到桐斌的遗像用黑纱围着挂在墙上，下面放着他的骨灰盒时，心碎了，眼泪止不住簌簌地掉下，无法看清楚有哪些人送了花圈。

在休息室，彭绍辉副总参谋长第一个进来看望我，他也是我打电话告知的，接着其他领导依次进来和我握手，并劝慰我。我记得有好几位部长，还有钱学森以及七机部几位副部长和各研究院及研究所的领导。

正在这时，工作人员送来一份唁函，是粟裕大将写来的。经同事的提醒，我是 17 号给粟裕办公室去的电话，粟裕这天早晨才得悉，来不及参加追悼会，送来花圈和一份唁电，摘录如下：

> 姚桐斌同志是一位优秀的科学家，遭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已经十年，他的牺牲是林彪、“四人帮”破坏我国国防尖端科学事业的一个严重罪行……七机部党组织为姚桐斌同志昭雪，并举行了安灵仪式，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谨此对姚桐斌同志表示悼念，并向他的家属表示慰问。
>
> 粟裕
>
>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八日

宋任穷一直关心我和孩子们，后来宋任穷调离了七机部，仍一如既往地关心我们。



在中央领导和宋任穷的关怀下,《人民日报》海外版于1992年1月21日刊登了一篇我写的纪念桐斌的文章。领导同志认为,像桐斌这样的爱国知识分子应该宣传。同时他们还请七机部组织人写了一篇关于桐斌的文章,题为《为了祖国的航天事业》,于1992年1月16日刊登在《人民日报》上。

注释

① 叶剑英于1978年2月2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发言:“包括受牵连在内,受迫害的有上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这个教训是极其惨痛的。”(参见王年一编:《大动乱的年代》,第623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

② 江青已于1991年自尽。

③ 王洪文病故于1992年。



相聚九重天

为了解决住房问题，我再一次写信给宋任穷。宋任穷此时已是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他对我的信作了批示：

姚桐斌同志是从国外回来的一位有贡献的科学家，“文革”时被迫害致死，被中央追认为烈士。姚的追悼会召开一事，周总理生前曾多次讲过，他遗属住房问题，应妥善安排。此事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妥善处理。

宋任穷
1984年7月17日

此后不久，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为我和孩子们在市区安排了住房。

追悼会结束时，老大捧着父亲的骨灰盒，老二捧着父亲的遗



像，小罗汉扶着我，由灵堂走向骨灰存放室。此时此刻，我猛然意识到，是和桐斌永别了。

我的目光一直跟随着骨灰盒，那是我的桐斌吗？“No!”

桐斌是我第一次见面的那位高瘦挺拔、彬彬有礼请我跳舞的年轻科学家。

那是我的桐斌吗？“No!”

桐斌是在我们结婚时和我一起说结婚誓言的新郎“... for better for worse, for richer for poorer... to love and to cherish, in sickness and in health...”

那是我的桐斌吗？“No!”

桐斌是为我们老大出生而和他弟弟举杯相庆的幸福父亲。

桐斌是我眼前这三个泪流满面女孩的慈父。

桐斌是一位全心全意为祖国航天事业奉献的专家，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天，还在为我国第一颗卫星的上天而辛勤工作。

我轻轻地在心里说：“亲爱的，我们不会永别，我们只是暂时分离，我们将相聚在九重天。”

想到他生前勤勤恳恳地工作，一心想为祖国贡献自己的知识，但是由于坚持真理，不听某个人的瞎指挥而被批、挨整，以至于被打死。想到此处，我忍不住失声痛哭。

追悼会虽已开过，但谁知道以后会不会还有“文化大革命”？谁知道我的孩子会遇到什么样的政治运动？没有书面证明，人家就可能再一次诬蔑她们的父亲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多方奔走上告，要求有一个书面证明。直到1983年，才取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发的《革命烈



士证明书》。

在烈士证明书上有一栏，是牺牲时间、地点和原因，证明书上是这样写的：

“1968 年 6 月 8 日无辜遭坏人毒打，不幸牺牲。”

我将《革命烈士证明书》复印了几份，每个孩子一张，立此存照。

早在 1968 年时，周总理就命令某“无产阶级革命派”头头必须交出凶手，否则唯他们是问。在这种情况下，头头才不得不交出一个凶手高某某。高某某被拘留了。而另一名凶手于某某却逍遥法外。

1974 年李先念批示后，才将于某逮捕归案。经查明：于某用钢管猛击桐斌头部，致使桐斌头骨塌陷性骨折，硬脑膜破裂，即刻倒地。

高某眼见桐斌倒地，挣扎着要站起来的时候，又用钢管向桐斌猛击，再次将桐斌打倒在地。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1979 年 4 月以行凶致死人命罪，分别判于某有期徒刑 15 年，高某有期徒刑 12 年。

刑满释放后，于某回原单位当电工。高某原系七机部下属某工厂炊事员，回原单位不久，即调至某车间开吊车，后来又转为干部，成为该车间调度小组组长。

不仅如此，高某这个有杀人前科的人，竟然连续几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他的照片赫然出现在工作区的光荣榜上。更有甚者，高某还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社会主义艳阳天岂能容许如此不法之事，共产党岂会让双手沾满鲜血的杀人犯混入党内，这种做法在群众中引起了愤慨。有些人极为反感地说：“有人干了几十年仍旧是炊事员，那小子打死人竟像立了功似的，又是加薪，又被提干，还成了先进人物，听说又



快要入党了，难道没有王法吗?”

得知这一消息，我立即向上级领导部门反映，高某入党一事，才未获上一级党组织批准。

往事如烟如云，当桐斌和我第一次在天安门参加国庆观礼，见到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听到乐队演奏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时，他眼含泪花，紧紧握住我的手，对我微笑。这是一个爱国者发自内心的喜悦，他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他终于能为自己的国家服务，他的心愿终于实现了。

1958 年初，桐斌去南郊报到时，他被分配领导一个刚成立的航天材料研究组，配备给他的仅为 12 名大学生和一台金相显微镜。当时有人不解，问他：你是一位从国外回来的大专家，科学院和有的大学都点名请你去，为什么到我们这样一个简陋的地方来?桐斌回答：我回国不是为了名和利。我服从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工作，我愿和大家一起把我国的航天事业搞起来。

随着科研工作的开展和国防科研事业的需要，1958 年秋，这个材料组扩建为航天材料研究室，桐斌担任室主任。

1960 年，研究室又扩建为航天材料研究所(七〇三所)。桐斌被任命为所长。作为所长，桐斌首先确定了火箭材料工艺的研究方向。他主张把火箭所需的新材料提交国内各生产部门去研制生产，火箭零部件由火箭设计生产部门设计制造，而七〇三所的任务，则是对国内各有关单位研制出来的新材料，进行应用性研究，一直到成功地使用到火箭上为止。

桐斌亲自向聂荣臻元帅作了汇报。此后，国家计委、国家科委、国防科委联合召开了一系列材料工作会议，桐斌主持了好几个这样的全国性会议，在会上做报告，提出许多中肯的意见。这不但促成了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火箭材料、工艺和测试方法的研究协作



网，而且也促进了我国冶金、化工、建材等工业技术和国家材料科学的发展。

为了会议圆满成功，桐斌除了大量阅读国内外资料，还进行实地考察。多少个日日夜夜，他都是出差在外。又有多少个节日他都未能回家和我团聚。

即使桐斌在北京，我们也只能一个星期相聚一次。我星期六到家时已是下午五六点了，星期一黎明即离家。这种牛郎织女式的生活令我难以忍受。想多回家一次都得偷偷摸摸地离开学校。为此，我总是向桐斌发牢骚。其实，桐斌对我们的分离，又何尝不是有苦难言。后来，他对我说：等"文革"过后，他申请调到七机部的三线工作，我们全家都迁到大后方去，这样，我们就可以天天见面了。

在科研人员培养上，桐斌真正做到了呕心沥血。他言传身教，以培养一代火箭材料工艺研究工作者为己任。桐斌把新来的工程技术人员派到工厂去参加试制。回来后，又亲自严格检查学习情况，反复提问。他请设计部门的专家来七〇三所讲授火箭知识，又让七〇三所的专家给火箭设计人员讲材料及工艺知识，以便更好地配合。这种做法促使我国自制的火箭四年后就上了天。

此外，桐斌以"带徒弟"的方式，让几位技术骨干跟随自己学习，手把手地教他们。桐斌的良苦用心竟被责成是"将年轻人引向白专道路"，"文革"时竟将他的几位"徒弟"打成为"姚桐斌的黑秀才"。

重视预先研究，是桐斌对火箭材料工艺研究工做的又一贡献。他提出要"做到今天，准备明天，想到后天。"他还多次以开饭馆为例向七〇三所人员说明预先研究的重要性。"设计人员好比顾客，他点一道菜，你说，我还不会做呢！我还要去买菜、买肉、买鸡蛋呢！那怎么成呢？开饭馆的必须事先对顾客的爱好作调查，事先



准备好肉、菜、蛋，并事先学好烹调。这样，顾客点的菜，你就可以很快地烧出来了。”

桐斌强调：“火箭技术的迅速发展，对围绕它的各门科学技术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尤其要求材料、元件和工艺的结合。材料和元件的改进，依赖于工艺的革新。这就是说，航天技术、航天材料的应用及材料改进，都离不开工艺的研究和更新。”

1962年，七〇三所成为我国惟一的航天材料及工艺研究所。

桐斌除了向国内其他单位提出大量课题外，从1960年开始的四年中，七〇三所共开展研究课题五百余项，其中半数为预先研究。但是个别人以节约资金为名，大做文章，说桐斌他们搞预研是搞学院式研究，是不务正业，使得作为所长的桐斌竟然不得不悄悄地进行他认为必要的研究。即便如此，在“文革”中，此人仍然布置贴桐斌的大字报，说桐斌是“黑人”，做“黑事”，搞“黑科研”。

当我询问，桐斌他们的预先研究对今天的火箭发射、卫星上天有何作用时，工程技术人员激动地告诉我，姚所长领导的预先研究，百分之八十都用上了。

例如：导弹燃料箱体的合金就不断改进，直到使用了铝铜系列铝合金，提高了屈服强度，实现了铝合金研制和应用的飞跃，达到了与美国相当、高于欧洲和前苏联的水平。

另外，在让火箭“轻装上天”这个难题方面，桐斌也做了很大的贡献。众所周知，火箭结构越轻，就飞得越高，越远。桐斌和同事们克服了研制生产过程中的种种难题，成功地用比重低、强度高的钛合金气瓶代替钢气瓶，使每个气瓶减少重量7千克以上。如果一枚火箭使用30个气瓶的话，就可减少重量200千克以上。这个项目获得了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等多种奖项。

桐斌始终坚持科学求实的工作作风，经常到科研生产第一线中听取意见。他善于团结广大科技人员和工人，同时，他还深入到所内课题研究工作中去。对重大课题方案，他一定要与课题负责



人反复讨论后才最后敲定，并对研制全过程进行跟踪调查，以便及时解决出现的问题。例如：研制的铜合金棒材断口缺陷问题久攻不克，他在调查中了解到问题的所在，指导课题组利用真空吸注法解决了这一难题。

这些项目不仅用于卫星上天，火箭发射，而且在其他科学研究领域里填补了国内空白。其中许多项目已经转为民用，正在创造巨大的国民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好几位航天专家对我说：姚桐斌所长的业绩不光是某个项目，而是从无到有建立了七〇三所。这个材料工艺研究所的专业就有几十项，而且各不相同。领导有这样多专业的一个所，桐斌并不样样都懂，但是他不停地学习。他知道七〇三所在航天领域里是配合设计部门工作的，他能从全局出发，认识自己的位置，在材料及工艺科研方向上和设计部门紧密配合，以完成任务。

一位总工程师指着他们墙上挂着的奖状对我说：

“俗话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些奖状，都凝结着姚所长的心血！”

“文革”开始后，有人紧锣密鼓，暗中策划，造谣中伤：“姚桐斌有历史问题”，“姚桐斌有特务嫌疑”，“姚桐斌是假党员”……

桐斌以为自己历史清白，问心无愧，故而不但不躲起来，反而敢于继续工作。但殊不知，他的没问题，他的坦白态度，他的无所畏惧，甚至他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某些别有用心者的威胁。

桐斌被害已三十多年了，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无时无刻不在怀念他。

现在太阳虽然仍旧早出晚落，春天依然鸟语花香，夏天照样繁花似锦，但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这一切只令我更加锥心刺骨地想念桐斌。

当我听到美妙动人的音乐时，我回忆起我俩相依相偎在沙发上听音乐时的情景。



当我经过天坛公园时，我难忘我俩漫步花前月下的时光。

当我拿起和他的合影时，我重复我俩的海誓山盟。

每当夜深人静，桐斌就会出现在我身旁，用手轻轻地把我额前的碎发拨到一边去。

桐斌！我好想念你！这些年，我活得太累，太苦。我多么需要你的保护，我多么喜欢一头栽进你的怀里，享受那无比的温馨。

蓦然，我的手被握住，我们面对面，你的眼神表达了对我的关怀和期望。

桐斌！我可以告慰你的是：你为之奉献了金色年华的火箭事业，正在蓬勃发展。

特别令人自豪的是：现在我国的火箭技术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并已经进行多次商务发射了。

我可以告慰你的是：由于你对我国战略导弹技术的贡献，1985年，钱学森、屠守锷、你和郝复俭、梁思礼、庄逢甘等科学家荣获“全国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可惜你未能出席领奖。但这表明，你虽然已经离开人间多年，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你！

1999年9月上旬，我已购买了去美国的机票，正在友谊商店逛逛，看能否买些有中国特色的礼品。这时，我的手机响了，一位年轻女士的声音传到我耳中：

“哎呀，好不容易才找到您。本月18号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一个重要会议，请您参加。”

可我已买了机票，15号就将离开北京，怎么可以改日期呢？她告诉我，是一个颁奖大会，请我务必延期赴美。机票之事由他们负责解决。

9月18日，他们派车接我到人民大会堂，当我们到达时，天安门已经戒严。进去后，只见人们都入座了。几分钟后，党和国家领导也都步入台上就座。

江泽民主席亲自为这些“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佩带奖



章。江主席号召大家学习这23位功臣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作、勇于攀登的精神。江主席说："许多功成名就、才华横溢的科学家放弃国外优厚的条件，义无反顾地回到祖国。许多研制工作者甘当无名英雄，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生命……"在这次会上桐斌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当江主席讲话时，我心潮澎湃，热泪盈眶，我对桐斌说：坏人可以扼杀你的生命，但是你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2000年9月15日，七〇三所给桐斌树立了一尊两米高的塑像，张爱萍将军为塑像题词："我国航天材料工艺奠基者姚桐斌"。

七〇三所在9月15日隆重地举行了揭幕仪式并邀请了一些"两弹一星"[①]科学家和以前的老领导参加会议。他们都高度赞扬桐斌渊博的知识和高贵的品德，赞扬他爱党、爱国、勤奋工作、任劳任怨的精神。年轻人表示要以桐斌的学识、品德为榜样，对照人生，并且将这种精神发扬光大。

我感谢大家在桐斌被害三十多年后仍然纪念他。

由于健康原因，钱学森未能出席，但他写了几句话：

"鞠躬尽瘁为航天，德昭日月感后人。"

在午餐时，科学家和领导都举杯向我敬酒，此时，我突然感到桐斌微笑着向我走来，我们互相碰杯，我默默地对他说："亲爱的，我们相聚的日子不远了。我们将相聚在九重天上。"

注 释

① 人民日报在1999年9月9日社论，《向"两弹一星"功臣致敬》的第二段中明确指出：原子弹、导弹、人造地球卫星称为"两弹一星"。

后记

桐斌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多年了，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他。就在桐斌被害几天后我写过一张大字报，简略地说明了惨案的情况和他的生平。

在大字报中，我引用了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这篇文章中的话："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这几句话给了我力量，它使我认识到为了给桐斌昭雪，我必须前进。为了抚养三个幼女，我必须挺下去。

这些年，党和人民一直没有忘记桐斌：他被追认为烈士，他获得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又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我们的三个女儿皆在海外成家立业。有人问我：为什么年过古稀的我不享享清福，而每年都往返奔波？我一人孤零零地在北京不寂寞吗？我告诉他们：我从未感到过孤寂。桐斌的爱一直充满我的心田，令我享受一生。只要我在世一天，就要宣传桐斌：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一位炽热的爱国者，一位为我国航天事业献出一生的科学家。我为他骄傲。

桐斌魂系中华，我是如此地爱他、恋他、想他，我怎能离开他！我愿追随他，直到永远。



彭洁清

2002年5月18日于北京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航天情：永远的眷恋
作者=彭洁清著
页数=208
SS号=11175887
出版日期=2002年09月第1版